

2016年第4期  
总第4期

# 热风学术 4

特刊 \_

制造灾难和生产需求：

种子霸权让大自然在猎食者的胃里相遇……

[德] 爱丽丝·克莱肖尔 / 安德烈斯·西克曼 \_ 著 吕途 \_ 译





您也可以扫描二维码，  
登陆网站阅读本期杂志。



您还可以扫描二维码，  
获取本刊 2016 年合集。

## 热风学术网刊

---

**主 编** \_ 倪 伟 郭春林

---

**学术编委** \_ 按姓氏拼音排序

雷启立 孟登迎 潘家恩 朴姿映(韩国) 滕 威 章戈浩

---

**责任编辑** \_ 蔡 博 **编辑助理** \_ 徐慧冰 **美术设计** \_ toybook studio

---

**编辑部邮箱** \_ refengxueshu2016@foxmail.com

---

本刊每年 3 月、6 月、9 月、12 月 15 日上线。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 All Rights Reserved

---

# 目录

---

2016\_12

---

总第4期

---

## 2 特刊 \_

### 制造灾难和生产需求：

种子霸权让大自然在猎食者的胃里相遇……

[德] 爱丽丝·克莱肖尔 / 安德烈斯·西克曼 \_ 著 吕途 \_ 译

这些关于种子垄断的图画创作始于2012年，那个时候我们在对“斯瓦尔巴德全球种子库”进行研究，这个种子库于2008年开始运作，其声称的宗旨是为了挽救世界种子资源。然而，种子库的赞助者们包括了比尔盖茨基金会、先正达和先锋公司，这引起了我们的警惕。这样，我们的研究就拓展到了种子库和那些慈善—资本家们，又延伸到全球农业垄断的历史，这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的绿色革命，而这个历史现在还在继续，今天的农业产业被几家巨头所垄断着。这个历史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同时也是对大自然进行没有限度地控制和剥夺的历史。这是一个灾难史，是凶手利用灾难的发生来形成新的需求和生产力的过程。

## 论文 \_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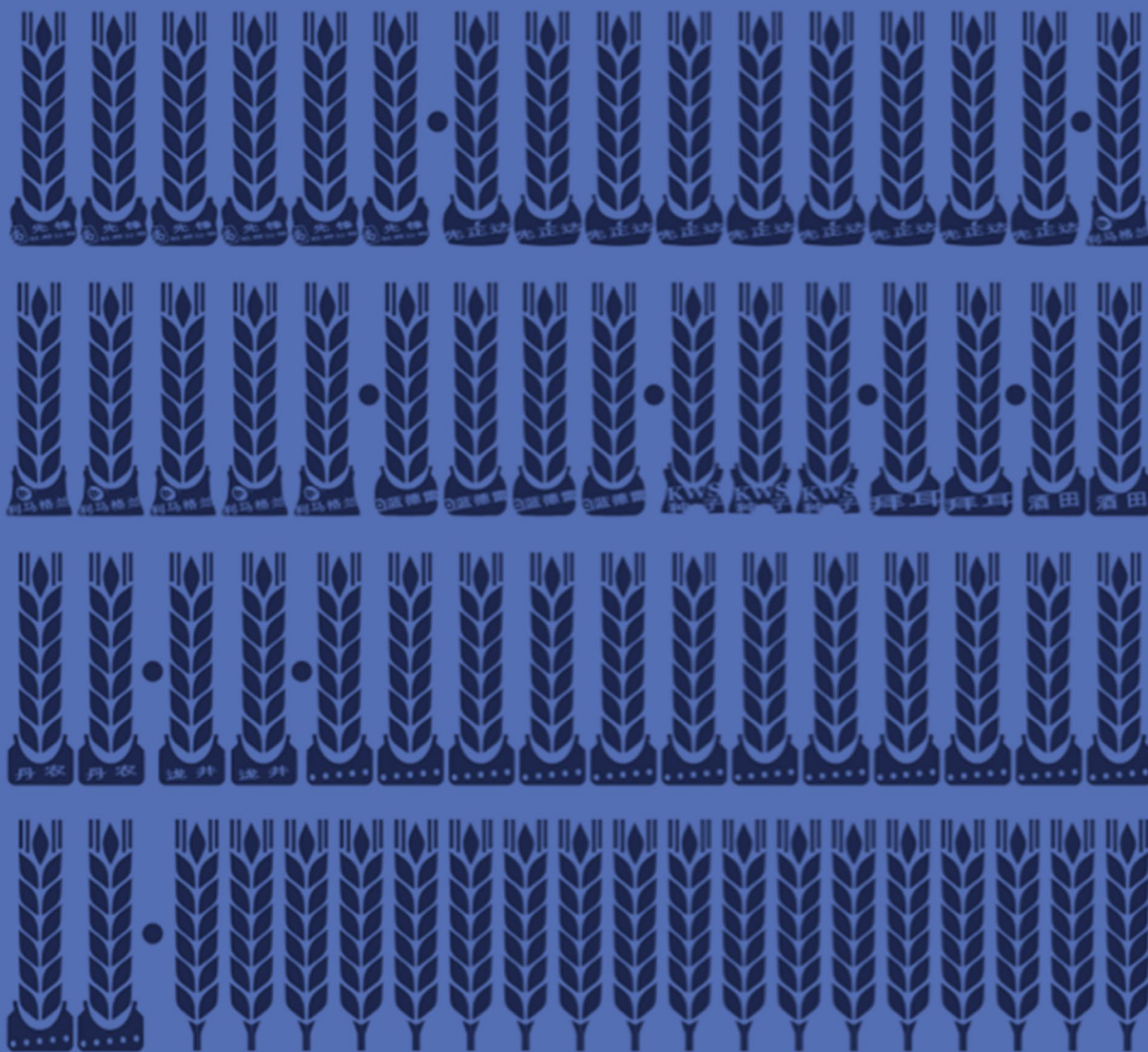
- 114 沈光铨 \_ 试论 20 世纪革命变奏法节奏分析  
——以俄罗斯革命、中国革命为中心（下）

## 专稿 \_

- 133 陈光兴 等 \_ 一位非洲知识分子的形成：与马穆德·曼达尼对谈

## 索引 \_

- 177 本刊 2016 年（总 1-4 期）目录




# 制造灾难和生产需求

种子霸权让大自然在猎食者的胃里相遇……

[德] 爱丽丝·克莱肖尔 / 安德烈斯·西克曼 著 吕途 译



 **热风学术网刊**  
特刊\_

---

### 作者介绍 \_

---

#### 爱丽丝·克莱肖尔 (Alice Creischer)

1960 年出生德国的盖罗尔施泰因 (Gerolstein)。现在是德国柏林白湖艺术学院 (Weißensee Kunsthochschule) 的教授。爱丽丝大学期间就读于杜塞尔多夫德国文学和视觉艺术学院 (German literature and Visual Arts in Düsseldorf)，就读哲学专业。她在 1990 年代德国政治艺术运动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她最近关注的主题是近代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历史。她也做过多次重大展览项目的策划人，比如 2010 年组织了来自全世界 20 多位艺术家在西班牙、德国和玻利维亚开展了“坡托西逻辑” (The Potosi Principle) 的展览。



#### 安德烈斯·西克曼 (Andreas Siekmann)

1961 年出生于德国哈姆 (Hamm)，现在是德国柏林白湖艺术学院 (Weißensee Kunsthochschule) 的教授。大学期间学习艺术和历史专业。他长期致力于公共空间的艺术，后来更多关注自我组织和合作艺术实践。他主持和参与了非常多的展览项目的策划，创作出了众多的艺术作品，反映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经济、权力结构和工人的状况。



---

### 译者介绍 \_

---

#### 吕途

1968 年出生于中国长春。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发展社会学博士，荷兰海牙社会学所妇女与发展硕士，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学士。2008 年 5 月至今，在北京工友之家工作，从事研究、培训和社区工作。出版有《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2013 年)、《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2015 年) 等专著。新著《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即将出版。



## 译者的话

---

我对艺术作品没有特别大的直觉敏感性。我对艺术作品的喜爱和感触往往需要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核心是对作品背后的知识、历史和故事的了解。经历了这样的积累过程之后再反观作品，那种视觉冲击就变得特别大，痛楚或者美感会被放大很多。对书中的这些图画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当我翻译完了所有文字以后，这些画面都跟以前变得不同。绘画有不同的类型和风格，这本图书的画作为“图形统计画”作品，图形不仅具有形象的意义，同时，一些图形的数量还带有数量统计的涵义。

这个图书的文字部分也很特殊，大多数情况下，书籍的文字是按照作者的逻辑撰写出来的，而这本图书的文字都节选自各种公开网页，也就是说不是艺术家自己写的。这给我们很有意思的一个提示：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我们有可能在信息中迷失，也有可能比较容易获得以前很难获得的各种证据，而指导我们搜索信息的是思维和方向，有了这样的指导，我们就可以“拼图”出对世界的认知，并且随着自己阅历的增加和思维的深化不断调整我们的“拼图”。当然，这样的“拼图”能力也需要训练和耐力，爱丽丝就跟我坦言，她虽然知道搜索方向，但是在信息搜索过程中曾无数次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

安德烈斯的“图形统计画”以黑白为主色调，偶尔出现红色，只有图十中充满了红色。他告诉我，红色代表着积极的力量。

第一次见到爱丽丝和安德烈斯是在2010年的5月，她们邀请打工文化艺术博物参加她们策划的大型国际巡展“坡托西逻辑”（The Potosi

Principle)。来自 20 多个国家的 40 多个展览项目参与了展出，我们把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浓缩版搬了过去，我们的参展题目是“中国新工人阶级的形成：三十年流动的历史”。“坡托西逻辑”于 2010 年 5 月到 8 月在西班牙马德里索菲亚国家美术馆展出，2010 年 10 月到 12 月在德国柏林文化宫展出，2011 年 2 月到 5 月在玻利维亚国家博物馆展出。这个展览的核心思想是，西班牙对玻利维亚及其他美洲国家的殖民历史开始于 500 多年前，最为惨烈的剥夺发生在玻利维亚的银矿坡托西，经过 100 年的开采，当西班牙人把银子都抢走以后，留下的是贫穷、疾病和一座废城。而这样的霸权和掠夺的逻辑到今天依然继续，只不过采用了不同的手段。

2014 年 11 月，我到柏林自由大学开会，同时专程拜访了她们位于柏林东部的家。街道比较破旧，她们后来还告诉我，很多来自东欧的移民建筑工住在这附近，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都很差。我们每次总有说不完的话，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国度，从事着不同的具体工作，但是我们是反资本主义的同事。这种共同价值观下所产生的感情和信任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东西。而且，我还发现，很多怀有这样情怀的人都比较容易相处，生活简朴随意。到了她们家，我和陈琳没有吃饭，她们也没有吃饭，我们拿出路上买的面包，她们拿出黄油、果酱和奶酪，非常轻松自在。环视她们充满童趣和艺术氛围的家，我发现了她们家墙上的展览海报，她们就拿出了这本图文并茂的图书开始给我讲解，说这个展览就是根据这本书的内容办的，随着她们的讲解，我逐步被吸引住了，这是一个全世界人民都该了解的话题。我就拿了 2 本，并且告诉她们我会翻译成中文。

这个图文并茂的作品涉及了广泛的专业领域，译文中一定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甚至出现严重错误，请读者不吝赐教。译者对原书有两处改动：第一，原文的文字部分是按照字母顺序来对所涉及的概念和事件进行排列



的，而译者把对每一张图进行说明的概念和事件集中到了一起；第二，原文没有对各个图画的简介，简介部分是译者根据原作者的文字和自己的理解重新书写的，并且在2015年6月8日和她们就我的简介进行了核对。

讨论中，我和爱丽丝交流了她最近关注的事情，最近，欧洲最受关注的事情之一是TTIP（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如果该协定生效，美欧贸易关税将降至零。现在，各种民间抗议此起彼伏。我问爱丽丝，那么最后会怎么样？爱丽丝说：“最后还是会通过，我们欧洲貌似有民主，其实我们只有抗议的民主，没有决策的民主。”我对爱丽丝说：“今天的中国，有两个方向性的讨论，一个是争取将中国建设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这种倡导会被认为拥护专制，会被陷入历史的包袱的讨论中；另一个方向是走西方式的民主，很多人，包括工友，觉得只要我们有了一人一票，像美国一样一切就解决了，但是我们知道美国是资本霸权的盟主，在剥夺全世界人民。你的话也告诉了我们，德国民主也不是真的，那么我们的方向到底在哪里？”爱丽丝说：“拉美国家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希望，西班牙最近选举出左翼政党给我们希望。同时，我觉得，一个是通过揭露进行反思，全世界人民到了一个历史时刻，必须一起反思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不要发展，我们要幸福；另一个是，‘小的是美好的’，进行各种基层的小型创新和建设，然后这一个个小的结构再联合起来。”

吕途

2015年6月

# 目 录

---

前言 \_ 9

第一章 欺骗与揭发 \_ 10

图 I \_ “常设人民法庭”关于“农用化学品跨国公司”的研讨 \_ 13

图 II \_ 斯瓦尔巴德全球种子库揭幕大会 \_ 21

第二章 慈善的真面目 \_ 22

图 III \_ 全球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在谷歌搜索中排名前 5 位的成员 \_ 25

第三章 种子霸权 \_ 37

图 IV \_ 大自然在猎食者的胃里相遇 \_ 39

第四章 制造灾难和生产需求 \_ 44

图 V \_ 在胃里，制造灾难和生产需求 \_ 48

图 VI \_ 制造灾难和生产需求，并使人们过度流动 \_ 61

第五章 环保和基因被“商品化”绑架 \_ 66

图 VII \_ 大自然不再自然，而是被占领、被污染和充满不稳定 \_ 70

图 VIII \_ 抢夺“无主物” \_ 79

第六章 强盗逻辑下的商业化 \_ 84

图 IX \_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_ 87

第七章 更好的社区和环境是可能的 \_ 94

图 X \_ 萨瓦先生和马修先生 \_ 97

第八章 强盗的狂欢 \_ 105

图 XI \_ 博洛格论坛（博洛格世界粮食奖国际讨论会） \_ 107

# 前言

---

这些关于种子垄断的图画创作始于2012年，那个时候我们在对“斯瓦尔巴德全球种子库”进行研究，这个种子库于2008年开始运作，其声称的宗旨是为了挽救世界种子资源。然而，种子库的赞助者们包括了比尔盖茨基金会、先正达和先锋公司，这引起了我们的警惕。这样，我们的研究就拓展到了种子库和那些慈善—资本家们，又延伸到全球农业垄断的历史，这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的绿色革命，而这个历史现在还在继续，今天的农业产业被几家巨头所垄断着。这个历史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同时也是对大自然进行没有限度地控制和剥夺的历史。这是一个灾难史，是凶手利用灾难的发生来形成新的需求和生产力的过程。

这种绘画方式由维也纳图形统计研究所（Vienna Institute of Graphical Statistics）最先使用，其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在德国工人和苏联工人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方式结合了绘画和主题分析，综合勾画了政治和经济的联系。这样的一幅画可以用巨幅画板来展示，填满某个公共空间。这种图形统计方式是那个时代德国和苏联国际工人运动中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我们非常喜欢这种展示方式的原因还在于，它可以激发讨论，把一些貌似事实的东西给推翻。

爱丽丝·克莱肖尔、安德烈斯·西克曼

2014年

# 第一章 欺骗与揭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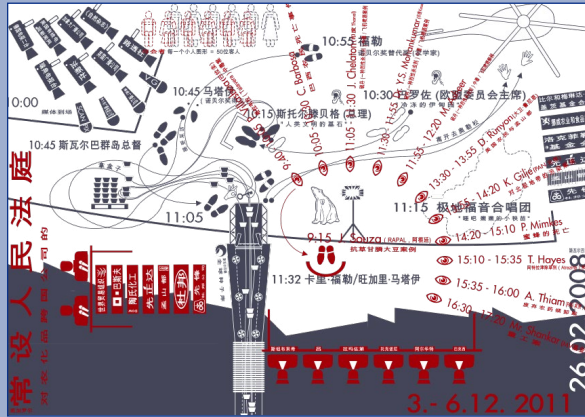


图 I \_ “常设人民法庭”关于“农用化学品跨国公司”的研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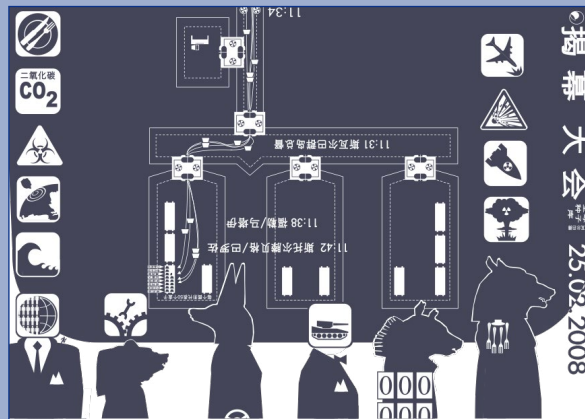


图 II \_ 斯瓦尔巴德全球种子库揭幕大会

在图一和图二中，交叉描述了两个会议，一个是对农化品跨国公司进行控诉的会议（2011年12月3日到6日）：“常设人民法庭”关于“农用化学品跨国公司”的研讨。在会议中，人们通过案例的形式，对拜耳、巴斯夫、陶氏、杜邦、孟山都和先正达这6家公司（这6家公司占有全世界农药市场的72%）所销售的种子和农药所造成的伤害进行了陈述。这些伤害包括：健康损害、以及环境和生态危害。在这里，“常设人民法庭”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法庭，而是一个模拟法庭。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穷人是上不起法庭的，因为律师费太昂贵了。

另一个会议是“斯瓦尔巴德全球种子库揭幕典礼”（2008年2月26日）。该种子库用来储存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种子。万一种源由于自然灾害、战争或者资源匮乏而丢失，就可以利用这里贮存的种子进行繁育。建设该种子库的重要理由是保护生物多样性。

滑稽的地方是，对该种子库提供资金支持的包括：比尔·盖茨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孟山都、先正达和先锋/杜邦公司。这些企业恰恰是“常设人民法庭”所审判的被告。这几家公司占据着全球种子市场的50%。洛克菲勒基金会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绿色革命的始作俑者，其发动了全球范围内的农业产业化，这导致了很大程度的生物多样性的消失和土壤流失。

这一对比，说明了大农化品公司们惯用的说一套做一套的伎俩：建设“斯瓦尔巴德全球种子”表面上说是为了保存植物基因资源，保持生物多样性，而事实上，正是导致生物多样性破坏的大公司们在资助这个种子库，而探究谁在使用种子库的数据就可以知道，种子库为大公司申请专利进而垄断这些自然存在的生物和农作物多样性提供了方便。

在图二，我们看到了一些野兽，他们就是我们这个图文作品所指的猎食者（大公司和政客）。除了说一套做一套，这些猎食者惯用的伎俩还有制造灾难（图二两侧图形代表的：饥饿、温室气体排放、洪水、人口危机等等），然后用这些灾难来恐吓我们，然后承诺他们找到了解决方案，然后这些方案把我们带入更大灾难的道路上去。

班加罗尔

# 常设人民法庭

## 对农化品跨国公司的



世界贸易组织

巴斯夫

陶氏化工

先正达

孟山都

杜邦

先锋 杜邦公司

斯瓦尔巴群岛

阿根廷

印度

巴西

泰国

印度尼西亚

尼泊尔

尼泊尔

尼泊尔

尼泊尔

尼泊尔

尼泊尔

尼泊尔

尼泊尔

尼泊尔

尼泊尔

尼泊尔

尼泊尔

尼泊尔

尼泊尔

尼泊尔

尼泊尔

尼泊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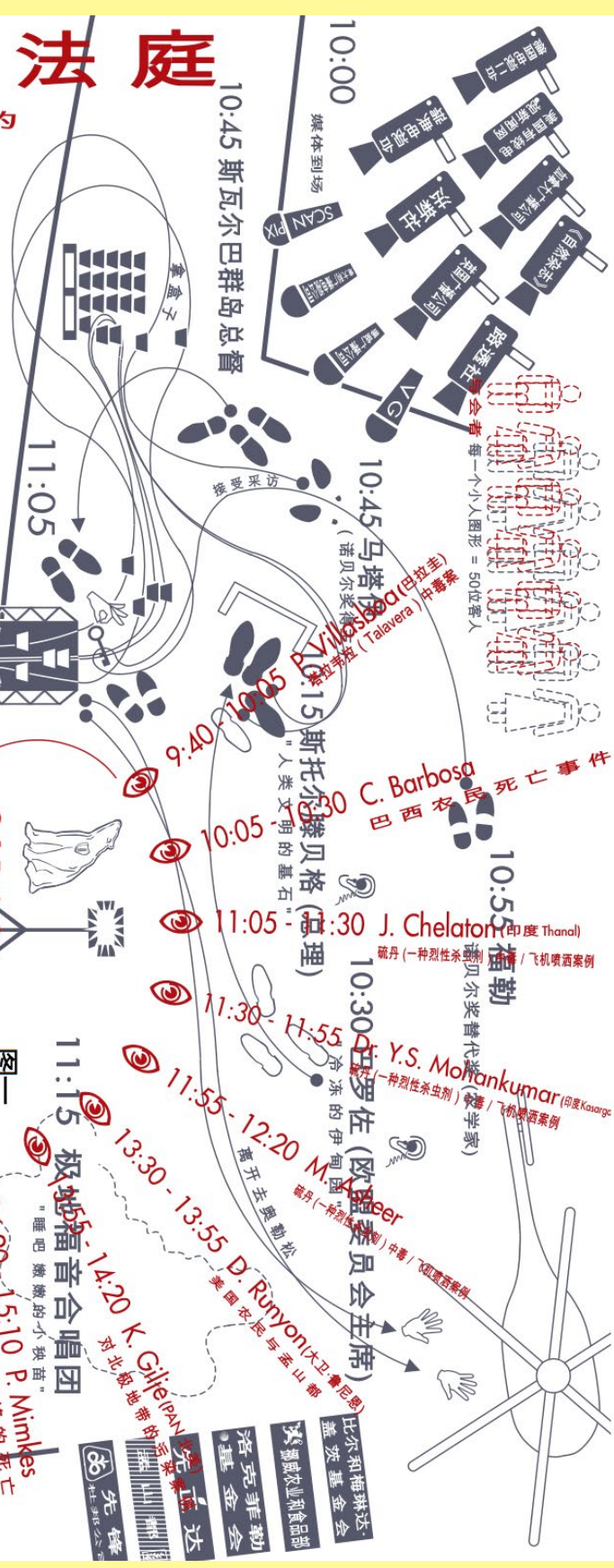
尼泊尔

尼泊尔

尼泊尔

尼泊尔

尼泊尔



# 3-6.12.2011

# 26.02.2008

## “常设人民法庭”关于“农用化学品跨国公司”的研讨

---

“常设人民法庭”关于“农用化学品跨国公司”的研讨，[印度]班加罗尔，  
2011年12月3日到6日

常设人民法庭(Permanent Peoples' Tribunal)“关于‘农用化学品跨国公司’的研讨”，是对从2008年7月开始的一个调查的总结。2008年7月，“农药行动网络”(Pesticides Action Network)的代表提出了一个干预请求，去调查跨国农用化学品公司所造成的“(人口)大规模死亡、对健康的严重损害、对环境的抢劫、和对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的毁灭”(摘自“请求书”)。由于受害者和幸存者没有有效资源来通过法律途径谋求公正，“常设人民法庭”决定于2011年12月3日到6日在(印度班加罗尔举办这个研讨，以便公示过去两年所收集到的案例。

根据研讨议程，证人、技术证人和幸存者做口头发言，对案例和证据进行说明。遵照“人民法庭”条例规定，“人民法庭”通知了各跨国公司的代表，包括：位于德国的拜耳集团(Bayer)和巴斯夫公司(BASF)的总部，位于瑞士的先正达公司(Syngenta)，和位于美国的孟山都公司(Monsanto)、杜邦公司(DuPont)和陶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 Company)的总部。“人民法庭”上的发言展示了这些农化品跨国公司对人权的侵犯，总结如下。拜耳、巴斯夫、陶氏、杜邦、孟山都和先正达是全球主要的农用化学品跨国公司，它们生产农用化学制品和专利种子(包括杂交种和转基因种子)。合在一起，这6家公司占有全世界农药市场的72%。由于这些公司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并且持续地滥用其影响力，从事贿赂(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恐吓，使放松监管，制造误导的、错误的、甚至欺诈的信息和资料，还有用虚假的和咄咄逼人的销售方式来促销有危害的农药和转基因种子。结果，高毒性的农药被生产、销售和使用，导致苦难和侵权，这些尤其对小农、农业雇工、穷人和无权无势的人造成巨大影响。侵权和苦难有的是只要使用转基因种子就会发生，有

的是转基因种子和有危害的农药共同造成的。在草甘磷（ glyphosate ）控制杂草失败的情况下，有害农化品的问题就变得更加严重，因为不得不增加农药使用量，如：2、4-D 和麦草畏除草剂（ dicamba ）的使用量，而且还不得不继续种植转基因作物，因为只有转基因作物才能耐受如此强烈的除草剂。

“人民法庭”控诉了上诉六家农化品跨国公司和三国政府的罪责，并进一步声明，所有政府、国际机构、联合国专家机构、和所有参与全球治理的相关机构也都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 关于上述六家公司（拜耳、巴斯夫、陶氏、杜邦、孟山都和先正达）

“人民法庭”所发现的所有证据都证明了，这六家公司对下列灾难承担罪责：整体的、广泛的、系统性的对健康和生命权力的侵害；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力的侵害；对公民和政治权力的侵害；对妇女和儿童权力的侵害。“人民法庭”进一步发现，公司运行的系统性的行为导致了本可以避免的灾难性危机，增加了生物多样性灭绝的危机，很多面临灭绝的物种对人类繁衍声息至关重要。

### 关于上述三国政府

美利坚合众国、瑞士联邦和联邦德国政府被证明没有履行它们在国际社会承诺过的促进和保护人权，特别是保护脆弱群体的人权以及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习俗和贸易责任。具体表现如下：这六家公司在这三个国家注册并设立总部，三个国家的政府没有运用国家法律和政策对这些公司进行充分的监管、监测和约束。三国政府没有充分尊重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国民对国家没有吸取第一次绿色革命的教训就走向第二次绿色革命的抗议。

### 陪审团成员

Upendra Baxi( 印度 ) , Elmar Alvater( 德国 ) , Ibrahima Ly( 塞内加尔 ) , Paolo Ramazzotti( 意大利 ) , Ricarda Steinbrecher ( 英国 ) , Gianni Tognoni ( 意大利 ) 。



## 日程

关于“农用化学品跨国公司”的研讨，印度，班加罗尔，2011年12月4日。

09:15 – 09:40: 证人 1: 抗草甘膦大豆案例 Javier Souza (RAPAL, 阿根廷)

09:40 – 10:05: 证人 2: Silvino Talavera 中毒案例 Petrona Villasboa (巴拉圭)

11:05 – 11:30: 证人 4: 硫丹 (Endosulfan 一种烈性杀虫剂) 中毒 / 飞机喷洒案  
Jayakumar Chelaton (印度 Thanal)

11:30 – 11:55: 证人 5: 硫丹中毒案例 Dr.Y.S.Mohankumar (印度 Kasargod)

11:55 – 12:20: 证人 6: 硫丹中毒案例 Dr.Mohammed Asheer (印度 Kasargod)

01:30 – 01:55: 证人 7: 美国农民与孟山都 大卫·鲁尼恩 David Runyon (美国)

01:55 – 02:20: 证人 8: 对北极地带的污染案例 Kathryn Gilje (PAN 北美)

02:20 – 02:45: 证人 9: 蜜蜂的死亡 Philipp Mimkes (CBG 网络 德国)

02:45 – 03:10: 证人 10: 蜜蜂的死亡 格雷厄姆·怀特 Graham White (养蜂人 英国)

03:10 – 03:35: 证人 11: 阿特拉津除草剂 (Atrazine) 和骚扰案 Dr. Tyrone Hayes (加利福尼亚大学, 伯克利, 美国)

03:35 – 04:00: 证人 12: 废弃农药倾卸案 About Thiam (PAN 非洲, 塞内加尔)

04:30 – 04:55: 证人 13: 童工案 (MV 基金会) Mr Shankar (印度)

04:55 – 05:20: 证人 14: 童工案 (儿童) Ashwini (印度)

05:20 – 05:45: 证人 15: 百草枯 (一种除草剂) 中毒 Nagama Raman (农药喷洒工, 马来西亚)

Email: [tribunale@internazionaleleliobasso.it](mailto:tribunale@internazionaleleliobasso.it); [filb@iol.it](mailto:filb@iol.it)

Web: <http://www.internazionaleleliobasso.it>

<http://www.pan-uk.org/files/PPT%20Draft%20Finding%20and%20Recommendations.pdf>

## 斯瓦尔巴德岛全球种子库

斯瓦尔巴德岛全球种子库建在斯瓦尔巴德群岛的山上的永久冻土带，用来储存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种子。很多种子来自发展中国家。万一种源由于自然灾害、战争或者资源匮乏而丢失，就可以利用这里贮存的种子进行繁育。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是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可食用作物的多样性正持续面临着压力……

该种子库有贮藏 450 万种种子样本的能力。每个样本储有 500 粒种子，也就是说，最多可以有 22.5 亿颗种子在这里储存。因此，这个种子库拥有容纳世界所有各种种子库种子的能力，现在，在全世界 100 多个国家有大概 1400 家储存专门种子样品的基因库。而且，这个种子库也有储存将来新发现的种子的储存空间。那些对食物生产和可持续农业有重要意义的作物品种将被优先考虑进行收集。种子在零下 18 度进行储存……低温和隔绝氧气将确保最低限度的新陈代谢以延迟种子的老化……

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粮食危机的挑战。众多因素导致了这个状况，其中也包括缺乏充分的基础设施来保护生物多样性。斯瓦尔巴德种子库在这种情况下就对发展中国家的种子保护起到重要的作用。很多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种子库为保护植物多样性提供了额外的安全保护。

该种子库由挪威的三个政府部门提供资金支持：挪威外交部、挪威环境部和挪威农业与食品部。该种子库由公共建设与公共财产（Public Construction and Property）董事会负责建设和技术管理。挪威基因资源中心负责种子库的日常管理和运行。斯瓦尔巴德的地方政府负责种子库的安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粮农基因资源委员会（CGRFA）和粮食和农业植物基因资源国际协定（ITPGRFA）的管理委员会为种子库提供全球框架。该种子库将继续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植物基因资源体系作出贡献。<http://www.regjeringen.no/en/dep/lmd/campaign/svalbard-global-seed-vault.html?id=462220>

挪威的政府网站忘记了提及，对该种子库提供资金支持的还包括：比尔·盖茨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孟山都、先正达和先锋 / 杜邦公司。这几家公司占据着全球种子市场的

50%。洛克菲勒基金会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绿色革命的始作俑者，其发动了全球范围内的农业产业化，这导致了很大程度的生物多样性的消失和土壤流失。

盖茨基金会把自己当作继承者，它发动了非洲绿色革命联盟（Alliance for a Green Revolution in Africa），宣传第二次绿色革命，在非洲大陆上推动转基因农业的产业化。

## 斯瓦尔巴德协议

斯瓦尔巴德协议为公司们谋求获得植物基因专利提供了额外的便利……斯瓦尔巴德寄存协议的条款是相当复杂和含糊的，有时候，甚至完全误导，而且还加入了让人费解的问题和国际法的注释……很多种子库只需要和寄存者拟定简单的备忘录就可以。与此对比，一些种子库和收集者几乎无法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或者找合适的律师，来破译斯瓦尔巴德合同文本中的无数复杂条文。

同时，GCDT 和支持它的生物技术公司及其代理，一直在宣传他们耗资百万美元为斯瓦尔巴德种子库从发展中国家获得当地和小型种子收集者的种子。正如前面提到的，那些当地的种子收集者几乎无法理解他们寄存的种子将会如何被利用，更不要说征得当地收集者的同意了。<http://www.seedsnatcher.com/2010/11/amy-goldman-kent-whealys-nemesis-joins.html>

要想获得农作物基因资源需要遵守“粮食和农业植物基因资源国际协定”(ITPGRFA)。该协定于2004年生效，120个国家签署认可了该协定。斯瓦尔巴德的种子存储协议也是基于该协定而制定的。该协定保证，基因库是所贮存物的拥有者。但是，如果任何人提出申请，无论是育种者或者农民，基因库必须给申请人提供一些种子。如果一个育种者想从斯瓦尔巴德申请种子，那么，看一下种子库的数据库就足够了。

让人们高效和有效地获得基因库的种子，这是在（挪威）斯匹次卑尔根岛（Spitsbergen）的植物基因数据库存在的全部意义所在。说到这里，要清楚，可以进入有管控的电脑系统和相关使用知识就是个前提。这自然是上亿农民所不具备的知识和能力……Shakeel Bhatti说，根据《国际协议》的文件记录，人们对植物基因物质有着浓厚的兴趣，每天都有600

人次的咨询，通过协议来申请获得基因库的种子样品。

跨国的申请多来自坐落于工业化的北半球的大型种子公司，大都是从基因库里索要南半球的基因物质。

Christoph 说：“就是这样，大公司通过专利的形式来尽可能地垄断这些自然存在的生物和农作物多样性。数据库成为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从中利用地方品种的信息，及其他可以利用来申请专利的信息。在相关专利申请中可以明确显示，生物多样性中心或者相应的基因数据库都被系统地搜索过。我认为，大公司的确把这些数据库作为服务设施来收集合适的数据，以便帮助完成其专利申请。” <http://www.heise.de/tp/artikel/30/30303/1.html>

### 斯瓦尔巴德全球种子库揭幕典礼

**全天：**事先安排好的访谈

**出席人：**欧盟主席巴罗索（ Mr. José Manuel Barroso ）；挪威总理斯托尔滕贝格（ Mr. Jens Stoltenberg ）

**时间：**2008 年 2 月 26 日，星期二

**地点：**媒体中心，SAS 雷迪森酒店（ Radisson Hotel ）

**09:35 – 09:50：**挪威新闻通告：欧盟主席巴罗索；挪威总理斯托尔滕贝格；地点：雷迪森酒店门阶

**09:50：**从机场前往种子库：来自世界国际农业研究中心（ the world’ s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centers, CGIAR ）的装满种子的黑盒子抵达开幕式现场。共有来自哥伦比亚、墨西哥、加拿大、菲律宾、叙利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肯尼亚的，大约 10 吨，装在 676 个盒子里的，268,000 种不同种子的样本

**10:30 – 11:15：**官方开幕式

工人合唱歌曲“睡吧，嫩嫩的小秧苗”（Sleep Little Seedling Young）

由艺术家奥拉夫（Olav Storø）用冰做成的北极熊护送着种子库走进现场。北极熊的心脏是由当地的种子做成的，希望等到夏天北极熊融化后种子可以发芽。主席台上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致辞：“面临气候变化和其他破坏生物多样性——其维持着地球生存——的威胁，挪威很自豪地承担起了建设这样一个设施的核心角色，用来保护这些种子，这些种子不仅仅是种子，而是人类文明的基石。”巴罗索（Mr. José Manuel Barroso）的发言：“这是一座冷冻的伊甸园。”弗莱德瑞克-斯卡福林（Fredrik Skavlan）访谈卡里·福勒（Cary Fowler），杰西卡（Jessica Kathle），迪乌夫（Jacques Diouf）；由公共建设与公共财产董事长转交钥匙。弗莱德瑞克-斯卡福林访谈旺加里·马塔伊（Wangari Maathai）；斯托尔滕贝格（Stoltenberg）和巴罗索（Barroso）还有其他客人抬着装种子的盒子向山上走去。

与会客人离开。

**11:15**：极地福音合唱团（Polar Gospel Choir）合唱：“睡吧，嫩嫩的小秧苗”（Sov, du vesle spire u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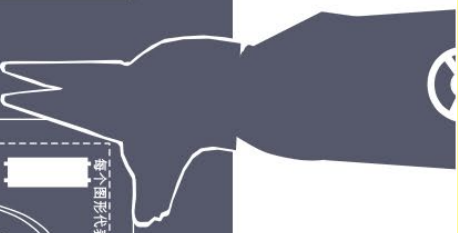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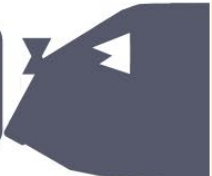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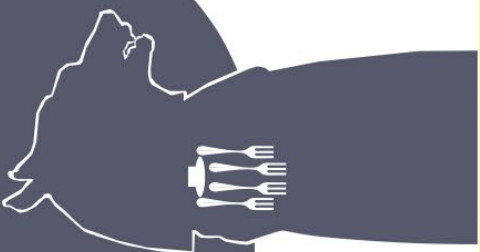
**11:20 - 12:00**：媒体时间 / 拍照

**12:00**：巴罗索先生和斯托尔滕贝格先生离开去奥勒松（Ny-Ålesund）

**12:30**：新闻发布会 / 媒体时间

# 揭幕大会 25.02.2008

斯瓦尔巴德  
全球种子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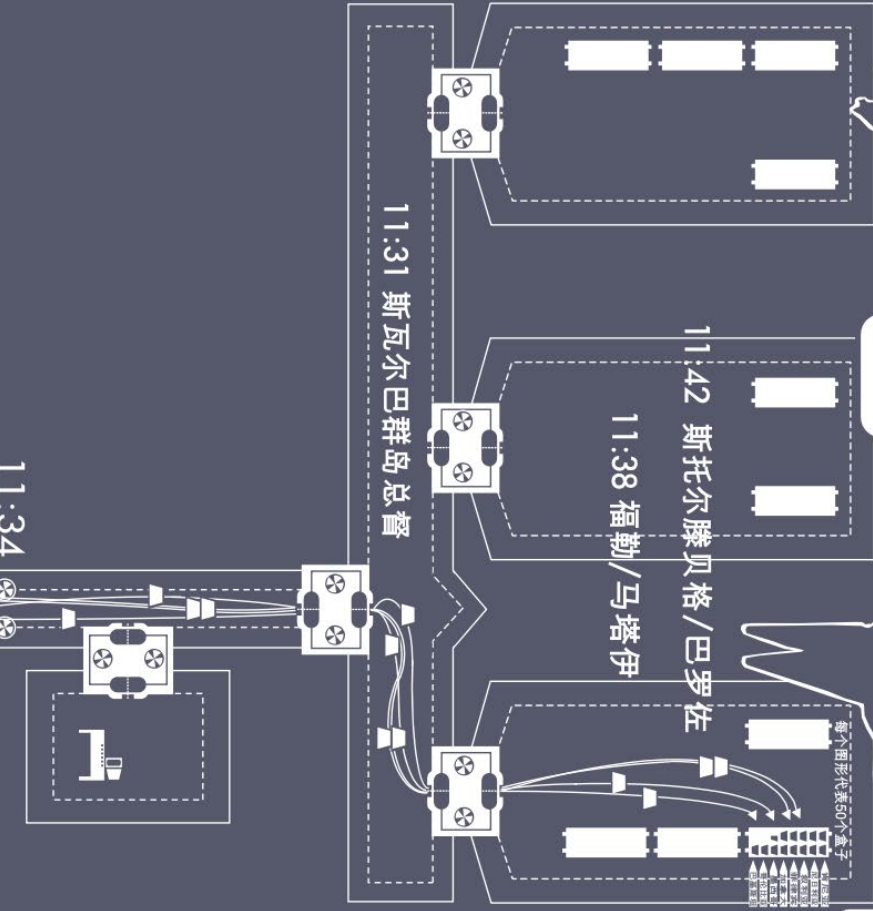
11:34

11:31 斯瓦尔巴群岛总督

11:42 斯托尔滕贝格/巴罗佐

11:38 福勒/马塔伊

每个图形代表50个分子



二氧化碳  
CO<sub>2</sub>



## 斯瓦尔巴德全球种子库揭幕大会

---

灾难资本主义：斯瓦尔巴德全球种子库揭幕大会，周日 2008 年 2 月 24 日  
下午 4 点

“如果发生全球灾难，比如小行星撞击或者疾病大流行，将种子贮存在这有史以来建立的第一个‘世界末日’种子库里，就可以保证人类可以重新种植这些作物。种子库按照设计可以抵御一切自然和人类灾害，并且保存了所有已知的粮食作物样品。”

——Terje Riis-Johansen, 挪威农业与食物部部长

“今天地球上有 70 亿人。到了 2050 年，将有超过 90 亿人。在未来的日子里是否有足够的粮食满足世界人口应该是一个挑战。气候变化使得生产粮食变得越来越困难，也越来越贵。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斯瓦尔巴德全球种子库中贮存的种子才对未来有着关键的意义。我们相信，所设计的设施将会确保种子得到妥善的保护，即使设备之外全球变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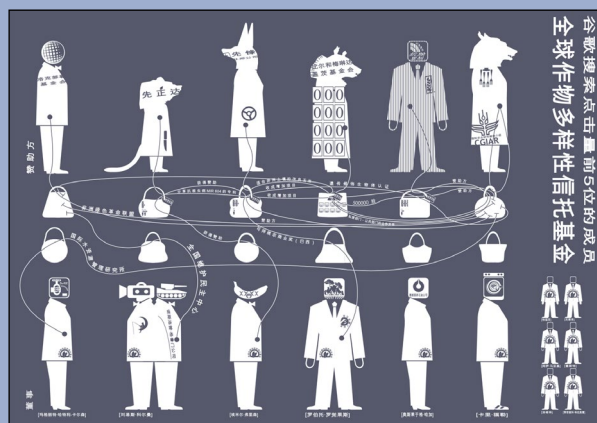
——Magnus Bredeli Tveiten, 项目经理

“（许多）基因库一直受到自然灾害、战争和内战的威胁。许多基因库位于发展中国家……（斯瓦尔巴德）种子库是保存种子的完美场所，可以安全保存种子 1 万年。我们的宗旨是确保全世界的作物多样化和食物安全。日益难以预测和变化的气候，加上世界人口预计在 2050 年达到 90 亿，这都向农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保护作物品种的高度的多样化是为农民和育种者提供原始物质进行品种改善和提高适应性的唯一途径，以便迎接挑战，保证人类未来的食物安全。”

——Cary Fowler, 总裁，全球作物多样化信托基金

<http://www.regjeringen.no/en/dep/lmd/campaign/svalbard-global-seed-vault/news/summary-of-the-svalbard-conference.htm>

## 第二章 慈善的真面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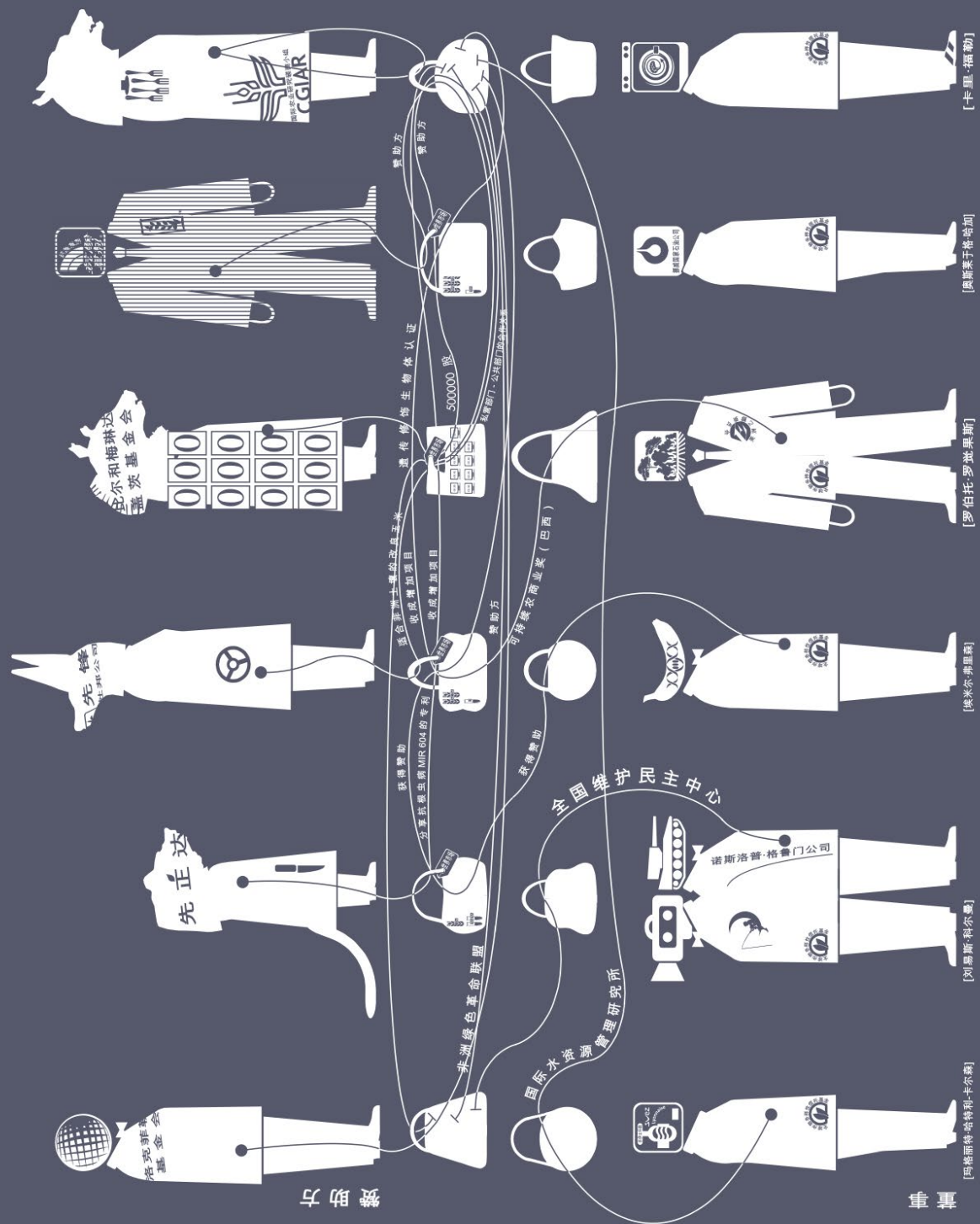
这一部分，详细罗列了全球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的成员的背景。这里可以充分体现出资本主义以慈善为面目、以技术和产品为手段，最后实现控制和赢利的过程。

拿先正达公司为例，“先正达基金会”在菲律宾赞助“农民支持小组”，对农民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综合害虫治理（IPM）、综合作物管理（ICM）和完全作物管理（TCM）……。而先正达公司控制全球专利种子市场份额的9%，和农用化学品市场的18%。先正达公司销售除草剂百草枯导致农业劳动力中毒和致死。

盖茨基金会和孟山都都有非常密切的合作。盖茨基金会在2010年投资2千3百万美元给孟山都，帮助其度过财政灾难，而且是孟山都向发展中国家推广转基因作物的坚定的支持者。孟山都公司在非洲推销“综合包”：杂交玉米种子、化肥和除草剂在过去几年里，通过逐步吞并南非当地的种子公司和加强其研究机构和研究能力。孟山都已经控制了南非玉米市场的40%。

图三和前两张图的联系是，全球种子库的建设是以政府和慈善的面目出现的，但是其实在背后支持这个种子库的是全球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基金会的董事和赞助者们大都是背后的策划者，并不声张自己的角色，免得让公众醒悟过来。这张图形象的展示了这些董事会成员和赞助者的真实面目，他们的脑子和他们的钱袋代表着他们的手段和胃口。拿图中下排第二个人物刘易斯·科尔曼（Lewis Coleman）来举例说明，他有两个头，因为他既是“梦工厂动画”（DreamWorks Animation）这个大媒体的主席，又是美国五角大楼最大的军工承包商。

# 谷歌搜索点击量前5位的成员 全球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



## 全球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在谷歌搜索中排名前 5 位的成员

### “金字塔底”销售

孟山都转变了其在穷国的经营战略，尤其是在南撒哈拉非洲，采用了所谓的“金字塔底”的销售战略，就是说，面向最穷的地区，尽管这些市场是零散的和分散的，但是，仍可以带来上万亿美元的销售额……公司的主打产品叫作“综合包（Combi-Pack）”，祖鲁语中被称为“Xoshindlala”，意思是“赶走饥饿”，从1990年代开始在南非销售。“综合包”里包括杂交玉米种子、化肥和除草剂，是专门为小农准备的，还附有象形图文的使用说明，文盲的人也可以看懂如何使用。该产品被认为是“金字塔底”销售的优秀案例……这个包还附有免耕技术，这是孟山都一直在发展中国家推行的一项技术。也就是说，依靠除草剂来除草，而不是靠锄地，可以减少水土流失，被吹嘘为一种环境可持续的做法。……孟山都公司在过去几年里，通过逐步吞并南非当地的种子公司和加强其研究机构和研究能力，已经控制了南非玉米市场的40%。Elenita C. Dano, *Unmasking the New Green Revolution in Africa*, African Centre for Biosafety, Third World Network, 2009

### 全球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

**挪威农业和食物部称：**“全球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为种子的运输提供科学指导和帮助，也为种子库的管理和运作提供很大的资助。

**宗旨：**全球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称：现在，世界的作物多样性既没有被安全地保护，也不能被科学家和农民及时获得，而只有依靠作物多样性才能确保农业生产力。全球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是世界范围内响应这一领域的资助危机的唯一机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有别于那些要为获得捐赠进行竞争的机构……下面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就是：我们虽然面临将会对世界产生巨大消极影响的关键问题，但是却有了明确的和可以实现的解决办法。而这个解决办法恰恰是我们信托基金所提供的；可以估价和衡量的计划，依靠现有的机构和技

术成熟的样本。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作物多样性在消失，我们信托基金是全世界唯一一家专门为作物多样性保护进行资助的组织。我们信托基金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运用理性的和成本效益体系来实施资源的保护，所保护的这些资源是所有农业和世界未来食物供应的基础……

日益难以预测和变化的气候，加上世界人口预计在 2050 年达到 90 亿，这都向农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保护作物品种的高度的多样化是为农民和育种者提供原始物质进行品种改善和提高适应性的唯一途径，以便迎接挑战，保证人类未来的食品安全……只有一家机构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工作来解决这个问题 - 全球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我们信托基金的做法是，筹集一笔基金，其利息足够用来有效的保护整个农业的生物基础，同样关键的是，为那些需要使用这些资源的人提供方便。这笔基金将确保对这些至关重要的自然资源的保护具备永远的坚实的基础。<http://www.croptrust.org/content/who-we-are>

### 全球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 (GCDT) 的成员，参照谷歌点击的前 5 名 (慈善资本主义)

#### 玛格丽特·哈特利 - 卡尔森 (Margaret Catley-Carlson) (加拿大)

全球水合作 ( the Global Water Partnership ) 与苏伊士里昂水务集团 ( Suez Lyonnaise des Eaux ) 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联合国秘书长顾问团成员，罗森伯格论坛 ( the Rosenberg Forum ) 成员，和世界粮食奖顾问委员会成员。她也是下列董事会的成员：IWMI 水资源管理国际中心 (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 ;the IFDC 化肥管理 (Fertilizer Management) 和 IIED 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她是 ICARDA ( 干旱地区农业研究国际中心 ) 和 CABI ( 英联邦农业国际局 ) 董事会和水供给和卫生合作委员会的主席；21 世纪水资源

IDRC (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董事会的副主席; 1983 年到 1989 年加拿大国际发展署 (the 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的主席; 1981 年到 1983 年位于纽约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 的副总裁; 1993 年到 1998 年位于纽约的人口委员会的主席; 1989 年到 1992 年加拿大健康与福利部的副部长。 <http://www.croptrust.org/content/the-board>

**苏伊士里昂水务集团 (Suez Lyonnaise des Eaux)** 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水务公司之一。

**哈特利 - 卡尔森 /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 (Catley-Carlson/CGIAR) (Consultative Group on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水资源管理国际中心 (IWMI) 是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 (CGIAR) 的一部分。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 (CGIAR / Consultative Group on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是农业研究捐赠方, 包括政府、基金会、国际和区域组织的一个战略联合体。其所支持的工作由 15 家 CGIAR 国际农业研究中心联盟来完成, 并与数百家伙伴机构紧密合作。CGIAR 现在拥有 64 家政府和非政府成员, 支持 14 家研究中心, 和一家跨政府研究中心 (非洲水稻 AfricaRice)。 <http://www.hodinhhai.com/cgiar-organization.html>

## 刘易斯·科尔曼 (Lewis Coleman) (美国)

是梦工厂动画 (DreamWorks Animation) 的主席, 受雇于美国证券银行 (Bank of America Securities), 曾是该银行 1995 年到 1998 年的高级执行总裁, 1998 年到 2000 年是该银行的主席……在美洲银行 (Bank of America) 工作 10 年, 分别任资金市场主任、世界金融集团主任、董事会副主席、首席财政主管。之前的 13 年, 在威尔斯富国银行 (Wells Fargo Bank), 分别担任国际金融主任、人力资源主管、信用政策委员会主席……是“债务 - 换 - 自然” (debt-for-nature) 的先行者之一, 与身陷债务的发展中国家签订协议, 然后一个或者多个信用方同意免除其债务, 换取的是其对环境的环境保护。 <http://www.croptrust.org/content/the-board>

科尔曼也是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Northrup Grumman Corporation）的首席董事长，该公司是美国最大的五角大楼军工承包商。诺斯洛普·格鲁曼所生产的武器中最出名的是重型战略隐形轰炸机 B-2 幽灵，无人侦察飞机 RQ-4A 全球鹰，和核动力的尼米兹级航空母舰。<http://www.globalresearch.ca/doomsday-seed-vault-in-the-arctic-2/23503>

**科尔曼 / 洛克菲勒基金会：**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菲勒基金会都是全国维护民主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Democracy）的成员。

### 卡里·福勒（Cary Fowler）

---

在成为全球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的执行总裁之前，卡里·福勒博士是一位教授，是挪威生命科学大学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学院（Research in the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 Development Studies at the Norwegian University of Life Sciences）的研究主任。他曾经是生物多样性国际（Biodiversity International）秘书长的高级顾问，就职期间，他代表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the Consultative Group on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的未来丰收中心（Future Harvest Centres）参与植物遗传资源国际协定（the International Treaty on Plant Genetic Resources）的谈判。卡里在作物多样性的保护和使用方面的职业生涯已经持续了 30 年。他曾经是美国国家植物基因资源理事会（the National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Board of the U.S）的成员，也曾经是墨西哥国际玉米和小麦改良中心信托公司理事会（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International Maize and Wheat Improvement Center in Mexico）的成员。卡里是几本关于植物基因资源著作的作者，也在相关刊物上发表了 75 篇关于农业法与发展的文章。<http://www.croptrust.org/content/the-board>

### 埃米尔·弗里森（Emile Frison）

---

埃米尔·弗里森博士是“生物多样性国际”（Bioversity International）的总裁。“生

物多样性”欧洲区主任……在法国蒙彼利埃（Montpellier）的香蕉和芭蕉改良国际网络组织的主任。近期领导组织制订“生物多样性”的新战略远景，其中，营养和农业多样性，本着可持续的方式，将为实现减少饥饿和贫困的总目标发挥重要的作用。<http://www.croptrust.org/content/the-board>

**弗里森（Frison）/香蕉：**“只有转基因（GM）可以拯救香蕉”第一次在2001年的一个故事中被隐晦地说了出来……从那时起这个信息就在媒体中反复出现。那个故事声称，因为香蕉是不育的，所以无法通过培育新品种来避免致命的香蕉疾病，香蕉可能在10年后灭绝……每一次这则消息都成为头条不断出现，也被揭穿……直到再来一轮。每一次，同一个科学家的名字都会被引用，那就是埃米尔·弗里森博士……联合国粮农组织已经直接批驳了弗里森博士，认为，虽然存在抵抗疾病的脆弱性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恶化主要是因为广泛的商业化地引入卡文迪什（Cavendish）香蕉造成的，并可以通过推进更大程度的基因多样性来进行对抗。<http://www.gmwatch.org/index.php/only-gm-can-save-the-banana>

**弗里森（Frison）先正达公司（Syngenta）先锋（Pioneer）：**捐资方

**弗里森（Frison）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CGIAR）：**生物多样性国际（Biodiversity International）

## 奥斯莱于格·哈加（Åslaug Haga）（挪威）

哈加女士是挪威工业联合会可再生能源部门（Renewable Energy of the Federation of Norwegian Industries）的主任。她也是挪威自然研究所（Norwegian Institute for Nature Research NINA）理事会的主席……2003年，她被选为中间党（Centre Party）的主席。哈加女士曾经担任过三届部长：1999年到2000年是文化部部长，2005年到2007年是地方政府和区域政府部部长，2007年到2008年是石油与能源部部长。<http://www.croptrust.org/content/the-board>

## 盖茨基金会 (Gates Foundation)

**盖茨基金会 / 微软 (Gates Foundtion/microsoft)** : 在 2011 年, 微软拥有世界用户软件的 90 %。 <http://de.statista.com/statistik/daten/studie/157902/umfrage/marktanteil-der-genutzten-betriebssysteme-weltweit-seit-2009/>

全球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 (GCDT), 负担着斯瓦尔巴德种子库的运转费用。基金会到目前为止, 已经收到了来自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近 3 千万美元的赞助 (Global Diversity Trust, 'Funding Status 1-1-2011')。这远远超过基金会收到的来自任何其他非政府机构的赞助。 <http://www.centerforfoodsafety.org/issues/303/seeds/seed-banks#>

**盖茨基金会 / 孟山都 (Gates Foundation/Monsanto)** : 众所周知, 盖茨基金会和孟山都有非常密切的合作。盖茨基金会在 2010 年投资 2 千 3 百万美元给孟山都, 帮助其度过财政灾难, 而且是孟山都向发展中国家推广转基因作物的坚定的支持者。 <http://www.centerforfoodsafety.org/issues/303/seeds/seed-banks#>.

**盖茨基金会 / 孟山都 /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 (Gates Foundation/Monsanto / CGIAR)** : 罗伯特·霍施博士 (Dr. Robert Horsch) 被盖茨基金会聘用为全球发展项目高级项目官员 (该项目是“非洲绿色革命联盟” AGRA 项目的顾问)。霍施是“产品与技术公司”的副主席, 后来成为孟山都公司的国际发展伙伴部门的副主席……在加入盖茨基金会之前, 霍施为孟山都工作了 25 年。他也曾经是“削减非洲饥饿和贫困” (Cut Hunger and Poverty in Africa, PCHPA) 的合作伙伴顾问委员会、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的私人部门委员会和联合国千年项目中饥饿工作组的成员。 Elenita C. Dano, *Unmasking the New Green Revolution in Africa*, African Centre for Biosafety, Third World Network, 2009

**盖茨基金会 / 洛克菲勒基金会 (Gates Foundation/Rockefeller Foundation)** : 洛克菲勒基金会与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达成了联盟, 并在 2006 年 12 月 12 日对外公布。这两家世界最大的慈善基金会的结合促生了“非洲绿色革命联盟”, 盖茨基金



会的首次投入达 1 亿美元，洛克菲勒基金会达 5 千万美元。这个联盟被认为是盖茨基金会的一个突破，从此以后，盖茨基金会就将其慈善资金主要投入到了全球健康和医疗项目上了。“非洲绿色革命联盟”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使用促进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技术、政策和制度创新，来提高小农的生产率和利润率。在一本标题为“非洲的机会：21 世纪的新绿色革命”的白皮书中，勾画了盖茨 - 洛克菲勒合作的概念框架。白皮书的主要意思是，非洲应该从绿色革命的承诺中获益，这要通过综合使用现代生态技术和现代生物技术。 [Elenita C. Dano, Unmasking the New Green Revolution in Africa, African Centre for Biosafety, Third World Network, 2009](#)

### 孟山都 (Monsanto)

孟山都控制专利种子市场份额的 23%，农用化学品市场份额的 9% (2009)。 [Who Will Control the Green Economy?, 2011, www.etcgroup.org](#)

孟山都被许多网站引证为斯瓦尔巴德种子库的最主要的捐助方，但是这样的信息不会出现在斯瓦尔巴德种子库的主页上。孟山都与下列公司分享技术和专利：总部在澳大利亚的粮食研究和开发公司 (Grains Research &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GRDC)，总部在瑞士的先正达公司 (Syngenta AG)。 [http://monsantoboycott.com/sponsorships /link no longer works](http://monsantoboycott.com/sponsorships/link no longer works)

**孟山都 /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 (Monsanto/CGIAR)：**基因巨人们还和慈善 - 资本家们联合起来，为发展中国家开发可以耐受恶劣环境的特质。例如，孟山都和巴斯夫在和国际玉米和小麦改良中心 (CIMMYT)，和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和南非的国家农业研究项目，共同开发抗旱玉米。这个项目得到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 4 千 7 百万美元的赞助。孟山都和巴斯夫已经同意捐赠给非洲研究人员抗旱转基因，并且免除专利使用费。 [Earth Grab: Geopiracy, the New Biomasters and Capturing Climate Genes, ETC Group, 2011](#)

## 先锋 (Pioneer)

先锋 / 杜邦控制了专利种子市场份额的 15%，农用化学品市场的 6%。(2009) [Who Will Control the Green Economy?](#), 2011, [www.etcgroup.org](http://www.etcgroup.org)

**先锋 / 盖茨基金会 /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 (Pioneer/Gates Foundation/CGIAR):** “适合非洲土壤的良种玉米项目” (the Improved Maize for African Soils, IMAS) 于 2010 年 2 月启动。该项目所开发的玉米品种，可以更高效地吸收土壤中的少量化肥，因为非洲农民只能支付起施用少量的化肥。该项目也使用氮肥，可以更有效地提高粮食产量。项目将使用先进的生物技术，例如生物标志技术 - 对所选择的特质进行遗传物质标志 - 通过转基因手段来培育最终可以增产 30% 到 50% 的品种，而且不需要增加氮肥的施用量，而且是同样耕种在贫瘠的土质上。所开发的品种在供给种子公司的時候将不收取专利费，再由种子公司销售给小农，也就是说，转基因种子的价格将不会高于其他品种的种子……预计，运用转基因标识技术的种子将在 7 到 9 年内投放市场，而包含转基因特质的种子将在大概 10 年后投放市场，取决于品种的表现，和国家监管和科学管理部门的审批，这些要依据各个国家的法律和监管程序来进行。“适合非洲土壤的良种玉米项目” (IMAS) 由国际玉米和小麦改良中心 (CIMMYT) 领导，由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和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提供 1950 万美元赞助。项目还有其他的合作伙伴，包括：杜邦企业、先锋种子 (Pioneer Hi-Bred)、肯尼亚农业研究所 (KARI)、南非农业研究委员会 (ARC)，这些伙伴也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捐助，包括：人员、基础设施、种子、基因物质、技术、培训和信息。<http://www.cimmyt.org/en/improved-maize-for-african-soils>

## 罗伯托·罗觉果斯 (Roberto Rodrigues)

罗伯托·罗觉果斯在 2003 年到 2006 年期间担任巴西的农业部长，美洲乙醇委员会的联执主席 (IEC)，吉杜里奥瓦加斯基金会农业综合企业中心 (GV Agro) 的协调员，圣保罗工业联合会 (FIESP) 的上级农业委员会的主席……担任享有盛誉的巴西农村社会和巴西

农商协会 ( Brazilian Rural Society and the Brazilian Agribusiness Association ) 的主席……在多个顾问委员会里代表着巴西农商界, 例如: 国家农业政策委员会, 国家货币委员会, 国家外贸委员会。他也主持国家农商论坛 ( the National Agribusiness Forum ) 。 <http://www.croptrust.org/content/the-board>

**罗觉果斯 / 孟山都 ( Rodrigues/Monsanto )** : 2003 年 7 月: 基因改造的大豆品种 ( 孟山都的 Bt / 草甘膦 ) 的使用, 在被禁止了 5 年之后, 将很快在巴西被合法化……巴西是农业出口大国中最后一个禁止使用基因改造技术的国家。但是, 巴西农业部长对此抱乐观态度: “参议院在 9 月份之前将基因改造技术的使用合法化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http://www.foodnavigator.com/Legislation/An-end-to-Brazilian-GMO-ban>

**罗觉果斯 / 先锋 ( Rodrigues/Pioneer )** : 杜邦最近在巴西坎皮纳斯 ( Campinas ) 举办的国家农商论坛上获得了农用化学和种子奖项。该奖项嘉奖对巴西可持续发展和农商业做出贡献的公司和机构。 <http://www2.dupont.com/media/en-us/news-events/october/recognized-for-commitment.html>

**罗觉果斯 / 先正达 ( Rodrigues/Syngenta )** : 收成增加项目 ( Harvest Plus Program ) , 生物强化, 巴西

### 洛克菲勒基金会 ( Rockefeller Foundation )

该基金会由约翰·洛克菲勒在 1913 年成立。它的慈善活动分为 5 个主要的领域: 医学、健康和人口科学; 农业和自然科学; 艺术和人文; 社会科学; 国际关系……农业是在 1928 年基金会重组中被加到自然科学领域的。1941 年基金会捐款给墨西哥从事玉米研究 ( CIMMYT ) ……其重要意图是稳定墨西哥政府, 阻止任何共产主义渗透的可能性, 以便保护洛克菲勒家族在墨西哥的投资。到了 1943 年, 这个项目……在玉米繁育科学和农学基本规律研究上如此成功, 被推广到其他拉丁美洲国家; 1956 年, 被推广到印度; 同样是, 是被用做地理政治的手段, 来对抗共产主义。到了 1959 年, 基金会的高级官员成功地联

合了福特基金会（后来还有美国国际开发署，后来而且只到现在，世界银行）签署了一份重要的慈善项目，那就是现在全世界都知道的：绿色革命……[http://en.wikipedia.org/wiki/Rockefeller\\_Foundation](http://en.wikipedia.org/wiki/Rockefeller_Foundation) (October 16, 2014)

**洛克菲勒基金会 /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Rockefeller Foundation/CGIAR）**：CGIAR 从 1960 年代开始发展演化，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全世界支持创建了多家机构，支持了多家作物研究中心。对 CGIAR 的塑造，是通过在意大利贝拉焦（Bellagio）洛克菲勒会议中心召开的一系列洛克菲勒关门会议所完成的。为了达到最大的影响力，CGIAR 把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和世界银行也都拉了进来……在慷慨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留学赞助下，CGIAR 搜罗第三世界的顶尖科学家和农学家，将这些人送到美国去“掌握”现代农商业生产的概念，为的是把这些概念带回本土国。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无价的网络，用来在众多国家进行美国的农商业推销，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推销基因改造作物的“基因革命”，而所用的名义上却是：科学、效率、自由市场农业。<http://www.globalresearch.ca/doomsday-seed-vault-in-the-arctic-2/23503>

**洛克菲勒基金会 / 绿色革命（Rockefeller/Green Revolution）**：耗资大约 6 亿美元，历时超过 50 年，绿色革命给全世界的许多国家带来了新的农耕技术，提高了生产力，增加了作物产量，也大幅度增加了化肥使用量。后来，它又投资 1 亿美元用于植物生物技术研究，并培训了超过 400 名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科学家。[http://en.wikipedia.org/wiki/Rockefeller\\_Foundation](http://en.wikipedia.org/wiki/Rockefeller_Foundation) (October 16, 2014)

### 先正达（Syngenta）

先正达公司是一家瑞士农业商业全球公司，经销种子和农用化学品。先正达参与了生物技术和染色体研究……先正达的大田作物包括杂交品种和基因改造品种，其中很多进入了食物链，成为转基因食品。

先正达和它的前身公司多年来被卷入了多起法律诉讼和有争议的事件。1960 年代，发

生了一系列由于误食公司生产的百草枯的致死事件……莠去津已经被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几个地区禁止使用，也被欧盟禁止使用……先正达为美国联邦候选人、党派和外围群体的捐款在 2012 年合计达到 267, 902 美元，排在同行业公司捐款数额的第 10 位……2011 年，先正达被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 DJSI）认定为世界范围内表现最好的化学公司之一。<http://en.wikipedia.org/wiki/Syngenta> (October 16, 2014)

**先正达 / 百草枯 (Syngenta/Paraquat) :** 先正达被伤害案件指控，其销售除草剂百草枯导致农业劳动力中毒和致死。百草枯被欧盟和瑞典禁止使用，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它对人体的毒害。因此，2012 年，公司被题名为最无良企业奖（Public Eye Award）。先正达公司控制专利种子市场份额的 9%，和农用化学品市场的 18%。(2009) [Who Will Control the Green Economy?, 2011, www.etcgroup.org](http://www.etcgroup.org)

**先正达基金会 (Syngenta Foundation) :** 产生了基金会的旗舰项目，农民支持小组 (the Farmer Support Team, FST) 。FST 是一个遍布菲律宾群岛的全国性的项目。该项目涉及到全国盛产水稻、水果和蔬菜的省份的农民。该项目通过培训来帮助菲律宾农民获得更多的知识，达到更高的生产力，培训内容包括：综合害虫治理（IPM）、综合作物管理 (ICM) 和完全作物管理 (TCM)……先正达基金会在 2005 年世界食品日报告会 (the World Food Day Symposium) 上发言，其发言被做为“千年生态系统报告” (the Millennium Ecosystem Report) 的一个成果。<http://en.wikipedia.org/wiki/Syngenta> (October 16, 2014)

**先正达 / 盖茨基金会 /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 (Syngenta/Gates Foundation/ CGIAR) :** 收成增加项目 (Harvest Plus Program) : 先正达基金会支持“收成增加挑战项目” (HarvestPlus Challenge Program) 来改善全球营养水平…… CGIAR 发起的“收成增加项目”是一个由研究机构和实施单位组成的交叉学科的全球联盟……“收成增加项目”关注提高穷人食用的主食的营养价值。这种生物强化技术使用传统杂交技术来培育富含矿物质和维生素的作物……2009 年，先正达基金会成为该项目的国际赞助方之一，其他赞助方包括：盖茨基金会、美国国际开发署、世

界银行、英国国际开发署。“收成增加项目”已经规划到了2013年。<http://www.syngentafoundation.org/index.cfm?pageID=525>

**先正达 / 先锋 (Syngenta/Pioneer)** : 与杜邦先锋种子子公司共享耐受玉米根虫特质 MIR604 (Agrisure) 的专利, 2011年1月1日 <http://www.syngenta.com/global/corporate/en/news-center/news-releases/Pages/en-101214.aspx>

---

### 全球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 / 其他 GCDT 董事会成员 (The Global Crop Diversity Trust, GCDT)

**曼加拉·莱伊博士 (Dr. Mangala Rai)**, 印度农业研究和教育处秘书长 (Secretary of India'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DARE)

**约翰·洛维特 (John Lovett)**, 澳大利亚, 国家植物生物安全合作研究中心主席 (Chairperson of the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re for National Plant Biosecurity), 先正达粮食基因董事会 (grain-gene board) 主席

**克劳斯·托菲尔 (Klaus Töpfer)**, 德国, 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前总裁, 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副秘书长

**Modibo Tiémoko Traoré**, 马里, 马里农村发展部前部长, 联合国粮农组织助理秘书长, 分管农业和消费者保护处

**彼得·克兰爵士**, 英国, 克佑区皇家植物园前主任

**易卜拉欣·阿萨·玛雅希 (Ibrahim Assane Mayaci)**, 塞内加尔外交部长, 达喀尔农村中心 (Rural Hub, Dakar) 成员

**沃尔特·富斯特 (Walter Fust)**, 瑞士, 瑞士驻外大使, 长期从事外交工作。

<http://www.croptrust.org/content/who-we-are>

## 第三章 种子霸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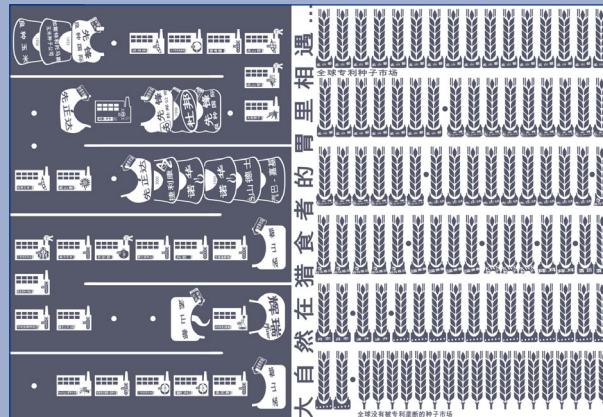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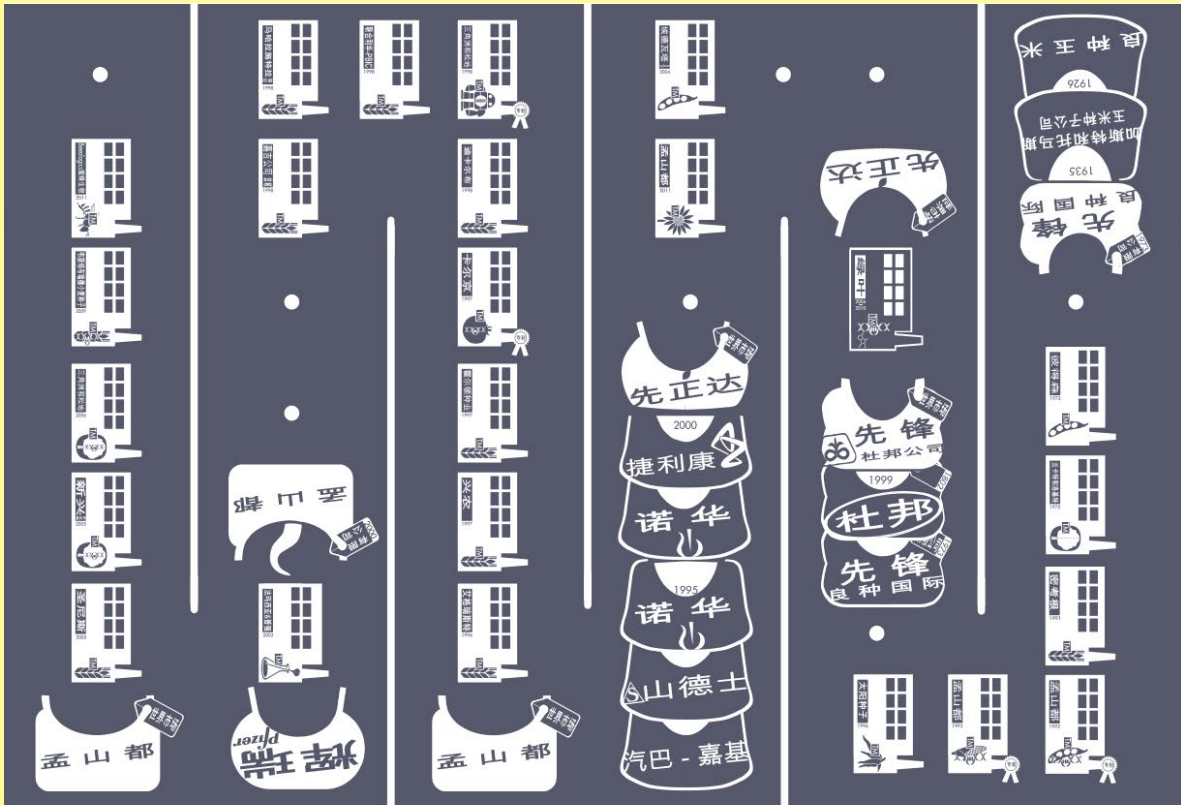


图 IV \_ 大自然在猎食者的胃里相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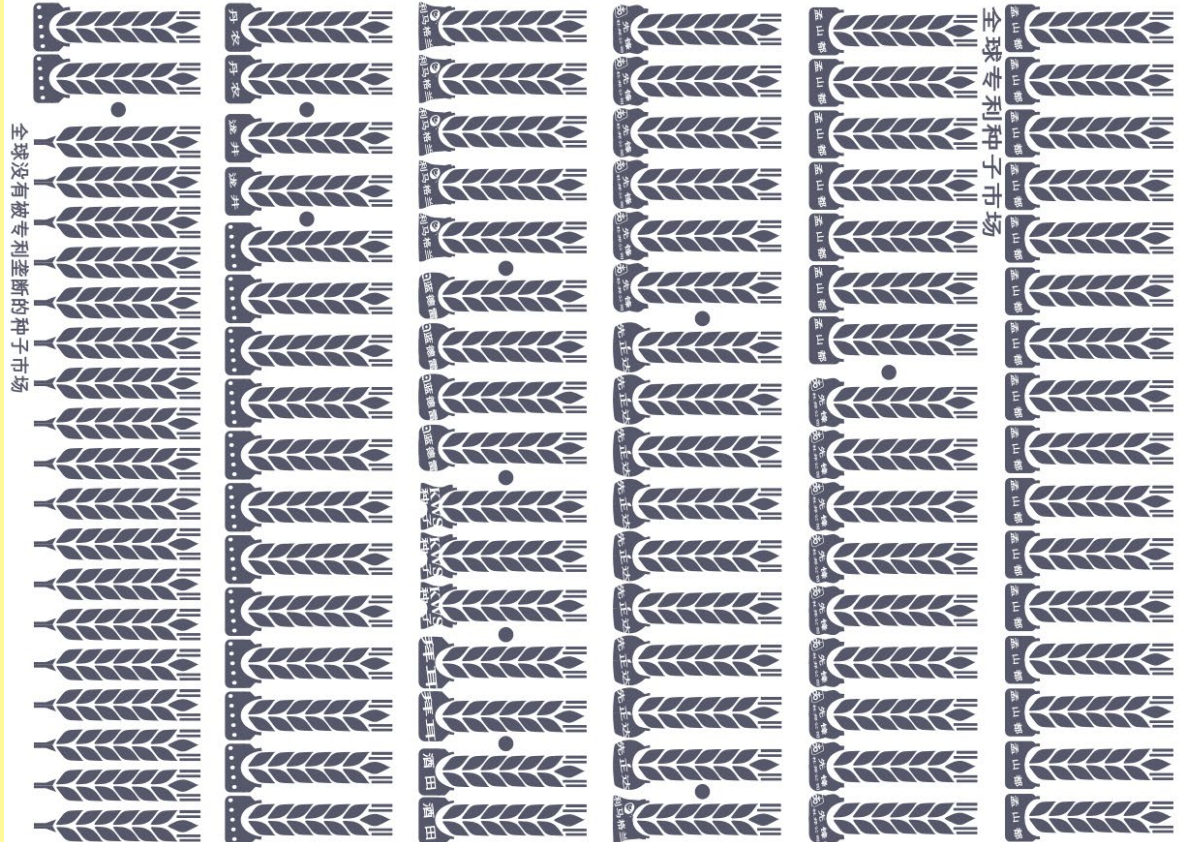
掠夺者会竞争和消融彼此，也会联合以便更加强大。而这样做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掠夺。这一部分，详细回顾了孟山都公司、杜邦公司和先正达公司的发展史。而这三家公司就控制了全球超过一半（53%）的商业种子市场。

图中，手提包和胃形象地融为一体。那些长方形的厂房代表的是公司的产品，也就是说，这些公司没有被吞噬，而只是出卖自己的产品。那些和底色同色的胃是已经被其他胃消化了的公司，那些白色的胃是吞并了其他公司的胜利者。

这张麦穗图是最简洁而有说服力的一张图。全世界可食用的种子资源几乎都被这 10 大种子控制了。杂交品种的种子必须年年购买，这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支出，而且杂交品种作物如果想获得高产必须配合使用大量的化肥和农药，这样既污染了土壤也伤害了农民和消费者的健康。转基因种子都是有专利的，专利所有者不允许农民进行繁育，而且还通过基因手段进行控制。控制了粮食不仅占领了胃，而且控制了所有的人。



# 大自然在猎食者的胃里相遇...



全球没有被专利垄断的种子市场

全球专利种子市场

图 IV



## 大自然在猎食者的胃里相遇

“在食肉动物的胃里，大自然提供了一个联合战场，面临被溶解的严峻考验，器官与各种动物物种相连”，马克思在他的关于森林使用法规的第一篇文章的概述里写了上述文字，并在 1842 年递交给了莱茵议会（Rheinische Landtag）。旧的封建使用权，如：森林和浆果采集，被修改为农村贵族的新的财产权。这个概述文字是给贵族代表们看的，那些人虽然因为贪婪而联合在一起，但是又疑心重重地监视着谁可以从这个法规中获得最大的好处。Karl Marx: Debates on the Law on Thefts of Wood, 1842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download/Marx\\_Rheinische\\_Zeitung.Pdf](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download/Marx_Rheinische_Zeitung.Pdf)

2009 年世界排名前 10 位的种子公司（World Top 10 Seed Companies, 2009）

种子销售	美元 US\$	市场份额
孟山都（Monsanto）	72 亿	27%
杜邦（先锋）DuPont(Pioneer)	46 亿	17%
先正达（Syngenta）	26 亿	9%
利马格兰（limagrain）	13 亿	5%
蓝德雷（Land O' Lakes）	11 亿	4%
KWS AG	9 亿	4%
拜尔（Bayer Crop Science）	/	/
酒田（Sakata）	约 500 万	<2%
丹农（Takii）	约 500 万	<2%
泷井（DLF-Trifolium）	约 500 万	<2%

前 3 位的公司就控制了全球超过一半（53%）的商业种子市场。Who Will Control the Green Economy?, 2011, [www.etc.group.org](http://www.etc.group.org)

## 孟山都 (Monsanto)

经过一系列的交易后，1901 年至 2000 年所存在的孟山都，和现在的孟山都，在法律上其实是两家不同的公司。虽然它们仍使用同一个名字和公司总部，很多高级管理人员和雇员仍然在此工作，并同样承担因为工业化学品业务活动而引起的法律责任。农业化学业务是唯一一个从前 1997 孟山都公司延伸至今的一个领域。这要追溯到 1980 年代：

**1985 年：**孟山都花 27 亿美元现金购买了 G.D. 塞尔公司 ( G.D.Searle & Company ) 。这次并购，塞尔公司的阿斯巴甜 ( aspartame ) 业务成为一家独立的孟山都子公司，称为纽特阿斯巴甜公司 ( the NutraSweet Company ) 。纽特公司总裁罗伯特 B. 夏皮罗 ( Robert B. Shapiro ) ，后来在 1995 年到 2000 年担任孟山都公司的总裁。

**1996 年：**并购了 Agracetus 公司，以及发明风味番茄 ( Flavr Savr ) 的卡尔京公司 ( Calgene ) 的大部分的股权和迪卡尔布遗传学公司 ( DeKalb Genetics Corporation ) 40% 的股权。并在 1998 年购买了迪卡尔布遗传学公司的其余股份。( 也购买了印度最大的种子公司的部分股份。购买了拉丁美洲和中美洲的嘉吉国际种子公司，Cargill international seed corporations ) 。

**1997 年：**孟山都在伊利诺伊斯州和阿拉巴马州的工厂为了生产多氯联苯 ( PCBs ) ，而对那里的土地造成了污染，于是孟山都将化学工业品和纤维制品部门分拆出来，成为首诺公司 ( Solutia Inc ) ，以将所应负的赔偿责任转移到这间公司。1 月份，孟山都宣布购买霍尔登家族基础种子公司 ( Holden' s Foundations Seeds ) ，是一家私人种子公司。通过购买霍尔顿，孟山都公司成为美国最大的生产玉米种源的公司，种源是培育杂交育种的亲本。这些并购一共花费了 9 亿 2 千 5 百万美元。而且，在 4 月份，孟山都又购买了卡尔京公司的其余股份。

**1999 年：**孟山都抛售了纽特公司和 2 家其他公司。12 月份，孟山都与法玛西亚 - 普强公司 ( Pharmacia & Upjohn ) 兼并，其农业部门成为“新”法玛西亚公司的附属公司；孟山都的医学研究部门，包括例如西乐葆 ( Celebrex ) 产品，被合并到法玛西亚公司里。

2000年(10月)法玛西亚公司(Pharmacia)剥离了它的孟山都附属公司成立了一家“新孟山都公司”。做为交易的一部分,孟山都同意负责赔付给法玛西亚公司任何首诺公司(Solutia Inc)应该承担的法律费用。结果,“新孟山都”继续被卷入无数与就孟山都公司相关的法律案件。(2002年,辉瑞公司,Pfizer,宣布收购法玛西亚公司,并在2003年完成收购。)

**2005年:**孟山都收购新兴遗传学公司(Emergent Genetics)和它的斯通维尔(Stoneville)和新一代(NexGen)棉花品牌。新兴公司是美国第三大棉花种子公司,占据着全美12%的市场。孟山都的目标是“获得棉花种质和特质的战略地位”。(2005年2月,新兴遗传学公司)

**2007年6月,**孟山都花费15亿美元完成了对三角洲和松地公司(Delta and Pine Land Company)的收购,该公司是一家大型棉种繁育公司。司法部同意这次收购的前提是,孟山都出让其斯通维尔(Stoneville)棉花业务,卖给拜尔公司(Bayer);出让其新一代棉花业务,卖给了美棉公司(Americot)。11月份,孟山都也从生猪繁育领域退出,将孟山都选择遗传学公司卖给了纽绅选择遗传学公司(Newsham Choice Genetics),出让了“其与生猪相关的所有专利、专利申请和其他知识产权”。

**2008年:**孟山都花费5亿4千8百万美元收购了荷兰德鲁特种子公司(De Ruiter Seeds),将其中牛生长激素保饲(POSILAC)品牌和相关业务以3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礼来公司(Eli Lilly)动物保健部(Elanco Animal Health),并附加了一些“不可预见的考虑”。(2009年7月,WestBred:转基因小麦)

<http://en.wikipedia.org/wiki/Monsanto> (October 16, 2014)

## 先锋良种公司 / 杜邦先锋 (Pioneer Hi-Bred/DuPont Pioneer)

**1924年,**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开始销售“铜交叉”(Copper Cross),是第一个商用玉米杂交种子。

**1926 年**，玉米良种公司在得梅因（Des Moines）成立，注册资本 7,000 美元。

**1931 年**，罗斯韦尔·加斯特（Roswell Garst）同意生产和下发种子。接下来的一年，加斯特伙伴（Garst partners）和查尔斯·托马斯（Charles Thomas）共同组建了“加斯特和托马斯玉米种子公司”（Garst and Thomas Seed Corn Company）。

**1935 年**，“先锋”被加到了公司名称上，以便和其他杂交种子公司相区别，全名是“先锋玉米良种公司”（Pioneer Hi-Bred Corn Company）。

**1936 年**，先锋公司创建了海兰家禽农场（Hy-Line Poultry Farms）（后来的海兰国际），生产杂交产蛋鸡（hybrid egg-laying chickens）。亨利·B·华莱士（Henry B Wallace）（Henry A Wallace 的儿子）担任海兰公司的主席，一直到 1975 年……

**1970 年**，公司的名字改为先锋国际良种公司（Pioneer Hi-Bred International, Inc.）

**1973 年**，成为上市公司（publicly traded company）。

**1973 年**，先锋公司收购了彼得森种子公司（Peterson Seed Company），获得了一条大豆加工线。

**1975 年**，收购兰卡特和洛基特公司（Lankhantt and Lockett companies）（棉花种子业务）。

**1977 年**，先锋收购了微生物产品（Microbial Products），用以开发细菌菌株用于给青贮饲料进行接种。

**1978 年**，海兰国际公司被剥离出来。

**1981 年**，先锋公司成为南美洲玉米销售中占领市场份额最大的公司。

**1982 年**，年销售额超过 1 千万美元。

**1991 年**，先锋公司购买了密考根种子公司（Mycogen Seeds）2 百万美元的股票，成为合作伙伴，共同开发玉米、高粱、大豆、油菜和向日葵的 Bt 抗虫性，还有其他种子。先锋公司在 1998 年卖掉了股份。先锋公司成为南美大豆的第一品牌。

**1992 年**，先锋公司支付给孟山都 45 万美元获得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种子的专利。

**1993 年**，先锋公司支付 3 千 8 百万美元给孟山都，获得了可以耐受欧洲玉米钻蛀虫的 Bt 抗虫玉米专利。

**1996年**，先锋公司购买了太阳种子（Sunseeds Co.）20%的股份（生产杂交蔬菜种子）

1997年，杜邦购买了先锋的20%股份，两家公司共建了一家合资公司，称为：优质粮食责任有限公司（Optimum Quality Grains LLC）。

**1999年**，杜邦公司用77亿美元购买了先锋公司其余的80%的股份。

**2006年**，杜邦和先正达宣布成立绿叶遗传学公司（Greenleaf Genetics），是一家合资企业，销售种子的遗传和生物技术物质。

**2010年**，杜邦和先正达终止合作，绿叶遗传学公司成为先正达独家所有的公司。

**2012年**，先锋公司宣布将企业名称改为：杜邦先锋。

**2012年**，发生了一起法律纠纷案件，200名居住在考爱岛威美亚湾（Waimea, Kauai）的居民，就农药和药尘问题起诉了杜邦公司的先锋良种国际公司。

[http://en.wikipedia.org/wiki/Pioneer\\_Hi-Bred](http://en.wikipedia.org/wiki/Pioneer_Hi-Bred) (October 16, 2014)

## 先正达（Syngenta）

先正达于2000年成立，由诺华农产品公司（Novartis Agribusiness）和捷利康农药公司（Zeneca Agrochemicals）合并而成……诺华公司是在1995年由3家瑞士公司合并而成：嘉基公司（Geigy）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76年；山德士实验室（Sandoz Laboratories）于1876年成立；汽巴公司（Ciba）成立于1884年。汽巴公司和嘉基公司在1971年合并，主要致力于农业领域的植保业务，山德士更集中在种子方面。捷利康农药是阿斯利康公司的一部分，前身是帝国化学企业（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 ICI），ICI于1926年成立于英国……2004年，先正达种子子公司收购了加斯特公司（Garst），埃德瓦塔公司（Advanta）的北美的玉米和大豆业务，还有嘉禾种子子公司（Golden Harvest Seeds）……2005年，先正达公司抵制了瑞士对基因工程有机组织的禁令……先正达资助了先正达基金会的可持续农业。<http://en.wikipedia.org/wiki/Syngenta> (October 16, 2014)

## 第四章 制造灾难和生产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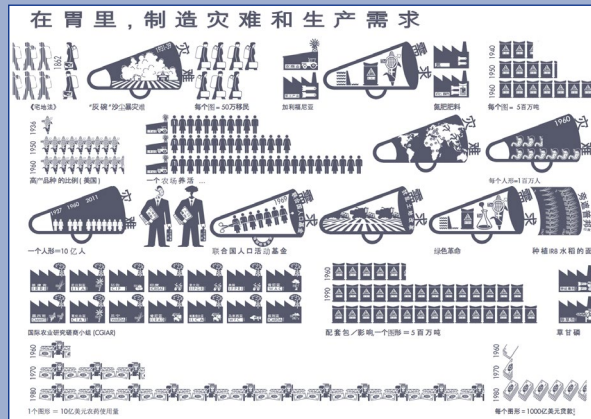


图 V \_ 在胃里，制造灾难和生产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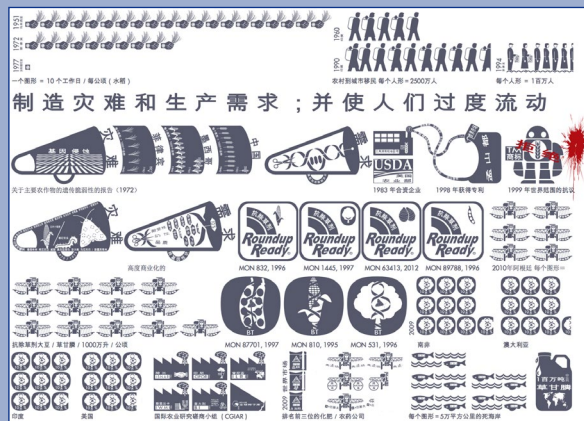


图 VI \_ 制造灾难和生产需求，并使人们过度流动

过去的 60 年间，世界的粮食亩产是大幅度提高了的。这从世界粮食总产量和世界耕地面积的变化可以推断出来。1950 年世界人口约 15 亿，世界粮食产量 6.3 亿吨。人均占有耕地面积 0.51 公顷。2010 年世界人口 67 亿，世界粮食产量 22.8 亿吨。人均占有耕地面积 0.26 公顷。也就是说，从 1950 年到 2010 年，世界粮食产量增加了 3.6 倍，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了 1 倍，说明了世界粮食平均亩产增加了大概 7 倍。这样的粮食产量增加，基础设施的改善、科技的进步和品种的改良都起到了作用。但是，非常严峻的是，农业生产方式已经越来越不可持续，这包括：单一作物种植所导致的大范围和无法控制的病虫害，病虫害增加所带来的过度使用农药，为了提高产量而大量使用化肥，化肥导致土壤肥力下降从而不得不使用更多的化肥的恶性循环。

这里，我们想要批判和反思的是，种子公司和农化品公司在世界危机和挑战面前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动机是什么？60 年来，人口增长是全球的挑战之一，因为人口增长意味着粮食需求量的增长。在应对这个挑战过程中，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角色。“‘绿色革命’是英明的洛克菲勒的家族计划，开发一个他们可以垄断的全球化的农商业，就如同他们在半个世纪以前对世界石油的垄断一样。就如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 1970 年代所宣称的，‘如果你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所有人。’农商业和洛克菲勒绿色革命齐头并进。他们是一个宏大战略的组成部分，这包括了后来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植物和动物的基因工程的开发。”保持杂交水稻高产就要大量使用化肥，尤其是氮肥。而追溯氮肥的生产可以明白“制造灾难和生产需求”的意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已经建设了 10 座大型硝酸盐工厂用来制造炸弹。因为欧洲和日本生产设备都遭到毁坏，美国成为战后无可争议的生产的氮的冠军。这些企业迅速从军工企业转型到生产肥料，瓦茨拉夫·斯米尔（Vaclav Smil）写道，受到杂交玉米播种面积上升的拉动，国内对氮肥的需求猛涨；“粮食高产依赖使用更多的化肥。”转基因玉米的种植和草甘膦的使用是配套的。1974 年，孟山都获得草甘膦的专利，是植物毒素的一种。“现在有 4 种源于二战神经毒气的农药被用于农业生产：杀扑磷、砒吸磷、甲胺磷、灭克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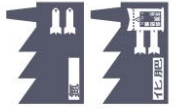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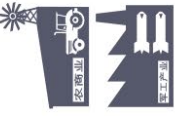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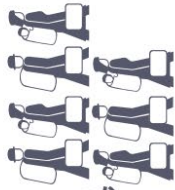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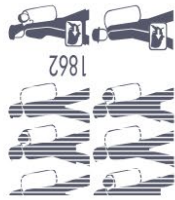
图五完整展示了：大资本和政客们一起：“制造灾难 - 通过提供解救灾难而制造需求 - 制造更大的灾难 - 实现控制”这一过程。比如，图中第一行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862年，白人移民驱赶杀戮原住民，霸占了美洲大地，由于白人对待土地的掠夺式耕种方式，导致了土地严重沙化，导致了1931年到1939年的多起沙尘暴，导致大批移民外迁。对粮食产量的需求也因此增加。制造了对农业技术的需求，包括：灌溉、化肥和杂交品种，美国化肥使用量从1940年的1460万吨达到1960年的3400万吨，杂交玉米品种覆盖率从1936年的0.1%达到了1960年的96.3%。

生态系统丧失多样性和作物品种单一都会导致环境灾难和粮食生产的极度脆弱性。由于绿色革命和转基因作物的大面积推广，作物品种大幅度减少。比如：（1）中国小麦品种：1940年：10,000个；1970年：1,000个小麦品种；（2）菲律宾水稻品种：1940年：6,000个；1980年：1个水稻品种；（3）墨西哥玉米品种：1940年：10,000个；1998年：2,000个玉米品种。孟山都开发和销售转基因的农用种子，可以制造晶体杀虫蛋白（称为Bt毒素）。Bt转基因棉花品种在1996 - 2009年的采用率：澳大利亚95%；布基纳法索29%；中国60%；印度89%；南非98%；美国88%。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制造了一个自杀经济（suicide economy）：印度自杀率最高的地区是马哈拉施特拉邦的Vidharbha，每年4000人自杀，平均每天10个人。这个邦也是孟山都转基因Bt棉种子面积最大的邦。通过把种子由可再生资源变成不可再生的投入，结果每年必须高价购买种子。以前的棉花种子价格是7卢比 / 公斤。Bt棉种子的价格是17000卢比 / 公斤。传统棉花品种可以和粮食作物套种，Bt棉只能单一种植；传统棉种是雨养作物，而Bt棉需要灌溉；传统棉种可以抗虫，Bt棉虽然被推销为抗棉铃虫，但是却带来了其他新害虫，为了控制这些新害虫，农民不得不比以前多喷洒13次农药。还有，孟山都都在出售其转基因棉种的时候，欺骗说每英亩每年可以收获1500公斤棉花，而其实农民平均只收获300到400公斤。高投入和靠不住的产出制造了债务陷阱和自杀经济。

图六是图五的继续。图五是绿色革命的时代，图六到了转基因的时代，转基因作物所产生的农业生产方式，不仅直接伤害人的健康，而且给农业生态系统和环境造成巨大伤害。



# 在胃里，制造灾难和生产需求



《土地法》

'灰碗'沙尘暴灾难

加利福尼亚

氮肥肥料

每个图 = 5百万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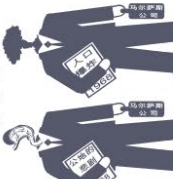
高产品种的比例(美国)

一个农场养活...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

每个人形=1百万人

每个人形=1百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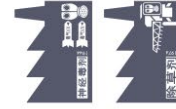


一个人形=10亿人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

绿色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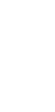
种植IR8水稻的面积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 (CGIAR)

配套包/影响, 一个图形 = 5百万吨

卓甘磷



1个图形 = 10亿美元农药使用量

每个图形 = 1000亿美元贷款

## 在胃里，制造灾难和生产需求

---

###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 (CGIAR)

在 1943 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墨西哥政府为绿色革命埋下了种子，它们设立了“专门研究办公室”（the Office of Special Studies），后来在 1963 年成为国际玉米和小麦改良中心（CIMMYT）。CIMMYT 和国际水稻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IRRI，于 1960 年在菲律宾成立），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资助，开发高产、抗灾品种，大幅度提高这些主食谷物的产量。

1970 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提议成立一个全球农业研究中心网络，并常设一个秘书处。这一提议得到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支持，这样，CGIAR（Consortium of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 Centers）于 1971 年 5 月 19 日成立，来协调国际农业研究，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和实现粮食安全……到 1983 年，全球已经有 13 家在其旗下的研究中心。名单如下：

**国际水稻研究所**，1960 年成立，位于菲律宾

IRRI –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Los Baños, Philippines, 1960;

**国际玉米和小麦改良中心**，1966 年成立，位于墨西哥

CIMMYT – International Maize and Wheat Improvement Center, Mexico, 1966;

**国际热带研究所**，于 1967 年成立，位于尼日利亚

IITA –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Tropical Agriculture, Ibadan, Nigeria, 1967;

**国际热带农业中心**，于 1968 年成立，位于哥伦比亚

CIAT – Centro Internacional de Agricultura Tropical, Cali, Colombia, 1968;

**国际马铃薯中心**，成立于 1971 年，位于秘鲁

CIP – Centro Internacional de la Papa, Lima, Peru, 1971;

**西非水稻发展协会**，成立于 1971 年，位于贝宁

WARDA – West Africa Rice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Cotonou, Benin, 1971;

**国际干旱地区农业研究中心**，成立于 1978 年，位于黎巴嫩

ICARDA –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 the Dry Areas, Beirut, Lebanon, 1978;

**国际半干旱热带作物研究所**，成立于 1972 年，位于印度

ICRISAT – International Crop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Semi-Arid Tropics, Hyderabad, India, 1972;

**国际动物疾病实验室**，成立于 1973 年，位于肯尼亚

ILRAD – International Laboratory for Research on Animal Diseases, Nairobi, Kenya, 1973;

**国际植物遗传资源研究所**，成立于 1974 年，位于意大利

IPGRI – International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Institute, 1974, Rome Italy;

**国际非洲畜牧中心**，成立于 1974 年，埃塞俄比亚

ILCA – International Livestock Center for Africa, Addis Ababa, Ethiopia, 1974;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成立于 1975 年，位于美国华盛顿

IFPRI –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USA, 1975;

**世界渔业中心**，成立于 1977 年，位于马来西亚

WFC – World Fish Center, Penang, Malaysia, 1977;

**世界农林中心**，成立于 1978 年，位于肯尼亚

WAC – World Agroforestry Centre, Nairobi Kenya, 1978.

<http://en.wikipedia.org/wiki/CGIAR> (October 16, 2014)

## 信贷洪水 (Credit Flood)

**1961 年** – 约 200 亿美元; **1971 年** – 约 700 亿美元; **1980 年** – 约 5600 亿美元

**第三世界信贷** – 10 亿美元

1970s 初，彻头彻尾的信贷洪水接踵而来，一年的信贷就增加了 200%，债权国几乎不去做任何充分的风险评估。1961 年，第三世界的外债达到大约 200 亿美元；1971 年达到约 700 亿；1980 年达到约 5600 亿。1973 年油价的大幅度攀升更加快了北方国家向外出债，然后当然是南方国家借钱了……。也就是说，当北方国家希望投资从高油价中挣得的富裕资本的时候，正是南方国家因为要支付更高的油钱而有很高的借贷需求的时候。

伴随着 1974 / 75 年的经济萧条，外债有了进一步的功能：就是说，还是为了刺激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经济增长。借贷的双边所签订的协议一方面是与贸易协议挂钩的，要求借方用借到的钱来购买债权国的工业产品和武器；另一方面，债务国不得不接受那些条款，把本国的自然资源和基本工业产品放进自由市场里。这样，南方国家之间就立刻产生了对出口市场的直接竞争，立刻导致预期中的自然资源价格的下跌，也就导致了北方国家进口成本的下降。由于无法（这本来就被算计好的）通过提高出口数量来增加收入，使得南方国家根本就无法还清债务。[http://www.schoener-leben-goettingen.de/Materialien/Publikationen/HTM/slg\\_1\\_sept00\\_T2.htm](http://www.schoener-leben-goettingen.de/Materialien/Publikationen/HTM/slg_1_sept00_T2.htm) (transl. Karl Hoffmann)

### 需求：绿色革命 (Demand: Green Revolution)

第一次使用“绿色革命”这个词的是美国国际发展署前署长威廉·高德 (William Gaud)，那是在 1968 年，他注意到了新技术的传播：“在农业领域的这些和其他的发展，包含着一个新革命的形成。不是像苏维埃的那种暴力的‘红色革命’，也不是像伊朗沙哈 (Shah) 的那种‘白色革命’。我称它为‘绿色革命’。”[http://en.wikipedia.org/wiki/Green\\_Revolution](http://en.wikipedia.org/wiki/Green_Revolution) (October 16, 2014)

“革命”这个词用得很得当，因为到了 1970 年代，新种子 - 伴随着化肥、农药，还有灌溉 - 已经取代了第三世界成千上万农户的传统农作方式。到了 1990 年代，大概 75% 的亚洲水稻产区都已经采用了新品种。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大概半数的非洲小麦产区，和超过一半的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小麦产区，还有 70% 的世界玉米。总之，估计第三世界

的 40% 的农民使用绿色革命的种子，在亚洲最普及，然后是在拉丁美洲。[http://www.iatp.org/files/Lessons\\_from\\_the\\_Green\\_Revolution\\_Do\\_We\\_Need\\_N.htm](http://www.iatp.org/files/Lessons_from_the_Green_Revolution_Do_We_Need_N.htm)

“绿色革命”是英明的洛克菲勒的家族计划，开发一个他们可以垄断的全球化的农商业，就如同他们在半个世纪以前对世界石油的垄断一样。就如同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 1970 年代所宣称的，“如果你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所有人。”农商业和洛克菲勒绿色革命齐头并进。他们是一个宏大战略的组成部分，这包括了后来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植物和动物的基因工程的开发。<http://www.globalresearch.ca/doomsday-seed-vault-in-the-arctic-2/23503>

**需求：灌溉、化肥、杂交种**

**(Demand: Irrigation, Fertilizer, Hybrid Seed)**

氮肥使用量	杂交种 - 先锋良种 美国使用的百分比	一个农场可以养活
1940 年：1460 万吨	1936 年：0.1%	1940 年：11 人
1950 年：2200 万吨	1940 年：90%	1950 年：15 人
1960 年：3400 万吨	1960 年：96.3%	1960 年：26 人

Agrium: Sustaining a Growing World, 80 Years of Evolution in North American Fertilizer and Agriculture, <http://mawrc.org/downloads/AgriumAnniv2012-Dowbenko.Pdf>

从“风沙侵蚀”中学到的教训主要是：需要化肥、杂交种和灌溉项目。

做为“新政”（New Deal）计划的一部分，议会在 1936 年通过了“水土保持和国内分配法”……政府部门也开始就水土保持和抗水土流失技术对农民进行教育，包括作物轮作、带状栽培、等高耕种、修造梯田，和其他农作方式的改善。[http://en.wikipedia.org/wiki/Dust\\_Bowl](http://en.wikipedia.org/wiki/Dust_Bowl) (October 16, 2014)

严重的旱灾……显示了以前未被认可的杂交玉米品种的抗旱性。这种生态韧性激励了一些农民使用杂交品种，尽管在平常的年份杂交品种并没有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对气候变化的反应产生了压倒式的影响。1937 和 1938 年杂交种销售量的增加，给私人种子公司提供资金来进行新品种的研究，这些新品种在平常年份也表现出了显著的高产量……1932 年就开始了大面积的市场销售……美国农业部在 1933 年就开始跟踪新品种的采用情况。那个时候，美国只有 0.1% 的玉米种植产区使用新品种。1936 年，美国农业部宣布，采用杂交玉米品种，可以大幅度提高玉米产量……然而，还是经过了 10 年，杂交玉米的播种面积才覆盖了 70% 的玉米产区。到了 1963 年，96.3% 的耕地都使用了杂交品种……一个杂交后表现的特质是改善植物吸收氮肥的能力，而且，的确，需要去满足杂交品种所要求的化肥使用量。Richard Sutch: *The Impact of the 1936 Corn-Belt Drought on American Farmers' Adoption of Hybrid Cor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Draft of January 6, 2010

### 需求：人口控制 (Demand: Population Control)

---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是联合国一个所属机构。基金会的工作是去促进让每个妇女、男性和儿童拥有享受健康生活和平等机会的权力。这是通过大型的国家人口调查，和人口普查……他们的工作包括改善生育健康……基金会在 1969 年开始运作，那时候是“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归“联合国发展基金会”管理。1971 年，直接隶属于联合国大会……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被多家机构指控，因为它支持了强制堕胎和强制绝育的政府项目……（例如）基金会在 1990 年代中期支持了秘鲁的人口控制项目，当时发现，秘鲁人口项目中涉及了强制绝育……基金会支持了中国政府的项目，其中包括强制堕胎和强制绝育……

[http://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Nations\\_Population\\_Fund](http://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Nations_Population_Fund) (October 16, 2014) <http://www.infowars.com/depopulating-the-third-world-un-sterilization-campaigns-in-developing-countries-accelerating/>

## 需求：扰乱土地改革 (Demand: Undo Land Reform)

---

有重要证据表明，绿色革命削弱了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比如，在印度、墨西哥和菲律宾，技术方案被做为替代方案，进而扩展到农村改革，而单纯的后者往往被与社会主义政治相联系。[http://en.wikipedia.org/wiki/Green\\_Revolution](http://en.wikipedia.org/wiki/Green_Revolution) (October 16, 2014)

财产再分配（在世界的很多国家）发生：1952 年的玻利维亚，1960 年的智利，1966 年的哥伦比亚，1959 年的古巴，1954 年的危地马拉，1950 年的秘鲁，1953 年 - 1956 年的越南，1950 年的南韩，1960 年代的菲律宾等。1949 年，当中国共产党开始执政，美国政府的最高层就开始对土地改革做出评论，认为是最不可以接受的做法。1960 年代初，美国对所谓“共产主义暴动”主要采取军事行动，和经济和技术援助……“马尔萨斯人口和粮食威胁论”（The Malthusian fears）推动了绿色革命，并使土地改革陷入停顿，甚至在世界很多地方逆转了土地改革。[Kilusang Magbubukid ng Pilipinas: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on IRRI, and Its Impact on Asian Agriculture," in: The Great Rice Robbery, A handbook on the impact of IRRI in Asia; Pesticide Action Network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7](#)

## 沙尘暴灾难，1931-1939 (Disaster Dust Bowl, 1931 - 1939)

---

“尘暴的时代”是 1930 年代期间发生的几次严重的沙尘暴的时期，破坏了美国和加拿大草原的生态和农业；导致灾难的原因是严重的干旱和防止风沙侵蚀的旱地农业耕作方法的失败……快速的农业机械化……导致农民决定把贫瘠的草地开垦成耕地。干旱和沙尘暴侵蚀了 1 亿英亩（4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主要集中在德克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

州……尘暴时代的迁移使美国历史上在一段并不长时间之内发生的一次人口最大的迁移。在 1930 年到 1940 年间，大概 350 万人牵出了那些地区……一年之内，8 万 6 千人迁入了加利福尼亚州。[http://en.wikipedia.org/wiki/Dust\\_Bowl](http://en.wikipedia.org/wiki/Dust_Bowl) (October 16, 2014)

移民的农民大都去了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在那里的大型果园和军工企业里工作。战争结束时，估计洛杉矶生产了美国战时生产量的 17%。<http://faculty.washington.edu/gregoryj/dust%20bowl%20migration.htm>

### 灾难：第三世界的饥饿 (Disaster: Hunger in the Third World)

---

1976 年，两位世界的银行经济学家出版了一本书，书中估计，发展中国家的超过一半的人口，大约 8.4 亿人，在 1960 年代处于营养不良状态，比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的数字还高。Poleman 教授做了分析，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很难量化发展中国家的营养状况，并且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食物产量倾向于被低估，税收与产量对应，但是，庭院生产是自我消费，所以不会被计算在内。<http://www.nytimes.com/1981/10/05/business/food-and-hunger-statistics-ques-tioned.html?pagewanted=all>

### 灾难：人口炸弹 (Disaster: Population Bomb)

---

人口炸弹 - 成 10 亿的增长

**1804 年** :10 亿人口 - **1960 年** :30 亿人口 - **1987 年** :50 亿人口 - **2011 年** :70 亿人口

Voice Of The People (Canada): THE POPULATION BOMB - BY THE BILLIONS, votp.blogspot.com, October 6, 2010

《人口爆炸》是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欧利希和他妻子安娜·欧利希（但是安娜的贡献并没有得到认可）1968 年出版的著作，成了热销书。书中警告，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发生了大面积的饥荒，这是由于人口过度增长和其他社会动乱所导致，倡议尽快采取行动



来限制人口增长。书名借用了威廉·德雷伯的话（并得到他的同意），威廉是人口危机委员会（Population Crisis Committee）的创始人……欧利希认为，联合国应该在控制人口中起领导作用……为了防止诸如弄虚作假和种族歧视的指控，联合国应该在减少人口的行动中起领导作用。欧利希提出了这样的想法，在水和主食中加入“短效避孕药”（temporary sterilants）……对于那些有能力施行人口控制的国家，和将来可以保证自给自足的国家，才继续提供粮食援助。……他提到，他支持印度政府强制执行的针对已经育有3个及以上孩子的男子施行绝育手术的措施。[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Population\\_Bomb](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Population_Bomb) (October 16, 2014)

## 加勒特·哈丁：1968，大众的灾难（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1968）

哈丁关注人口增长、地球自然资源的使用和福利国家……父母过度生育使得给后代的东西更少，无法给每个孩子足够的供给。这种负面状况可以在动物王国中发现……哈丁责备福利国家允许这种大众悲剧的发生，因为福利国家把供养孩子和过度生育看作是一种基本人权。[http://en.wikipedia.org/wiki/Tragedy\\_of\\_the\\_commons](http://en.wikipedia.org/wiki/Tragedy_of_the_commons) (October 16, 2014)

## 草甘膦（Glyphosate）

**草甘膦世界范围的使用量：**2010年，大约1百万吨

在第三世界造成大约4万人中毒

25%被禁止的农药还在出口

<http://www.epa.gov/oppfead1/international/trade/>

1974年，孟山都获得草甘膦的专利，是植物毒素的一种。“现在有4种源于二战神经毒气的农药被用于农业生产：杀扑磷、砒吸磷、甲胺磷、灭克磷。”<http://www.worldfuturefund.org/Projects/greenrevolution7.html>

环保组织和农业工人倡导份子起诉了环境保护署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 , 提出, 应该禁止使用从二战时期神经毒气成份中提取的四种农药: 杀扑磷、砒吸磷、甲胺磷、灭克磷。“它们有剧毒, 通过阻断胆碱脂酶的合成而导致人类和野生动物的( 神经 ) 系统疾病, 胆碱脂酶是一种酶, 是神经传导所必需的。胆碱脂酶阻断的症状包括: 肌肉痉挛、意识模糊、晕眩、失去知觉、癫痫、腹部痉挛、呕吐、腹泻、停止呼吸、瘫痪和死亡。严重的中毒也可以导致慢性病, 包括: 永久性神经损坏、丧失智力和其他神经系统行为疾病。” Time to Stop Using Nerve Gas on Farms? – The Daily Green [http://www.ecochem.com/t\\_news.html](http://www.ecochem.com/t_news.html)

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 全球大概有 400 处沿海“死亡带”, 总面积达到 24.5 万平方公里。这些地方的海水如此缺氧, 没有生物可以存活。元凶就是: 化肥排入。Who Owns Nature? Corporate Power and the Final Frontier in the Commodification of Life, November 2008, [www.etcgroup.org](http://www.etcgroup.org)

草甘膦的专利权在很多国家都已经过期了。一些公司现在仍在生产含有草甘膦的除草剂, 例如: 先正达公司生产的草硫膦 ( Touchdown ) , 和陶氏农业科技公司生产的杜兰戈除草剂 ( Durango ) 。<http://www.keine-gentechnik.de/dossiers/roundup-und-gentechnik-pflanzen/fakten-zu-roundup-und-glyphosat.html>

### 《宅地法》 ( Homestead Act, 1862 )

《宅地法》是美国联邦法律, 用于赠予申请者土地所有权……最初是赠予一共 160 英亩未被占用的联邦土地……美国《宅地法》的雏形是赠予北方人“自由土地”的政策, 那些北方人希望私人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 耕种自己的农场……第一个法案是 1862 年的《宅地法》, 任何人, 只要从来没有拿起武器对抗过美国政府, 都可以填写申请来获得政府赠送的土地……通过对第一个法案的修订, 《扩大宅地法》于 1909 年通过, 将增地面积增加了一倍, 增加到 320 英亩。另一个修订法案, 国家《股票筹措宅地法》在 1916 年通过, 再一次增加了土地面积, 这次达到 640 英亩……

从 1862 年到 1934 年间, 联邦政府一共赠出了 160 万份宅地, 赠出了 2.7 亿英亩的联

邦土地归私人所有。

《宅地法》在很大程度上被滥用……一些人操纵土地的赠出过程以便获得对资源的控制，尤其是水资源……同样的办法，一些大企业和投机者获得了丰产木材和储藏石油的土地。[http://en.wikipedia.org/wiki/Homestead\\_Acts](http://en.wikipedia.org/wiki/Homestead_Acts) (October 16, 2014)

1930年初开始，由于开展了一些相关研究，最终使得土地挪用和掠夺不再合法。A. M. Sakolski, (1932) *The Great American Land Bubble: The Amazing Story of Land- Grabbing, Speculation and Boom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Time*,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32

《宅地法》导致对非常多的印第安人的驱赶。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印第安人由于《宅地法》而被逐出家园移民别处。

## 配套包 / 影响 (Packages/Impact)

1960年代，绿色革命初始时期，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通过推销配套包在南部国家 (Global South) 推动农业产业化。配套包 (packages) 包括：新种子 (MVs)、化肥、农药和灌溉……研究表明，绿色革命的配套包价格昂贵，更有利于少数经济状况好的农户，使得大多数经济状况不佳的小农户更加贫困，导致土地和资源更加集中到大农户手中。[http://www.academia.edu/2891404/Food\\_First\\_Policy\\_Brief\\_No.\\_12\\_Ten\\_Reasons\\_Why\\_the\\_Rockefeller\\_and\\_the\\_Bill\\_and\\_Melinda\\_Gates\\_Foundations\\_Alliance\\_for\\_Another\\_Green\\_Revolution\\_Will\\_Not\\_Solve\\_the\\_Problems\\_of\\_Poverty\\_and\\_Hunger\\_in\\_Sub-Saharan\\_Africa](http://www.academia.edu/2891404/Food_First_Policy_Brief_No._12_Ten_Reasons_Why_the_Rockefeller_and_the_Bill_and_Melinda_Gates_Foundations_Alliance_for_Another_Green_Revolution_Will_Not_Solve_the_Problems_of_Poverty_and_Hunger_in_Sub-Saharan_Africa)

2009年，排名世界前3位的化肥公司：挪威雅苒公司 (Yara)：12%；美国美盛公司 (Mosaic)：11%；加拿大阿格瑞姆公司 (Agrium)：10%。

全球范围内，从1996年到2008年，由于畜牧养殖头数的增加和作物燃料种植面积的增大，化肥的使用量增加了31%。

2009年，排名世界前4位的农药公司：先正达公司：19%；拜尔公司：19%；巴斯夫公司：11%；陶氏公司：10%。

2007年，这4家公司的销售业绩呈两位数字的增长。农药销售几乎在世界各大州都呈

上升趋势，拉丁美洲（尤其在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和东欧是主要的市场增长点。Who Owns Nature? Corporate Power and the Final Frontier in the Commodification of Life, November 2008, [www.etc.group.org](http://www.etc.group.org)

**配套包 / 影响：世界农药消耗 ( Packages/Impacts: Global Pesticide Consumption )**

1960 年	1970 年	1980 年
8.5 亿美元	27 亿美元	116 亿美元

Global pesticide consumption and pollution: with China as a focus, WenJun Zhang et al., 2011, [http://www.iaees.org/publications/journals/piaees/articles/2011-1\(2\)/Global-pesticide-consumption-pollution.pdf](http://www.iaees.org/publications/journals/piaees/articles/2011-1(2)/Global-pesticide-consumption-pollution.pdf)

**配套包 / 影响：世界化肥消耗趋势 ( Packages/Impacts: World Trends in Fertilizer Use )**

	1959/60 年	1989/90 年	2020 年
世界总量	2700 万吨	1.436 亿吨	2.08 亿吨
氮肥	950 万吨	7920 万吨	1.153 亿吨
磷肥	950 万吨	3750 万吨	5600 万吨
钾肥	970 万吨	2060 万吨	5600 万吨

<http://www.ifpri.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vb38.pdf>

**印度，旁遮普邦 (Punjab)**

种植 IR8 号水稻的面积：1967 年：54%；1984 年：95%。

印度政府选择旁遮普邦做为新作物种植的第一个地点，因为那里水资源稳定而且农业一贯丰产。印度开始了自己的绿色革命，包括：作物繁育、灌溉工程和资助农业化学品生产。  
[http://en.wikipedia.org/wiki/Green\\_Revolution](http://en.wikipedia.org/wiki/Green_Revolution) (October 16, 2014)

1966 年的干旱引起了印度粮食产量的大幅度下跌，而且从美国的粮食进口出现了史无前例地增长……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 ( Lyndon Johnson )，拒绝提供提前一个月的

粮食援助，除非印度农业部与美国农业部签署采纳绿色革命配套包……Vandana Siva, *The Violence of the Green Revolution*, New Delhi, 2010

## 人口过剩 (Surplus Population)

### 水稻耕种 - 每年每公顷每种作物的劳力投入天数

1951 年马来西亚: 208 天

1955 年印度的卡纳塔克邦 (Karnataka) : 309 天

1972 年 K. 菲律宾: 102 天

1979 年 Q. 菲律宾: 68 天

1977 年 (美国) 加利福尼亚: 3 天

Vandana Siva, *The Violence of the Green Revolution*, New Delhi, 2010

### 印度农村到城市的移民

1960 年: 21%

1970 年: 25%

1990 年: 40%

Vandana Siva, *ibid.*

### 1994 年菲律宾海外劳工数量: 621 万

256 万有劳动合同

180 万有长期居留许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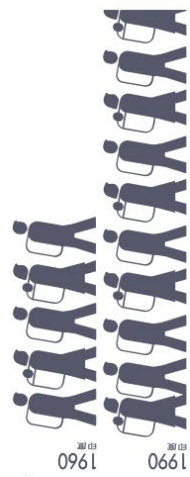
180 万为无证移民

Kilusang Magbubukid ng Pilipinas: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 on IRRI, and Its Impact on Asian Agriculture,” in: *The Great Rice Robbery, A handbook on the impact of IRRI in Asia*; Pesticide Action Network Asia and the Pacific,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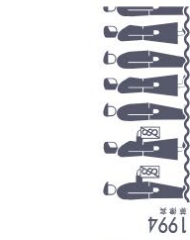
1951  
1972  
1977

一个图形 = 10个工作日 / 每公顷 (水稻)



1960  
19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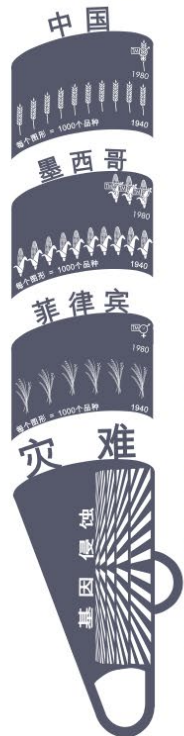
农村到城市移民 每个人形 = 2500万人



1961  
1966

每个人形 = 1百万人

# 制造灾难和生产需求；并使人们过度流动



关于主要农作物的遗传脆弱性的报告 (1972)



1983年合资企业



1998年获得专利



1999年世界范围的抗议



高度商业化的



MON 832, 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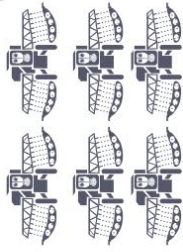
MON 1445, 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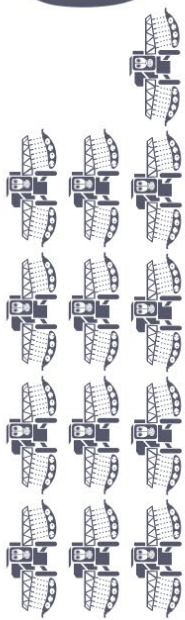
MON 63413, 2012



MON 89788, 1996



2010年阿根廷 每个图形 =



抗除草剂大豆 / 草甘膦 / 10000万升 / 公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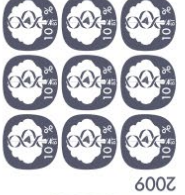
MON 87701, 1997



MON 810, 1995



MON 531, 1996



南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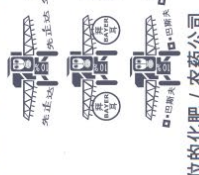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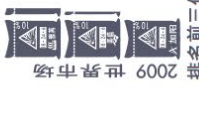
澳大利亚



印度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 (CGIAR)



排名前三位的化肥 / 农药公司



每个图形 = 5万平方公里的死海岸

## 制造灾难和生产需求，并使人们过度流动

---

### 制造灾难和生产需求；并使人们过度流动（CGIAR / New Centers）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CGIAR）在一定程度上对针对绿色革命的批评进行了响应。这开始于1980年代初，主要是因为受到来自赞助方的压力。开始采纳农业生态系统分析方法、农作系统研究方法，采纳了更加整体的农业观念。[http://en.wikipedia.org/wiki/Green\\_Revolution](http://en.wikipedia.org/wiki/Green_Revolution) (October 16, 2014)

同时，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CGIAR）的相关机构开始明确了自己的定位，更多地“公共-私人”领域的合作方面发挥作用。1980年后成立的中心：2004年成立的位于荷兰海牙的国家农业研究国际服务中心（ISNAR），角色是：PPP模式的监督和执行；1985年成立的位于斯里兰卡 Battaramulla 的国际水资源管理所（International Water Management Institute, WMI）（赞助方：斯里兰卡联合利华）；1993年成立的位于印度尼西亚茂物（Bogor）的国际森林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Forestry Research, CIFOR）；在意大利罗马的生物多样性国际（Biodiversity International）（赞助方：盖茨基金会，和企业赞助，包括：玛氏公司和先锋种子公司）；1995年成立的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国际畜牧研究所（International Livestock Research Institute）（赞助方：盖茨基金会 / 绿色革命非洲联盟，Alliance for a Green Revolution in Africa, AGRA）。<http://en.wikipedia.org/wiki/CGIAR> (October 16, 2014)

### 需求：基因安全（Demand: Genetic Security）

---

#### 交易最频繁的转基因特质 -

抗除草剂：40%；抗害虫：24%；抗病毒：10%；抗真菌：4%；品质：21%

Voice Of The People (Canada): THE POPULATION BOMB - BY THE BILLIONS, votp.blogspot.com, October 6, 2010

## 需求：基因使用限制技术

### (Demand: Genetic Use-Restriction Technology)

美国农业部的梅尔文·奥利弗( Melvin Oliver ) 在 1985 年时的言论：“( 拥有转基因技术 ) 的企业用技术手段通过 ‘自己做警察’ 来保护自己的技术，而不是通过法律手段来阻止农民自留种子……” 美国农业部把这个称为 “基因警察 ( gene police ) 。” Vandana Shiva: *Stolen Harvest: The Hijacking of the Global Food Supply*, 2000, p. 82

1983 年，三角洲和松地公司 ( Delta and Pine Land Company, D&PL ) 和美国农业部一起做了一个项目来开发 “终止子种子” ( Terminator seeds )。这是遗传修饰生物体 ( GMO ) 的最早实验。这是一个长期项目……1998 年 3 月，美国专利办公室给予三角洲和松地公司一项专利，专利号为 5723765，专利名为：植物基因表达的控制 ( Control of Plant Gene\_Expression )。专利所有者是三角洲和松地公司和美国政府，由美国农业部代表政府行使权利。1998 年 6 月，美国农业部发言人威拉德·菲尔普斯 ( Willard Phelps ) 在一次访谈中解释道，美国农业部希望这项技术可以 “被广泛地获得许可，并迅速地被许多种子应用。”……他们希望把 “终止子种子” 打入发展中国家，做为核心战略，洛克菲勒基金会在那些国家已经做了转基因作物的繁育，而且从 1984 年做水稻基因组计划 ( rice genome project ) 时就开始实施这个战略了。美国农业部的菲尔普斯陈述，美国政府扶植 “终止子” 技术的最大可能地大幅度发展的目的是 ‘提高归美国种子所有专利种子的价格，在第二和第三世界国家开发新的市场。<http://www.Globalresearch.ca/monsanto-buys-terminator-seeds-company/3082>

## 灾难：基因侵蚀 (Disaster: Genetic Erosion)

**中国** - 1940 年：10,000 个小麦品种 / 1970 年：1,000 个小麦品种

**菲律宾** - 1940 年：6,000 个水稻品种 / 1980 年：1 个水稻品种



**墨西哥** - 1940 年: 10,000 个玉米品种 / 1998 年: 2,000 个玉米品种

<http://www.fao.org/docrep/007/y5609e/y5609e02.htm>

1972 年, 农业理事会 ( the Agricultural Board )、生物与农业部门 ( the Division of Biology and Agriculture ) 和国家研究委员会 (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 做了关于 “主要作物的基因脆弱性报告” ( Report on the Genetic Vulnerability )。报告讨论了 11 种重要作物脆弱性: “主要教训是, 基因同一是容易感染流行病的基础……这种同一性被强有力的经济和法律力量所强化。” Robin Pistorius: Scientists, Plants and Politics. A History of the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Movement, IPGRI, 1993

## 灾难: 沃克尔冲击 / 债务危机 (Disaster: Volcker Shock / Debt Crisis)

我们回忆了前联邦储备系统主席保罗·沃克尔的故事, 那是 1979 年秋天的事情, 沃克尔刚被提名为主席, 因为将贴现率提升了一个百分点, 他给联邦政策留下了一笔……3 个月的国库券的贴现率从 9 月份的 8% 攀升到年底的 12.5%, 联邦也没有指望利率长期攀升, 从 9 月份的 9.2% 到 12 月 31 日的 10.1%。到 1980 年初, 利率持续攀升。到第一季度末, 长期债券可以收益 12.3%。里根那年的 11 月份赢得了大选, 得票数刚统计结束, 沃克尔就开始收紧利率。联邦基金的利息从 1979 年的平均 11.2%, 达到 1981 年 6 月的峰值 20%。最低贷款利率在 1981 年也提高到 21.5%。

债务 - 美元债务 - 成了纽约银行进行操纵的手段, 而进行指挥的是大卫·洛克菲勒的大通·曼哈顿 ( Chase Manhattan ) 和沃尔特·瑞斯顿 ( Walter Wriston ) 的花旗银行 ( Citibank )。  
[http://www.buyandhold.com/bh/en/education/history/2000/paul\\_volker2.html](http://www.buyandhold.com/bh/en/education/history/2000/paul_volker2.html)

他们的想法是, “说服” 沙特阿拉伯和其他 OPEC 国家在伦敦或纽约的银行开户, 就可以从 OPEC ( 石油输出国组织 ) 和其他石油美元中扩大上百上千亿美元的 ( 存款 / 交易 )。第二阶段, 后黄金时代……, 基辛格 ( Kissinger ) 的石油美元再循环, 循环到 1979 年初, 那时美元面临重大的国外抛售, 那也是临界吉米·卡特总统任职期满的时候……1979 年

8月，为了恢复世界对美元的信心，吉米·卡特总统被迫接收保罗·沃克尔来担任联邦储备的主席，沃克尔之前在大通·曼哈顿银行，是洛克菲勒的门徒。做为新主席，沃克尔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来拯救美元，使其继续做为储备货币……沃克尔的休克疗法开始于1979年10月份，持续到1982年的8月份。利息率升到了突破屋顶的2位数字……一年之内，最低利率也冲到了从未听说过的21.5%……

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的爆发，是沃克尔休克疗法的直接后果，是今天美国次贷危机的不详预兆。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其无法用美元偿还债务，美元利率（攀升）所导致的欠债额达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数目。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从阿根廷到巴西，从尼日利亚到刚果，从波兰到南斯拉夫，也同样陷入了纽约银行的债务陷阱。<http://www.globalresearch.ca/the-financial-tsunami-the-financial-foundations-of-the-american-century/7813>

### 灾难：单一种植的脆弱性 (Disaster: Vulnerability of Monocrops)

#### 疾病蔓延 - 玉米小斑病 (Southern corn leaf blight) - 棉铃虫

玉米小斑病是一种玉米的真菌疾病。1970年5月到9月，玉米小斑病蔓延到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Florida)、阿拉巴马州 (Alabama)、密西西比州 (Mississippi)、路易斯安那 (Louisiana)、德克萨斯 (Texas)、佐治亚州 (Georgia)、阿拉巴马州 (Alabama)、肯塔基 (Kentucky)、伊利诺伊州 (Illinois)、印第安娜州 (Indiana)、爱荷华州 (Iowa)、明尼苏达和威斯康星州 (Minnesota and Wisconsin) (后来进入加拿大) 和奥克拉荷马 (Oklahoma)。

棉红铃虫是棉花的害虫。它曾于1975年在阿肯色州和新墨西哥州爆发。Robin Pistorius: *Scientists, Plants and Politics. A History of the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IPGRI, 1993

### 根除棉红铃虫项目 (The Pink Bollworm Eradication Program)

目标是根除美国所有棉花产区的棉红铃虫……棉红铃虫导致美国棉花生产每年损失

3200 万美元，包括疾病控制的花费和产量的损失。为了减少这一负担，从 2002 年开始，棉花业开始了根除棉红铃虫项目的一期项目。<http://www.cotton.org/tech/pest/bollworm/>

孟山都开发和销售转基因的农用种子，可以制造晶体杀虫蛋白（来自 bacillus thuringiensis），被称为孟山都 Bt 棉 531 号 /Bt 玉米 BR 大豆（Bt Cotton Mon 531/Bt Maize BR Soya）。Bt 转基因棉花品种在 1996 - 2009 年的采用率：澳大利亚：95%；布基纳法索：29%；中国：60%；印度：89%；南非：98%；美国：88%。[https://en.wikipedia.org/wiki/Bt\\_cotton](https://en.wikipedia.org/wiki/Bt_cotton) (October 16, 2014)

## 抗除草剂（Roundup Read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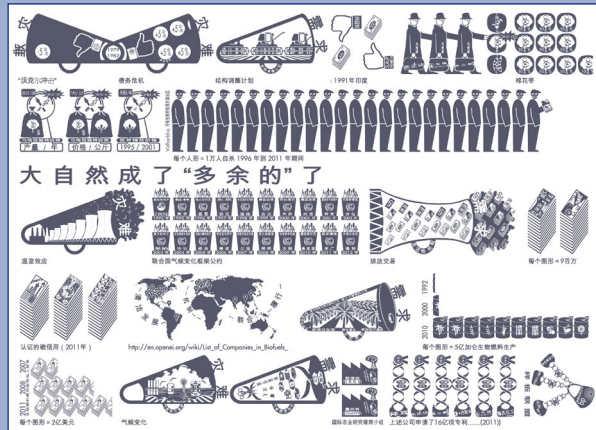
抗除草剂作物（Roundup Ready Crops, RR Crops）是转基因作物，其基因结构被改变了，可以耐受除草剂草甘膦（孟山都除草剂的活性成份）。他们也被称为“抗草甘膦作物”。抗除草剂作物在美国不受监管，包括：玉米、大豆、加拿大油菜、棉花、甜菜和苜蓿。

孟山都生产的第一种抗除草剂作物 - 抗除草剂大豆 - 的专利在 2014 年到期。孟山都把专利许可转让给了很多其他种子公司，已经有 150 家公司获得了技术许可。[http://www.sourcewatch.org/index.php/Roundup\\_Ready\\_Crops](http://www.sourcewatch.org/index.php/Roundup_Ready_Crops) <http://en.wikipedia.org/wiki/Monsanto> (October 16, 2014)

## 终止子种子（Terminator seeds）

孟山都在 1998 年收购了三角洲和松地公司（Delta and Pine）。“到 2006 年，‘终止子种子’没有在任何地方进行商业销售，这是因为受到来自农民、土著人、NGOs 和一些政府的抵制。2000 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提出了既成事实的不允许大田实验和商业销售‘终止子种子’的禁令”。（当在作物中加入了由 3 个基因组成的终止子基因后，该转基因作物结的是成熟但不育的种子）[http://de.wikipedia.org/wiki/Genetic\\_Use\\_Restriction\\_Technology](http://de.wikipedia.org/wiki/Genetic_Use_Restriction_Technology) (October 16, 2014)

# 第五章 环保和基因被“商品化绑架”



图VI\_大自然不再自然，而是被占领、被污染和充满不稳定



图VII\_抢占“无主物”

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诸多挑战，最大的挑战是气候变暖所引发的环境灾难和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彻底破坏。就像面对过去所有灾难一样，资本的脑子里只能得出资本逻辑的解决方案，动机就是为了牟利，而手段就是通过商品化。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一直定期对全球气候变化进行评估，并指出：“气候变暖的影响包括：海平面升高……和亚热带沙漠面积扩大……还有更频繁的极端天气，包括：热带风暴、干旱、暴雨、海洋酸化，和物理条件变化所导致的物种灭绝。给人类带来的重大影响是粮食安全的威胁，包括粮食产量降低和栖息地被淹没造成的损失。”面临全球所有人都面临的环境危机，我们理应关注和采取措施。但是，再一次，各大私人企业巨头利用环境灾难来牟利，结果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引发更多的问题。

用生物燃料替代石油燃料是一种争取逆转环境危机的方式，生产生物燃料可以牟利，这直接导致大面积的所谓“无主地”（其实是公共地）被霸占，同时种植生物燃料的种植是单一种植，继续导致环境和土壤灾难。2008年的估算，全世界有5亿公顷的土地用于种植生物燃料，很大面积的土地被称为“不属于任何人的土地”。这种‘不属于任何人的土地’的原则是将“世界上很多地方变为殖民地”的理由，欧洲势力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非洲争夺影响力。其思想基础是，虽然土著人生活在“新发现”的土地上，“文明人”有权占有土地以便“更好地”使用土地。土地占领不仅意味着农民失去土地，还意味着土地的形式将从小农地或者共用地被变成大规模的产业地产，和遥远的市场相关。

碳排放被商品化，不出意料，碳排放交易所都坐落在发达国家被大公司所控制。碳排放交易是通过提供经济刺激的市场化途径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一个权力机构（通常是政府）设定一个可以排放的污染物的限制或总量。这个限制或总量以排放许可（emissions permit）的形式卖给公司，这个排放许可代表允许排放或者流出的一定量的某种污染物。许可的转移被当作一种贸易。也就是说，购买许可的一方为排放污染买单，而出售许可的一方由于减少了排放而得到回报。这样的理论设计似乎是可行的，但是，看到“碳将成为世界上最大商品市场”时，市场最后对目标的异化不得不让人怀疑环保的效果能够

最终达到。

基因巨头们现在正在集中精力去鉴别和申请抗气候基因品质的专利，也包括对其他非生物胁迫的抗性，例如：干旱、盐碱土壤、低氮、酷热、严寒、风、霜、强日照、臭氧和厌氧胁迫。为了获得所谓可以应对气候灾难的遗传品质的专利正在吸纳金钱和资源，而这些金钱和资源完全可以用于投入到以农民为本的、可以支付得起的应对气候变化所需要的改变和生存措施。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些基因巨头的唯一目的和最终目的只是为了赢利，最后带来的往往不是作物的增产和农民生活的改善，而是对农民和农业的巨大伤害。

生物技术、石油和种子公司进行合资，这样的联盟不言自明地说明了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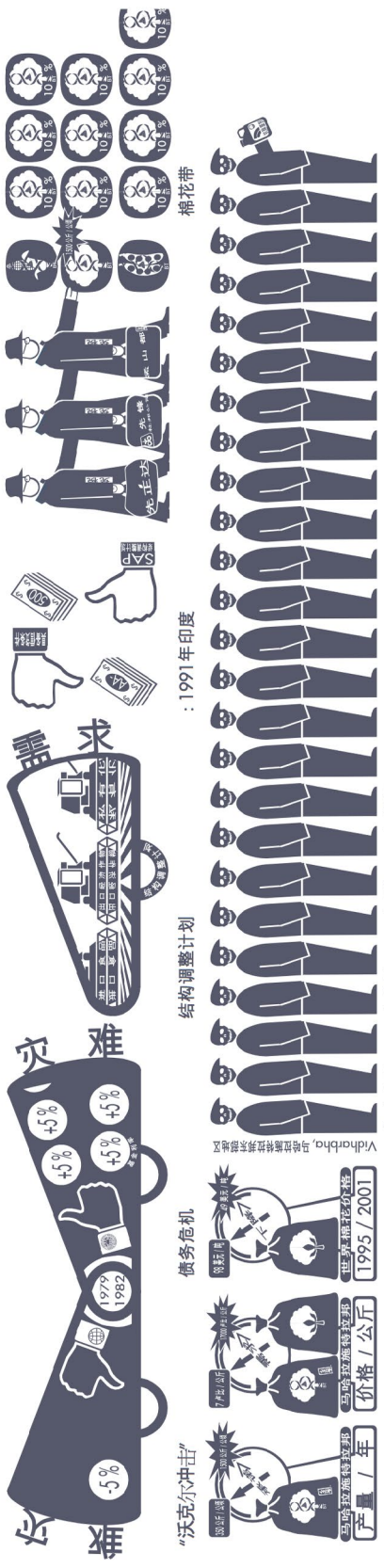
英国石油公司（BP）+ 孟德尔生物技术公司（Mendel Biotechnologies）+ 杜邦种子公司（DuPont Seeds）

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 马拉松石油公司（Marathon Oil）+ 麦斯卡生物技术公司（Mascome）

壳牌公司 + Codexis 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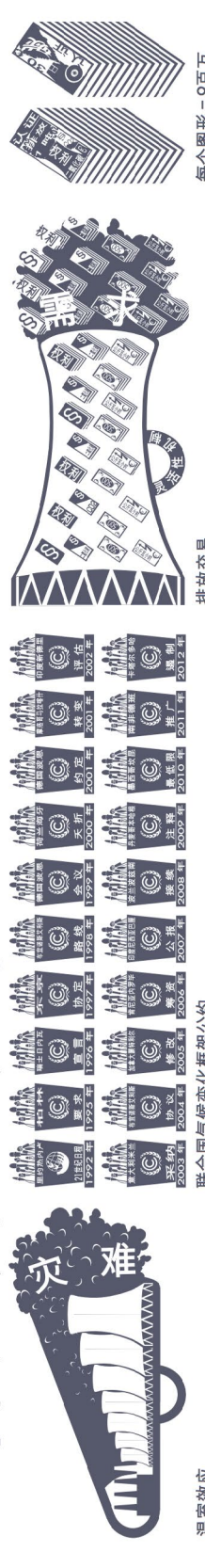
雪佛龙公司（Chevron）+ Solazyme 生物技术公司 + Weyerhaeuser 林业公司

这是一张人类自取灭亡的展示图，是资本的盛宴和狂欢，而结果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的崩溃。



# 大自然成了“多余的”了

每个人形 = 1万人自杀 1996 年到 2011 年期间



温室效应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排放交易

每个图形 = 9百万



认证的碳信用 (2011年)

[http://en.openei.org/wiki/List\\_of\\_Companies\\_in\\_Biofuels\\_](http://en.openei.org/wiki/List_of_Companies_in_Biofuels_)

每个图形 = 5亿加仑生物燃料生产



气候变化

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

上述公司申请了16亿项专利.....(2011)

## 大自然不再自然，而是被占领、被污染和充满不稳定

---

### 国际需求：生物燃料 (Demand: Biofuels)

---

生物燃料是刚刚通过固碳（光合作用）过程而形成的蕴含能量的燃料。这样的固碳发生在植物和微藻类。这些燃料是由生物质转换而成。生物质指的是不久前还有生命的活生物，大多指的是植物或者植物提取物。这样的生物质可以被转化为含能物质（energy-containing substances），有下面三种转换形式：热转换、化学转换和生物化学转换。生物质转换成燃料的形态可以是：固态、液态和气态。这种新的生物质可以被用做生物燃料……

生物乙醇是发酵的产物，主要是由植物淀粉或糖分中的碳水化合物发酵产生，富含植物淀粉和糖分的作物有玉米、甜菜或者甜高粱。纤维质生物质来源于非食用资源，例如：树和草，也被开发成生产乙醇的原料。纯乙醇可以直接用做车辆的燃料，但是，通常乙醇只被用做汽油的添加成份来增加辛烷和提高车辆的排量。

生物柴油可以直接用做汽车燃料，但是它通常被用做柴油添加成份来减少柴油机车排放的微粒、一氧化物和碳氢化合物。通过酯交换反应从油和脂肪中生产出来的生物柴油是欧洲最普遍使用的生物燃料。2010年，世界生物燃料的产量达到1.05 千亿升（280 亿加仑），比2009年增加了17%；生物能源占全世界道路交通能源使用量的2.7%，这其中主要是乙醇和生物柴油。2010年，世界乙醇燃料产量达到了860 亿升（230 亿加仑），产量最大的国家是美国和巴西，合占世界总产量的90%。世界最大的生物柴油产地是欧盟国家，占世界2010年生物柴油产量的53%。2011年，在全球31个国家的国家层次，和29个州和省级层次，有指令性的生产生物燃料的要求。国际能源署（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的目标是，到2050年，全球运输能源的25%来自生物燃料，以便减少对汽油和煤的依赖。[https://en.wikipedia.org/wiki/Biofuel#First-generation\\_biofuels](https://en.wikipedia.org/wiki/Biofuel#First-generation_biofuels) (October 16, 2014)

[http://www.earth-policy.org/datacenter/pdf/book\\_wote\\_energy\\_biofuels.pdf](http://www.earth-policy.org/datacenter/pdf/book_wote_energy_biofuels.pdf)



## 需求：灾难气候应对作物 (Demand: Climate-Ready Crops)

---

为了获得所谓可以应对气候灾难的遗传品质的专利正在吸纳金钱和资源，而这些金钱和资源完全可以用于投入到以农民为本的、可以支付得起的应对气候变化所需要的改变和生存措施。基因巨头们现在正在集中精力去鉴别和申请抗气候基因品质的专利，也包括对其他非生物胁迫的抗性( resistance to abiotic stresses )。(非生物胁迫是植物遭遇的环境威胁，例如：干旱、盐碱土壤、低氮、酷热、严寒、风、霜、强日照、臭氧和厌氧胁迫。)

国际水稻研究所 (IRRI) 在 2008 年启动了一个新事项：转换水稻的光合作用机制，由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 the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 资助。2009 年 11 月，CIMMYT ( 国际小麦和玉米改良中心 ) 启动了“小麦高产潜力组合”，要在小麦上做同样的事情。Earth Grab: Geopiracy, the New Biomasters and Capturing Climate Genes, [www.etcgroup.org](http://www.etcgroup.org)

ETC 行动组 ( 侵蚀、技术、浓度监察行动组, Action Group on Erosion, Technology and Concentration ) 发现了 1600 个专利 / 55 个专利组 ( 同一个发明, 在不只在一个国家申请知识产权 ), 算下来是 532 个不同的专利文件。巴斯夫 ( BASF ) 拥有 55 个专利组中的 21 个。合在一起, 孟山都和巴斯夫拥有 55 个专利中的 27 个 ( 占 49% )。这很重要, 因为孟山都和巴斯夫宣布, 2007 年 3 月, 它们将投入 15 亿美元来开发可以耐受有害环境条件的作物。虽然谷神星公司 ( Ceres, Inc. ) 和孟德尔生物技术 ( Mendel Biotechnology ) 是彼此独立的两家公司, 两家公司都和孟山都合作做研究 ( 而且, 孟山都持有孟德尔的股份 )。孟山都和巴斯夫已经编织了一个 15 亿美元的巨额合作, 投入到植物胁迫抗性的基因工程中。Patenting the “Climate Genes” and Capturing the Climate Agenda, Communiqué, May/June 2008, [www.etcgroup.org](http://www.etcgroup.org)

## 需求：排放贸易 (Demand:Emissions Trading)

---

认证的碳信用额度 ( Certified Carbon Credits ) , 2011 年, 4500 万美元

318 个项目在印度; 101 个项目在中国; 94 个项目在巴西

Earth Grab: Geopiracy, the New Biomasters and Capturing Climate Genes, [www.etcgroup.org](http://www.etcgroup.org)

碳排放交易 ( Emissions trading ) 总量管制和交易 ( cap and trade ) 是通过提供经济刺激的市场化途径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已实现控制污染的目的。一个权力机构 ( 通常是政府 ) 设定一个可以排放的污染物的限制或总量。这个限制或总量以排放许可 ( emissions permit ) 的形式卖给公司, 这个排放许代表允许排放或者流出的一定量的某种污染物。公司必须持有与其排放量相等的一定数量的许可 ( 限额或者碳信用额度 ) 。许可的总数量不能超过总量管制, 也就是说要限制总排放量的水平。需要增加排放量的公司必须向那些不需要那么多排放许可的公司购买许可。

许可的转移被当作一种贸易。也就是说, 购买许可的一方为排放污染买单, 而出售许可的一方由于减少了排放而得到回报。这样, 从理论上说, 有些企业就会花些钱来减少排放 ( , 因为这样比购买许可还更便宜 ) , 这样对于整个社会来讲, 就是花最低的成本实现减少污染的目的。一个排放许可或者限额被看作相当于一个公吨的二氧化碳排放。……这些许可或者单位可以私下交易, 或者在国际市场上按照市价进行交易。……贸易交换已经建立起来为许可提供了现货市场 ( spot market ) , 帮助发现市场价格并维持流动性。碳价格通常用欧元 / 吨二氧化碳来报价。其他温室气体也被用来做贸易, 根据其导致全球变暖的潜力所对应的二氧化碳标准的倍数来报价……

现在, 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 中碳信用额度相关的有 6 个交易所: 芝加哥气候交易所 ( the Chicago Climate Exchange ) ( 到 2010 年 ) , 欧洲气候交易所 ( European Climate Exchange ) , 纳斯达克 OMX 商品欧洲交易所 ( NASDAQ OMX Commodities Europe ) , 未来电力交易所 ( Powernext ) , 布拉迪斯拉发商品交易所 ( Commodity Exchange Bratislava ) , 欧洲能源交易所 ( European Energy Exchange ) 。纳斯达克 OMX 商品欧洲交易所, 由被称

为“核证减排”（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的 CDM 碳汇项目，签订上市契约来交易碳补偿（offsets）。许多公司现在投入到减排，排放补偿、碳吸收（abatement, offsetting, sequestration）项目中，来积累信用，以便可以在交易所中出售。2008 年还成立了一个私人电子市场：坎托 CO2（CantorCO2）。在布拉迪斯拉发商品交易所，碳信用额度在一个特殊的平台进行交易：碳板（Carbon place）。

排放许可交易，是伦敦金融服务业中增长最快的业务，2007 年的市场额度大概在 300 亿美元。巴克莱资本公司（Barclays Capital）环境市场负责人路易斯·雷德肖（Louis Redshaw）预测：“碳将成为世界上最大商品市场，也将成为最大的市场。” [http://en.wikipedia.org/wiki/Emissions\\_trading](http://en.wikipedia.org/wiki/Emissions_trading) (October 16, 2014)

## 需求：结构调整（Dem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s）

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SAPs）的重要内容包括，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为那些身陷经济危机的国家提供贷款。这两家布雷顿森林体系内的机构，要求借款国实施一些政策，做为获得新贷款的条件（或者对已借款项降息的条件）……结构调整计划目的是促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走向市场化。这使得这些国家注重贸易和生产，以便促进经济繁荣。……结构调整计划通过这些前提条件，大都使得借款国实施了“自由”市场改革和政策。包括内部改革（就是：私有化和解除管制）和外部改革，特别是减少贸易壁垒。[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ructural\\_adjustment](https://en.wikipedia.org/wiki/Structural_adjustment) (October 16, 2014)

1998 年，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计划强迫印度开放其种子业给跨国公司，包括：嘉吉公司（Cargill），孟山都和先正达。跨国公司在一夜之间改变了经济投入（input economy）。农民从自留种子改成从公司买种子，这就需要配套的化肥和除草剂，而且非用不可。……

单一种植和同一性增加了作物欠收的风险……当孟山都在 2002 年首次（在印度）推销

Bt 棉，棉农因为欠收损失了 10 亿卢比。公司承诺每英亩产量 1500 公斤，而实际上只收获了 200 公斤。不仅没有每英亩收入 1 万卢比，反而亏损 6000 卢比。在( 印度 )比哈尔邦( Bihar )，当农民放弃自留种，而种植了孟山都的杂交种，作物整个欠收，造成了 40 亿卢比的损失，使得本就贫困的农民更加贫苦不堪。

印度农民所面临的第二个压力是，世界贸易组织 ( WTO ) 的自由贸易政策导致的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下跌。世界贸易组织对待农产品贸易的原则其实就是：倾销原则……全球小麦价格已经从 1995 年的 216 美元 / 吨降低到 133 美元 / 吨；棉花价格从 1995 年的 98.2 美元 / 吨降到 2001 年的 49.1 美元 / 吨；大豆从 1995 年的 273 美元 / 吨降到 2001 年的 178 美元 / 吨。这个跌价并不是由于生产力的变化导致的，而是因为 ( 发达国家的农业 ) 补贴增加，因为市场被少数农商公司垄断所导致的。Vandana Shiva, *From Seeds of Suicide to Seeds of Hope: Why Are Indian Farmers Committing Suicide and How Can We Stop This Tragedy?*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vandana-shiva/from-seeds-of-suicide-to\\_b\\_192419.html](http://www.huffingtonpost.com/vandana-shiva/from-seeds-of-suicide-to_b_192419.html)

### 农民自杀 (Farmer Suicides)

除了导致对大众健康和生态系统的伤害，转基因种子和作物为公司通过专利和知识产权 ( IPRs ) " 占有 " 种子提供了途径。专利为专利拥有者和企业垄断提供了专利使用税。这使得孟山都发了大财。而对于农民，这意味着欠债。例如，在过去 15 年中，超过 25 万印度农民被逼自杀。大部分自杀发生在产棉区，在那些地方孟山都通过 Bt 棉进行了种子垄断。The GMO Emperor Has No Clothes – A Global Citizens Report on the State of GMOs, ed. Vandana Shiva, Navdanya International, 2011

印度自杀率最高的地区是马哈拉施特拉邦的 Vidharbha，每年 4000 人自杀，平均每天 10 个人。这个邦也是孟山都转基因 Bt 棉种子面积最大的邦。通过把种子由可再生资源变成不可再生的投入，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制造了一个自杀经济 ( suicide economy )，结果每年必须高价购买。以前的棉花种子价格是 7 卢比 / 公斤。Bt 棉种子的价格是 17000 卢

比 / 公斤。传统棉花品种可以和粮食作物套种，Bt 棉只能单一种植；传统棉种是雨养作物，而 Bt 棉需要灌溉；传统棉种可以抗虫，Bt 棉虽然被推销为抗棉铃虫，但是却带来了其他新害虫，为了控制这些新害虫，农民不得不比以前多喷洒 13 次农药。还有，孟山都在出售其转基因棉种的时候，欺骗说每英亩每年可以收获 1500 公斤棉花，而其实农民平均只收获 300 到 400 公斤。高投入和靠不住的产出制造了债务陷阱和自杀经济。Vandana Shiva, *From Seeds of Suicide to Seeds of Hope: Why Are Indian Farmers Committing Suicide and How Can We Stop This Tragedy?*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vandana-shiva/from-seeds-of-suicide-to\\_b\\_192419.html](http://www.huffingtonpost.com/vandana-shiva/from-seeds-of-suicide-to_b_192419.html)

## 灾难：气候变化 (Disaster: Climate Change)

---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 the Internation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 2013 年的第五次评估报告 ( AR5 ) 总结了气候模型预测 ( climate model projections ) 。报告指出，21 世纪，大气层的温度很可能会升高 0.3 到 1.7 摄氏度 ( 0.5 到 3.1 华氏度 ) ，这是按照在严格控制下使得排放量达到最低程度来估算；然后大概升高 2.6 到 4.8 摄氏度 ( 4.7 到 8.6 华氏度 ) ，如果排放量达到预测的最高。……

未来的气候变化和相关影响在世界不同地方会有不同。气候变暖的影响包括：海平面升高……和亚热带沙漠面积扩大……还有更频繁的极端天气，包括：热带风暴、干旱、暴雨、海洋酸化，和物理条件变化所导致的物种灭绝。给人类带来的重大影响是粮食安全的威胁，包括粮食产量降低和栖息地被淹没造成的损失。[http://en.wikipedia.org/wiki/Global\\_warming](http://en.wikipedia.org/wiki/Global_warming) (October 16, 2014)

## 灾难：温室气体影响 (Disaster: Greenhouse Effect)

---

全球变暖是观测到的世纪跨度的地球大气系统温度的升高。在 2007 年的第四次评

估 (AR4) 的相关科学文献中,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the Internation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报告到: 科学家有 90% 的把握认为, 全球变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浓度上升所导致的。对这种全球变暖的政策对策包括: 减排、适应、增加耐受, 或者也许将来对气候进行工程改造 (climate engineering)。大多数国家都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会议, 最终目的是为了避开人类导致的危险的气候变化。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讨论的各方已经采纳了一系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 并且帮助提高对全球变暖的适应性。各方都同意, 全球变暖应该被限制到比前工业化时期的温度不能升高超过 2 摄氏度 (3.6 华氏度)。2011 年联合国环境署和国际能源署发表的报告指出, 21 世纪初以来的减排努力估计不够实现控制在 2 摄氏度以内的目标。  
[http://en.wikipedia.org/wiki/Global\\_warming](http://en.wikipedia.org/wiki/Global_warming) (October 16, 2014)

### 灵活机制 (Flex Mex)

京都议定书 (Kyoto Protocol) 规定了三个灵活机制 (flexibility mechanism), 可以被附件一缔约方使用来满足排放限制的承诺。灵活机制是国际排放贸易 (International Emissions Trading, IET), 清洁发展机制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 和联合实施 (Joint Implementation, JI) ……CDM 和 JI 被称作“项目机制” (project-based mechanisms), 也就是说, 它们从项目的角度来制造减排。IET 和项目机制之间的区别是, IET 是基于一个量化的排放限制, 而项目机制是基于减排的制造这样一个想法。CDM 的设计是要鼓励非附件一缔约方来制造减排, 而 JI 鼓励附件一缔约方来制造减排。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yoto\\_Protocol](https://en.wikipedia.org/wiki/Kyoto_Protocol) (October 16, 2014)

京都议定书: 清洁发展机制 / 联合实施计划 “鼓励北半球的公司和国家进行投资, 来吸纳南半球的气候缓解项目……从 2009 年开始, 在退化的土地上生产的生物柴油项目也有资格获得 CDM 信用额度。Earth Grab: Geopiracy, the New Biomasssters and Capturing Climate Genes, [www.etcgroup.org](http://www.etcgroup.org)

## 样板联盟 (Sample Alliance)

### 生物技术，石油和种子公司的合资：

英国石油公司 (BP) + 孟德尔生物技术公司 (Mendel Biotechnologies) + 杜邦种子公司 (DuPont Seeds)

通用汽车公司 (General Motors) + 马拉松石油公司 (Marathon Oil) + 麦斯卡生物技术公司 (Mascome)

壳牌公司 + Codexis 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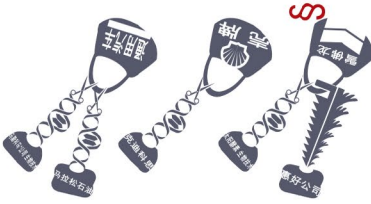
雪佛龙公司 (Chevron) + Solazyme 生物技术公司 + Weyerhaeuser 林业公司

Who Owns Nature? Corporate Power and the Final Frontier in the Commodification of Life, 2009, [www.etcgroup.org](http://www.etcgroup.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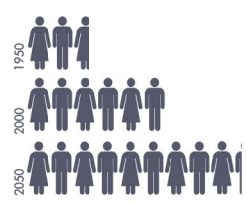
##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是一个年度会议，依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来召开，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 (COP) 的正式会议，用来评估气候变化的进程，并且在 1990 年代中期开始就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制订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定义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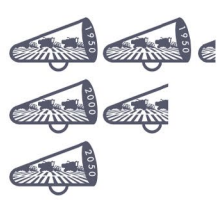
会议：1992 年：里约热内卢，21 世纪议程 (Agenda 21)；1995 年：柏林强制义务 (The Berlin Mandate)；1996 年：瑞士日内瓦；1997 年：关于气候变化的京都协议 (The Kyoto Protocol on Climate Change)；1998 年：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1999 年：德国波恩；2000 年：荷兰海牙；2001 年：德国波恩；2001 年：摩洛哥马拉喀什；2002 年：印度新德里；2003 年：意大利米兰；2004 年：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2005 年：加拿大蒙特利尔；2006 年：肯尼亚内罗毕；2007 年：印度尼西亚巴厘；2008 年：波兰波兹南；2009 年：丹麦哥本哈根；2010 年：墨西哥坎昆；2011 年：南非德班；2012 年：卡塔尔多哈。[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Nations\\_Climate\\_Change\\_conference](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Nations_Climate_Change_conference) (October 16, 2014)



样板联盟



每个人形 = 10亿人



每个图形 = 2000平方米可耕地 / 每人



全球联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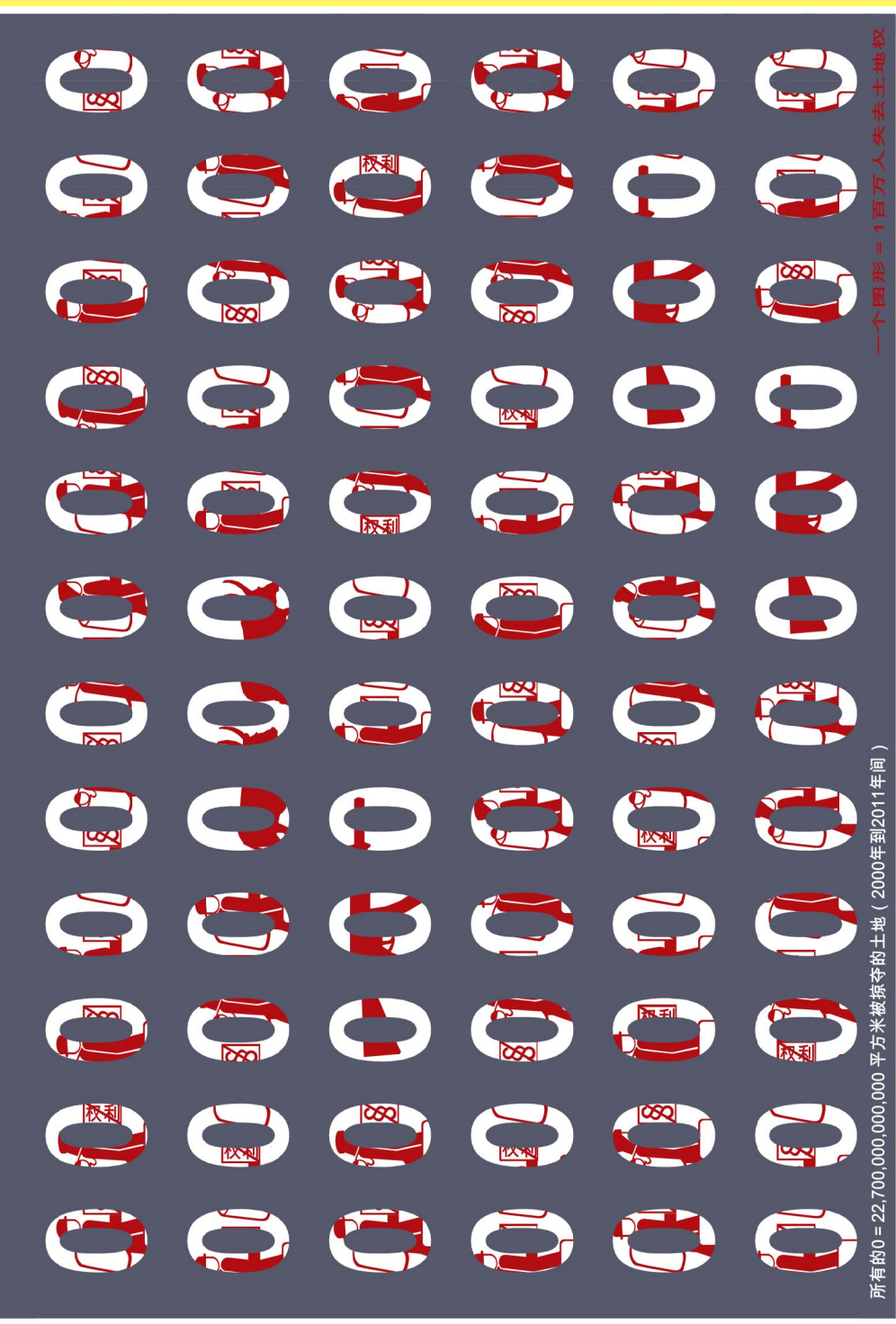
**土地**

**出口经济**  
199%  
出口 环保 慈善 口 英

**能源安全**  
47%  
能源 安全 手 互 厥 得

**全球食品政策新趋势**  
30%  
全球 食品 政策 新 趋 势

**资金**  
45%  
资金 全球 联盟



所有的0 = 22,700,000,000,000平方米被掠夺的土地 (2000年到2011年间) 一个图形 = 1百万人失去土地权



## 无主物

无主物（Res nullius）……是起源于罗马法（Roman Law）的拉丁词汇……指还不是某个具体主体的权力对象。这个东西被当作是无人占有的财产，并且通常可以被自由占有。

这个词与占领相关。“在社会经济领域的无主物的例子是野生动物或者被抛弃的财产。……野生动物被当作无主物，并且不被作为私人财产的主体，直到在被杀死或者被抓住以后成为被占有物。……无主物也在国际公共法里应用，多被称作‘不属于任何人的土地’（terra nullius），当一个国家的公民（通常是探险或者武力入侵）进入这个地区后，这个国家可以声称对一个所有主不明的地区有控制权，并且进行控制。这种‘不属于任何人的土地’的原则是将‘世界上很多地方变为殖民地’的理由，欧洲势力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非洲争夺影响力。”其思想基础是，虽然土著人生活在“新发现”的土地上，“文明人”有权占有土地以便“更好地”使用土地。[http://en.wikipedia.org/wiki/Res\\_nullius](http://en.wikipedia.org/wiki/Res_nullius) (October 16, 2014)

生物质倡导涉及到“边缘化的”、低产的、闲置的、退化的和被抛弃的荒地。全世界有5亿公顷的被抛弃和边缘化的土地用于种植生物质作物。Gaia Foundation et al. *Agrofuels and the myth of marginal lands*, 2008; [www.watchindonesia.org/Agrofuels&MarginalMyth.pdf](http://www.watchindonesia.org/Agrofuels&MarginalMyth.pdf)

### 可耕地（Arable Land）

**世界人均可耕地面积** - 1950年：5100平方米；1975年：3400平方米；

2000年：2700平方米；2050年：2000平方米

**2010年农村人口** - 34亿，占世界人口的49%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定义，可耕地是农业用地的一种，农业用地还包括

种植一年生和多年生作物的土地，例如：果园和草场。2008 年，世界可耕地面积总面积为 13.87 亿公顷，农业用地的面积为 49.08 亿公顷。[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ess/ess\\_test\\_folder/Publications/Year-book\\_2010](http://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ess/ess_test_folder/Publications/Year-book_2010)

### 生物燃料公司 (Biofuel Companies)

<http://www.e2.org/ext/doc/E2AdvancedBiofuelMarketReport2012.pdf>

### 土地需求 (Demand for Land)

土地占领面积的估算：“根据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FPRI ) 在 2009 年的数据，大规模土地交易从 2005 年到 2009 年增加了 2 千万公顷；据世界银行 ( 2010 年 ) 数据，2007 年到 2008 年，土地交易面积为 4500 公顷；据乐施会 ( 2011 年 ) 数据，从 2000 年开始，交易面积为 2.27 亿公顷。其实最后，几乎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大面积的土地占领正在进行中。问题是，很多土地交易不上报，而是秘密进行，也没有媒体进行报道。而且即使每次土地交易都上报了，还是会因为各种原因而无法判断出总量。首先，那些上报的大规模土地交易项目可能处于规划或实施的不同阶段，有的刚开始，有的快结束了。第二，项目投资是动态的，而且可以变化很大……第三，在土地测量和土地用途上可能有不可靠和腐败的问题，这一问题在这一轮土地占领之前就存在了，而且受到技术和政治因素的影响。所以，测量土地占领面积就如同测量沙流一样的不可能。

<http://www.tni.org/primer/global-land-grab#onwhatscale>

### 逼迁 (Displacement)

**农民、农场主、土著人、养殖户、森林居民、游牧民：**土地占领不仅意味着农民失去土地，还意味着土地的形式将从小农地或者共用地被变成大规模的产业地产，和遥远的市场想关。“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 the United Nations Permanent Forum on Indigenous Issues ) 估计，世界上大概有 6 千万土著人的土地权力由于不断扩大的大面积生物燃料种

植而面临风险。<http://www.oaklandinstitute.org/great-land-grab-rush-world%E2%80%99s-farmland-threatens-food-security-poor>

## 欧盟生物燃料方针 (EU Biofuel Directive)

对用于交通工具的生物燃料和他可再生燃料的使用的推广方针，就是官方文件 2003/30/EC 和被俗称为生物燃料方针，是欧盟推广交通工具使用生物燃料的方针。该方针在 2003 年 5 月生效，规定，欧盟各个国家必须采取措施，到 2010 年实现替代所有交通工具所使用的化石燃料（汽油和柴油）的 5.75% 的目标。该方针也倡议一个中间目标，到 2005 年替代 2%。5.75% 的目标要在 2010 年 12 月 31 日实现，这个比例是基于欧盟成员国市场上用于交通运输的汽油和柴油的燃料能量（energy content）合算出来的。成员国被鼓励去实现与总目标一致的本国的目标。[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rective\\_on\\_the\\_Promotion\\_of\\_the\\_use\\_of\\_biofuels\\_and\\_other\\_renewable\\_fuels\\_for\\_transport](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rective_on_the_Promotion_of_the_use_of_biofuels_and_other_renewable_fuels_for_transport) (October 16, 2014)

## 人人有份 (Everybody's Business)

土地占领 / 投资者 - 私人股票基金：2.4 万亿美元

对冲基金：1.9 万亿美元

养老基金：30 万亿美元 + 自 2010 年的 23% 的增长

主权财富基金：4.7 万亿美元 + 自 2010 年的 14% 的增长

今天，养老基金产业比其他三个合在一起的额度还大。

投资银行、大学捐款、富人、保险公司、国家基金、食品加工企业

<http://www.viacampesina.org/downloads/pdf/en/landgrabGRAIN-dec2011.pdf>

这些农地基金从 1991 年到 2010 年产生的回报大概是投资黄金或 S&P500 股票指数的 2 倍，是投资房地产的 7 倍……10 年内回报率是 400%。<http://www.earth-policy.org/books/fpep/fpepch10> <http://farmlandgrab.org/post/view/19638>

**挪威发展中国家投资基金 (Norfund) 的例子：**“马塔努斯卡 (Matanuska) 是一家落户在莫桑比克的公司，归英国萨克逊不动产 (Saxion Estates) 的子公司裂谷控股 (Rift Valley Holdings) 所有，是非洲最大的农地的所有者。马塔努斯卡毛里求斯 (Matanuska Mauritius) 是一家壳牌公司。挪威发展中国家投资基金给这家公司投资 370 万美元，购买这家公司股份的 33.3%，并提供了 400 万美元的贷款。公司运营的第一阶段，马塔努斯卡开辟了 3000 公顷的香蕉种植园，并与奇基塔 (Chiquita) 签订了 12 年的供货协议。根据一份莫桑比克国家农民组织的报告，马塔努斯卡公司屡次触犯劳动法。” [www.grain.org/.../4479-grain-releases-data-set-with-over-400-global-land-grabs%20\(1\).pdf](http://www.grain.org/.../4479-grain-releases-data-set-with-over-400-global-land-grabs%20(1).pdf)

### 全球食品政策新政 (New Deal on Global Food Policy)

在这些机构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国际金融公司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orporation, IFC)，是世界银行集团的私营部门，其资助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私人投资，给政府部门提建议，鼓励“有利的商业环境”。与国际金融公司并肩工作的是“外国投资咨询委员会” (Foreign Investment Advisory Board, FIAS)，其通过改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环境’来鼓励私人投资……在 2008 年食品价格危机的紧要关头，世界银行提出了全球食品政策新政，目的是推动增加粮食产量……国际金融公司投资的卖点是：由于长期对农业的低投入，导致了高昂的食品价格，触发了农业的“金融革命”。认为，高昂的食品价格为新兴市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2009 年 2 月，国际金融公司与阿蒂玛合作伙伴 (Altima Partners) 联合在“新兴市场国家”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投资农业和农地。新投入的 6.25 亿美元的“阿蒂玛同一个世界农业发展基金” (Altima One Worl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Fund) 是国际金融公司在农商领域扩展的最大的股权投资。<http://www.oaklandinstitute.org/great-land-grab-rush-world%E2%80%99s-farmland-threatens-food-security-poor>

## 斯堪福燃料公司 (Scanfuel)

斯堪福燃料公司是一家挪威公司，运营一座位于加纳的迄今为止为人所知的最大的麻疯树种植园。该公司通过其在加纳的子公司，斯堪福燃料加纳公司，在阿散蒂 (Ashanti) 地区的阿散蒂他北市 (Asante Akim North Municipality) 获得了 40 万公顷的土地，来种植麻疯树，用来生产用于出口的生物柴油。加纳商务新闻 (ghanabusinessnews.com) 和欧洲能源评论 (European Energy Review) 的记者探访了农民和周边的村落，发现，这家企业逃脱罪责，对当地人的生活和习俗不管不顾。Efirise 村是一个当地农民的聚居地，位于斯堪福燃料公司的运营范围，该村的头领 Amadu Sakari 说，公司从阿戈戈 (Agogo) 的最高首领 Nana Akuoku Sarpong 那里获得了土地。Amadu Sakari 补充到，斯堪福燃料公司最后同意给土地被占用的农民每英亩补偿 GH1 c，但是，大多数农民拒绝接受，因为培养数目太少了。然后，斯堪福燃料公司的项目还在继续种植和收获麻疯树的种子，用于加工和出口。当地人非常担忧而且害怕，因为他们认为斯堪福公司的背后用大人物的支持。

斯堪福燃料公司动用大型农用机械来清除阻挡它的一切，包括人居地、庄稼地和经济林。在周围走走，发现了被砍倒的达瓦达瓦 (Dawadawa) 树和非洲酪脂树 (shea)。达瓦达瓦树为当地人提供重要的食物和药物。非洲酪脂树除了食用，也是重要的经济来源。

[http://emmanuelwrites.blogspot.de/2010\\_02\\_01\\_archive.html](http://emmanuelwrites.blogspot.de/2010_02_01_archive.html)

## 扰乱土地改革 (Undo Land Reform)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商业土地交易直接与土地改革产生了冲突……例如，在菲律宾，一系列备受瞩目的交易，与一直以来对土地改革的需求相冲突。代表大农业企业的沙特行政当局对菲律宾的土地改革表示担忧……2009 年 6 月，媒体报道，欧盟也用世贸组织条款对菲律宾政府施压，敦促其解除对外国人拥有土地的禁令。<http://www.oaklandinstitute.org/great-land-grab-rush-world%E2%80%99s-farmland-threatens-food-security-poor>

## 第六章 强盗逻辑下的商业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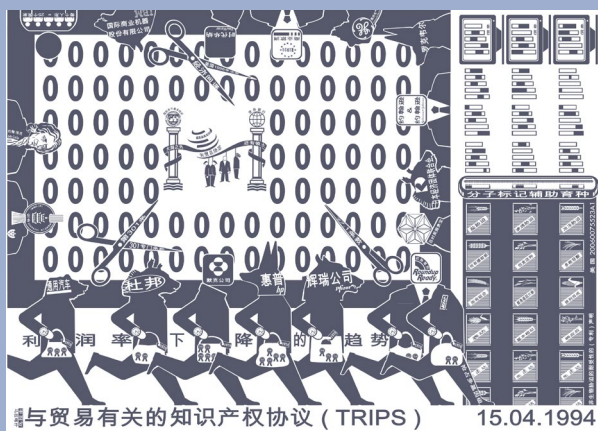


图 IX \_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自从有了阶级社会开始，大自然和劳动力就成了被占有和剥夺的对象，只不过是，不同的阶级社会，占有的形式不同。

谁该拥有大自然的赋予哪？人类历史中黑暗的三角贸易起始于15世纪，历时400年之久。大自然被殖民者剥夺，非洲和拉美人民沦为殖民者的奴隶。虽然1537年5月29日，教皇保罗三世的训令《来自至高无上的上帝》告诫基督徒们：“印第安人确实确实是人类……印第安人和其他人不应该被剥夺自由或者被剥夺财产，虽然他们不信仰耶稣……。”但是，这根本无法阻挡强大的邪恶势力。

今天，形式上的奴隶制已经废除了，但是，大部分人都成为资本雇佣的劳动力，一天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会面临生存问题。今天，地球上的土地资源大都得到了各种形式的制度安排，虽然这样的制度安排往往不公平和不尽人意。今天，需要严重关注的是，和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种子资源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这种威胁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比尔盖茨基金会和孟山都等大公司的共谋。

这个共谋发展到今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世界粮食的控制，而且这种控制还在深入，一个具体体现就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这种趋势的恶果就是：农民不再拥有自己的种子，然后因为种子的产权归属大公司，农民以后如果想自己留种就是侵权，会受到指控；种子受到控制以后，粮食就被控制了，那么消费者也就失去了选择权。这个已经不是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了现实。

图中有很多的“0”，这延续了图八中的“0”，“0”代表“无主物”。图的正中可以看出西班牙国徽中的标志。本来柱子上写的是“Non Plus Ultra”，意思是“大海之外，再无领土”，后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就把那个“Non”（无）给去掉了，变成了“Plus Ultra”（大海之外，还有领土）。西班牙500年前的殖民传统今天仍在继续，只不过换了不同的形式。为了控制粮食进而填满钱袋，少数大资本们正在跑步前进，因为它们拥有了以最美妙的名称命名的挣钱的手段，那就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每人分 = 25个国家

国际商业机器  
股份有限公司

时代华纳  
Time Warner

欧洲委员会  
European Commission

通用电气  
General Electric

罗克韦尔  
Rockwell

约翰逊  
&  
约翰逊  
Johnson & Johnson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  
Federation of Economic Organizations of Japan

百利美施珠宝  
Belleme Jewelry

Roundup  
Ready  
去草除根

辉瑞公司  
Pfizer

惠普  
HP

默克公司  
Merck

杜邦  
DuPont

通用汽车  
General Motors

利

润

率

下

降

的

趋

势

#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TRIPS)

15.04.1994

非生物胁迫的耐受性的 (专利) 声明  
美国 20060075523A1

分子标记辅助育种



##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

### 无主物 (0)

特雷弗·威廉姆斯 (Trevor Williams) 是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 (International Board for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IBPGR) 的前总裁。他曾说：“不是原材料给我们带来现钱。”他在 1983 年的植物育种论坛上说：“原种质 (raw germplasm) 只有在被投入了大量时间和金钱以后才有价值。”按照这个思路，农民的时间是没有价值的，而且是免费的。Vandana Shiva: *Biotechnology and the Colonisation of Regeneration*, Bangalore, 1991 Bangalore seminar on Women, Ecology and Health

### 条款 27.1, 1996 年 (Article 27.1, 1996)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 的 27.1 条款指出：“专利适用于所有发明，包括产品和程序，包括所有技术领域，只要它们是新的，涉及一个创新的步骤，并且可以进行产业应用。”这排除了所有行业外的申请。Vandana Shiva, *Biopiraterie*, M ü nster 2002, p. 23 (transl. A.C.)

### 来自至高无上的上帝 (De Sublimus Dei)

1537 年 5 月 29 日，教皇保罗三世的训令 (《来自至高无上的上帝》 Sublimus Dei)：“我们虽然微不足道，但是，在世界上行使着上帝赋予的权力，并竭尽所能让迷途的羔羊回归正道。考虑到，印第安人确实实是人类，虽然他们还不能领会天主教信仰，然而，据我们了解，他们非常渴望得到惠泽。希望可以为清除邪恶提供充足的帮助，我们信守我们的信条，我们取信于公众，听从教会长老的规训，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信奉原教教义，而不是相反，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印第安人和其他人不应该被剥夺自由或者被剥夺财产，虽然他们不信仰耶稣……以教徒的美德的名义，我们信守这些言辞，我们将遵守原教教

义，相信印第安人和其他人都将皈依耶稣，通过聆听教义、通过善举和圣洁生活的榜样行为。” <http://www.papalencyclicals.net/Paul03/p3subli.htm>

### 经济间谍法案 (Economic Espionage Act, 1996)

该法案将偷窃和滥用商业秘密定为联邦犯罪…… 任何个人，触犯其中一条的罚金就高达 50 万美元和入狱 15 年，对于集团犯罪，罚金高达 1 千万美元。（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使用经济间谍法案对“滥用”的界定来巩固执行美国贸易法律，阻止“对美国进口中的不公平竞争和不公平行为”……经济间谍法案是基于美国的国家哲学，美国私营部门的规模巨大而且多样，其强调所有市场参与者的“公平竞争”。许多其他国家，不仅没有这样的法律，甚至鼓励通过国家情报服务和其他办法（包括贿赂和腐败）来支持商业间谍。受美国国会的委托，美国国家情报局反情报办公室（The United States Office of the National Counterintelligence Executive）出版名为《国外经济选读和商业间谍活动》（Foreign Economic Collection and Industrial Espionage）的年报，用来概括国外的（有关）间谍活动。[http://en.wikipedia.org/wiki/Economic\\_Espionage\\_Act\\_of\\_1996](http://en.wikipedia.org/wiki/Economic_Espionage_Act_of_1996) (October 16, 2014)

### 知识产权委员会 (IPC)

知识产权委员会（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mmittee）是由 13 家美国公司组成的联盟，“致力于在关贸总协定回合中进行关于产权问题的全面协议的谈判。”该联盟于 1986 年 3 月由下列公司组成：布里斯托尔梅尔斯（Bristol-Myers），杜邦（DuPont），美国富美实公司（FMC Corporation），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IBM，休利特帕卡德（Hewlett-Packard），约翰逊 & 约翰逊（Johnson & Johnson），默克（Merck），孟山都公司（Monsanto），辉瑞（Pfizer），罗克韦尔国际（Rockwell International）和华纳通讯（Warner Communications）。1986 年到 1996 年期间，成员一直在发生变化。到 1994 年，CBS，杜邦和通用汽车已经退出，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 ) , 宝洁公司 ( Procter & Gamble ) 和时代华纳 ( Time Warner ) 则加入了。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tellectual\\_Property\\_Committee\\_\(US\\_private\\_coalition\)](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tellectual_Property_Committee_(US_private_coalition)) (October 16, 2014)

成立伊始, IPC 的第一个任务是重复美国建国之初所做的“传教”工作, 但是这一次, 对象是欧洲和日本的企业协会, 去说服它们, ( 制订和遵守 ) 行为准则是可能的……这个任务并不容易, 但是我们三方集团有能力从发达国家的各项法律中提炼出一些基本原则, 以保护所有形式的知识产权。同时, 还需要得到美国内部的认同。我们在日内瓦向关贸总协定秘书处提交了文件, 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向驻日内瓦各国代表去陈述我们的原则。这些对于关贸总协定 ( GATT ) 来说还没有先例。企业界精确地指出国际贸易的问题, 描绘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并形成了具体建议书, 并向本国和其他政府进行“推销”。世界贸易中的企业和商人同时扮演了病人、诊断师和药剂师的角色。 James Enyart (Monsanto), A GATT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de, Les Nouvelles, June 1990

## 约翰·洛克 (John Locke)

劳动者创造财富 ( labor creates property ) , 但是劳动者也包含了财富积累的极限: 人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都是有极限的。洛克认为, 财富不被使用就是一种浪费, 是对大自然的一种不敬。然而, 随着“耐用”商品的出现, 人类把易腐蚀的剩余商品交换成耐用商品, 并因此没有违背大自然的法则。货币的出现, 标准着这一过程的完成。货币使得财富的无限积累成为可能, 而且不会引起由于腐烂而导致的浪费……货币的出现消除了积累的极限……洛克意识到了无限积累会导致问题, 但是没有把解决这个问题当作自己的任务。他只是暗示, 政府应该起到协调的作用, 协调财富的无限积累与保证财富分配平等之间的冲突, 但是并没有说政府应该采取什么原则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 洛克把劳动者做为财富的支点, 但是最后却赞同财富的无限积累。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Locke#Theory\\_of\\_value\\_and\\_property](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Locke#Theory_of_value_and_property) (October 16, 2014)

### 分子标记辅助育种 (Marker Assisted Breeding)

MAS……像基因条码扫描仪一样地工作，分析植物 DNA 组成中的独特序列，从而找到所需要的基因。这个过程首先是找到几千个 DAN 的独特小片断，称之为“分子标记”，它们分布在植物基因组里。有些分子标记与生成所需要的特性的基因相关。在育种过程中，如果一个分子标记总是与一个所需要的基因相关，或者因为它们总是在下一代同时出现，或者因为它们总是在下一代同时消失，这个分子标记就可以被用来标记这个基因。因此，一旦一个植物的基因条码被扫描了，而且找到了具体的分子标识，那就可能去筛选成千上万的植物幼苗是否具备所需要的基因……种子现在就如同我们的手机和电脑 - 成了提供专利技术的容器……基因巨头储存成百上千的植物基因垄断专利，公司把拥有这些基因的作物做为基因改造作物来销售，因为其基因特性可以抗环境胁迫，包括旱灾、炎热、极寒、盐碱和其他灾害。

### 孟山都的巨大谋算 (Monsanto Sizing)

美国孟山都公司最近提出了专利申请，代号为：WO2008021413，要求把 175 个不同的基因序列和基因变种侵吞为自己的专利……孟山都明确声明，所有含有那些基因物质的玉米和大豆作物都是其专利，包括用这些作物加工的食品、饲料和生物质。后来又提出另一个专利申请，代号 WO2009011847，孟山都提出了范围更大的要求，把牛繁育的方法，牛本身和“牛奶、奶酪、黄油和牛肉”都做为专利范围。<https://www.testbiotech.org/en/node/352>

### 抢占多基因组专利 (Multi-Genome Patent Grab)

( 抢占 ) 基因组对基因巨头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这可以让它们扫荡专利申请，而不只局限于一种作物的专利申请……很多专利申请把与可以耐受某种非生物胁迫特质相关的 DNA 序列单独提出来。由于同一物种和不同物种中的植物个体中基因序列很相近……这样的专利申请就不只是适用于某个单一的转基因植物物种，而是所有转基因作物的相似的基

因序列。专利申请包括了任何 - 与可以耐受某种非生物胁迫特质相关的 - “本质一样”的基因或者蛋白质的转基因作物，这样的专利也包括了 - 使用分离出的基因序列来 - 进行基因工程以应对非生物胁迫的方法。例如，杜邦（先锋种子）2007年11月的“非生物胁迫耐受性的转录激活因子”（transcriptional activators）的专利内容就包括了增加植物抗旱和抗寒的基因序列的表达方法……这种专利申请不是只局限于一个作物的抗寒 / 旱，而是使用该转基因技术的所有单子叶植物（玉米、大麦、小麦、燕麦、高粱或者水稻）和双子叶植物（大豆、紫花苜蓿、红花、烟草、向日葵、棉花或油菜）。单子叶和双子叶植物是开花植物的主要种类。几乎世界上所有的粮食都来自开花植物……

一个先正达的专利申请也谋求了很大的专利范围，包括了赋予非生物胁迫耐受的基因序列：“抗寒、抗盐碱、抗渗透或者多种耐受”。这样的专利可以扩展到“本质相似”的基因序列，无论是单子叶还是双子叶，还有谷物（包括：玉米、水稻、小麦、大麦、燕麦、黑麦、小米、买罗高粱、黑小麦、几内亚草，鸭茅，高粱和草坪草）。专利内容也包括使用这些所指基因序列做为载体和表达盒的植物，也包括含有 - 改变对非生物胁迫进行响应的 - 这种多核苷酸的植物。Earth Grab: Geopiracy, the New Biomasters and Capturing Climate Genes, [www.etcgroup.org](http://www.etcgroup.org)

### 第 301 条 / 301 专门条款 (Section 301/Special 301)

《1974年贸易法》(Trade Act of 1974)的第301条是美国针对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不足所产生的对外贸易壁垒的原则立场。《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强化了第301条，出台了“301专门条款”，要求美国贸易代表(U.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对外国知识产权政策和行为进行年度评估。每年4月30日，美国贸易代表必须指出哪些国家不提供“足够和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也包括不能为“依赖知识产权的美国人提供公正和平等市场准入”的国家。依据《乌拉圭回合协议法案》(Uruguay Round Agreements Act)通过的“301专门条款”的修正案，美国贸易代表可以认为一个国家没有充分的知识产权保护，即使这个国家履行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

权协议》(TRIPS)。这样的判断将被提交到美国贸易代表的年度“301 专门条款”报告中。

“美国贸易代表的年度‘301 专门条款’报告表明，从美国的角度，知识产权保护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状况都很薄弱，而且各国关注知识产权问题的意愿也差别很大。”[http://itlaw.wikia.com/wiki/Special\\_301](http://itlaw.wikia.com/wiki/Special_301) (October 16, 2014)

### 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The Tendency of the Rate of Profit to Fall)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引起了一场生物产品和生产过程的革命。与微软产业进行比较，固定成本投入很高，而复制新技术的可变成本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此，对边际成本的价格进行竞争是没有意义的。……可以用这个逻辑去定义孟山都，孟山都的目标是成为种子行业的微软。Brian D. Wright: International Crop Breeding in a World of Proprietary Technology, in: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000

###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ade 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是由世界贸易组织(WTO)管理执行的国际协议……于1994年，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最后形成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一次将知识产权法引入了国际贸易体系，是至今为止最全面的关于知识产权的国际协定……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也明确了执行细则、补救措施、争端解决程序……这个条款的采纳是美国游说集团的重大成就，也得到了欧盟、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支持。……美国将贸易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准相联系的战略，可以追溯到辉瑞公司(Pfizer)高级管理层在1980年代的创业精神，其动员美国的公司，将知识产权优势最大化做为美国贸易政策的第一优先战略……。乌拉圭回合之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成为成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基础。签署认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强制性要求，因此，任何国家如果想被由世界贸易组织搭建的国际市场

所接纳，就必须认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中所授权的那些苛刻的知识产权法律。正因为如此，TRIPS是知识产权法律全球化的最重要的多边谈判手段……而且，不像其他知识产权协议，TRIPS具有强有力的执行机制。（相关）国家可以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的解决争端机制受到约束。[http://en.wikipedia.org/wiki/TRIPS\\_Agreement](http://en.wikipedia.org/wiki/TRIPS_Agreement) (October 16, 2014)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的框架是由下面三个组织设计和完成的：知识产权委员会（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mmittee, IPC），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Keidanren），和工业和雇主联合会欧洲联盟（the Union of Industrial and Employers' Confederations of Europe, UNICE）。IPC是12家美国大公司的联盟……Keidanrens是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UNICE是欧洲企业和商业的官方代言人。Vandana Shiva, *Biopiraterie*, Münster 2002, p. 23 (transl. Karl Hoffmann)

# 第七章 更好的社区和环境是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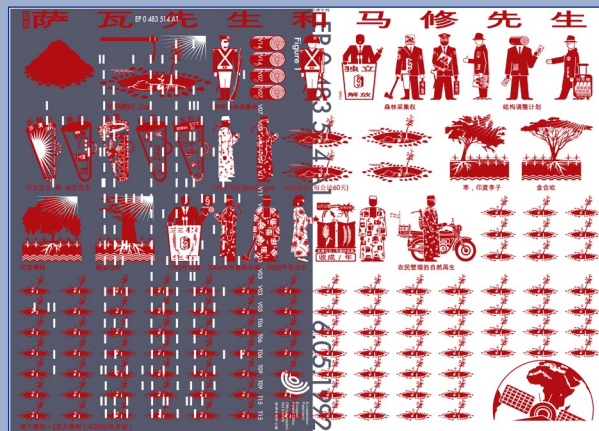


图 X \_ 萨瓦先生和马修先生



这一部分的内容介绍了西非两位农民为改善农林生产所付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效；还介绍了农林间作的“农民管理的自然再生”方法只有在适宜的所有权保障下才取得推广和成功。也就是说，这样的努力要想取得成功需要多种条件：第一，恢复、利用和改进当地的农林耕作和管理方法；第二，政府管理的模式不是破坏而是鼓励可持续农业；第三，当地人和政府形成不依靠外来经济模式的在地可持续生产和经济模式。

萨瓦先生是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Burkina Faso）的农民，他成功地采用当地传统农业技术来恢复沙化和干旱的土壤，主要依靠当地传统的简单方式：碎石埂和凹孔，并在当地广泛推广这些方法。以碎石埂为例，是用拳头大小的石头在田地里堆积成的一条条田埂。目的是形成一个个小田块。下雨的时候，雨水会冲刷地表的淤泥，不过有了碎石埂，淤泥就被截流下来。同时，碎石埂使得水流的速度减慢，给予土壤更多吸收水分的时间。堆积的淤泥也使得土壤变得更肥沃些，利于种子发芽和作物生长。植物可以进一步减缓水流的速度，植物的根可以疏松板结的土壤，使得土壤更容易吸收水份。

再以农林间作（agro-forestry）为例，美国地质调查局（US Geological Survey）的卫星照片分析可以辨别出尼日尔和尼日利亚的边界。在尼日尔一边，农民对自己的树木有所有权并且广泛采用了“农民管理的自然再生”方法，因此树木覆盖率很高；而在尼日利亚一边，大规模的植树造林项目失败了，土地几乎完全裸露。结合卫星图片、实地调查和二手信息，估计尼日尔农民培育了2亿棵树，恢复了1250万英亩的曾经退化的土地。

图十的图画展示了西非国家所经历的历史过程：传统的农作方式是可持续的 - 殖民者入侵砍伐树木 - 国家独立 - 政府剥夺农民的森林使用权力 - 一部分国家把森林使用权力交还给农民 - “农民管理的自然再生方法”得以普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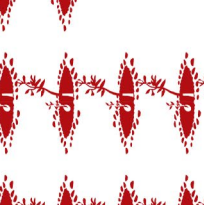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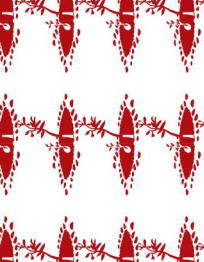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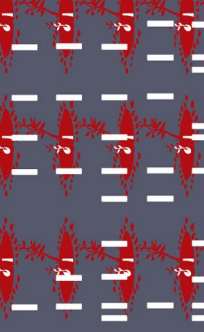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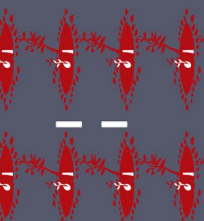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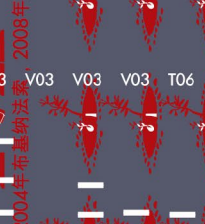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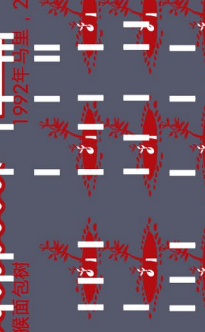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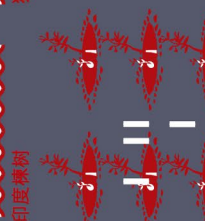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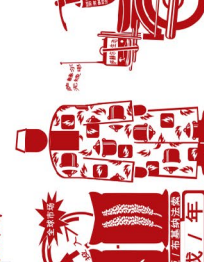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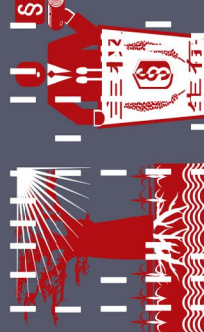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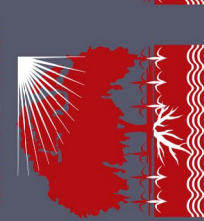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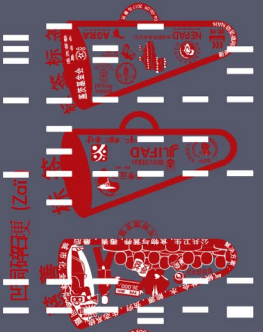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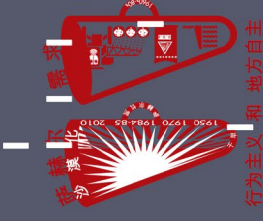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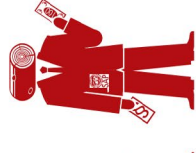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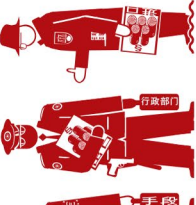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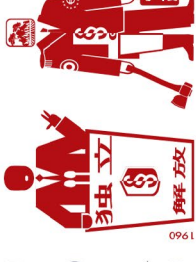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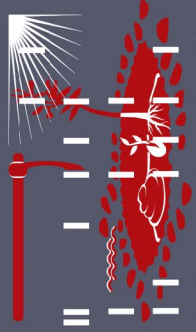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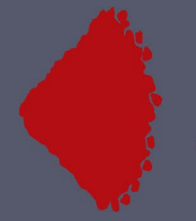


Figure 1

V14 V14 V07 V07

V07 V07 V07 V07 V11

V03 V03 V03

T06 T06 T06

T09 T09 T15 T15

1924 / 85 (Barahgaon)

1922年注册, 2004年布基纳法索, 2008年尼日尔

印度横树

猴面包树

印度横树

猴面包树

印度横树

猴面包树

印度横树

猴面包树

印度横树

猴面包树

印度横树

猴面包树

印度横树

猴面包树

印度横树

猴面包树

印度横树

猴面包树

印度横树

猴面包树

印度横树

猴面包树

印度横树

猴面包树

印度横树

猴面包树

印度横树

猴面包树

印度横树

猴面包树

EP 0 483 514 A1

农业林业 (每公顷60天)

收成 / 年

6.05.1992

Euroasisches Patentamt  
European Patent Office  
Office européen des brevets  
欧洲专利办公室

每个图形=2百万棵树 (从2005年开始)

## 萨瓦先生和马修先生

---

### 萨赫尔干旱 (Sahel Drought)

萨赫尔干旱是一系列有历史记载的干旱，至少从 17 世纪开始就对萨赫尔地区产生影响。萨赫尔地区的南部是非洲稀树草原 (African savanna grasslands)，北部是撒哈拉沙漠，其被夹裹在中间形成了一个气候带。这一地区发生干旱的频率从 19 世纪末开始增加，三次持续时间很长的干旱对萨赫尔地区的国家产生了巨大的环境和社会影响。

在 1910 年代、1940 年代、1960 年代、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的严重旱灾之后都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从 1975 年到 1980 年，情况有些好转。虽然上几个世纪在萨赫尔地区都发生过严重的旱灾，最近几次的旱灾是最为严重的。60 年代到 80 年代的旱灾导致了两次大规模的饥荒和逃难（从 1968 年到 1974 年，从 1980 年代初到 1980 年代），那期间饥荒导致 10 万人死亡，75 万人需要依靠粮食救济，萨赫尔地区的 5 千万人口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http://en.wikipedia.org/wiki/Sahel\\_drought](http://en.wikipedia.org/wiki/Sahel_drought) (October 16, 2014)

### 剥夺 / 森林采集权 (Exploitation of/Right to Wood Harvest)

在马里，树木管理一直是传统农业的一部分。Ende 村的农民 Salif Guindo 解释了他们如何重建一个叫作 Barahogon 的古老的农民自发协会，这个协会几十年来鼓励农民进行树木管理。但是，当砍树成为犯罪行为以后，也就放弃使用树木了。首先，法国殖民政府声称，所有树木属于国有财产，政府官员把林材卖给了伐木者。马里独立以后，这样的做法还在继续。而且，农民如果剪枝或者砍树就会受到惩罚。结果，农民干脆把树苗连根拔起，免得日后的麻烦。几代人过去了，土地的森林覆盖被剥光了，变得越来越干燥。

1990 年代初，新的马里政府——考虑到农民因为对现状不满，杀死了好几个村的森林管理局的官员——通过了一个法律，农民对其土地上的林木有所有权。农民一直不知道这个法律，直到 Sahel Eco 组织了一个倡导活动，通过广播和直接通知，农民才知道

了。从那时候开始，“农民管理的自然再生”方法（Farmer-managed natural regeneration, FMNR）开始快速推广，甚至推广到了国外。Salif 说刚接待了一个访问，来自 Burkina Faso 的 20 个市长 / 镇长和农业及环境部门的省领导参观了这里：“他们听到我们的故事和看到我们的成绩时，非常震惊。他们问，这真的可能吗？”

尼日尔也是同样的情况，让 FMNR 获得关注并不容易，特别是因为其包含了一些“反常”的内容，就是说，种树后允许农民砍树……只有在尼日尔政府撤销了禁止砍伐的规定后，才赢得了种树的契机。这种状况在整个萨赫尔（Sahel）西部都是如此：FMNR 自发地在农民中间和村庄之间推广开来，主要因为人们亲眼看到了成果，所以主动采纳这个方法。Mark Hertsgaard, *Regreening Africa*, *The Nation*, November 19, 2009, <http://markhertsgaard.com/regreening-africa/>

### 行为主义和项目补贴主义（Behaviorism & Subsidiarity）

萨赫尔地区（the Sahel zone）几十年来就是带有各种政治背景的世界各种援助项目集中的地方。例如：杰佛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发起的千年村项目（the Millennium Villages）、肯尼亚的绿带运动（the Green Belt Movement）和绿色长城项目（the Great Green Wall）。千年村项目的支持者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地球研究所（Earth Institute at Columbia University）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千年承诺项目（Millennium Promise）。目标是结束绝对贫困和实现前年发展目标（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千年村项目声称，要确保社区具备真正的、可持续的机会，并从贫困陷阱中走出来。……千年村花费了巨额投入，只获得了很小的成果。这是因为，千年村项目使用了化肥和杂交种（而且种植玉米，玉米并不是当地的传统作物）。瑞秋·贝兹纳·克尔（Rachel Bezner Kerr）说，使用化肥和转基因种子，导致农民对市场销售的产品依赖，而这些产品由大公司控制。[http://en.wikipedia.org/wiki/Millennium\\_Villages\\_Project](http://en.wikipedia.org/wiki/Millennium_Villages_Project) (October 16, 2014)

千年村项目免费为村民提供被认为是发展必须品的东西：现代化的种子和化肥，洁净

水的水井，诊所……千年村项目需要给每个村巨大的投入，而且长期需要外来支持，这实在不是持续的办法。很难让人相信，外部世界会提供上亿美元的外援来维持成百上千个非洲的千年村。也的确如此，外援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就瘫痪了。Mark Hertsgaard, *Regreening Africa: The Nation*, November 19, 2009, <http://markhertsgaard.com/regreening-africa/>

绿色长城项目 ( the Great Green Wall ) 是由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 ( Olesegun Obasanjo ) 在 2005 年首先提出的……他敦促种植环绕非洲的 15 公里宽的树带，防止撒哈拉沙漠随着气候恶化继续向南部侵蚀……非洲国家首脑支持奥巴桑乔的建议，这个想法也获得了国际支持，随后建立了非洲欧盟气候变化伙伴关系 ( Africa-European Union Partnership on Climate Change ) ，该合作于 2007 年正式采纳了这个建议。有评论警告说，跨越几千英里的非洲干旱大陆大规模地种树，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小树需要悉心照顾才能存活，浇水、剪枝、防止动物破坏。当地人需要一定的激励才会去做这些，而且本来就缺水的地方没有水来灌溉树苗……。绿色长城项目是一个太好的想法，所以不可以失败。……除了担心奥巴桑乔“纸上谈兵”，估计这个项目会让非洲林业部门更富有，而不是当地的社区，还有一个问题，该项目事实上本身就基于一个基本的错误科学。美国地质调查局 ( US Geological Survey, USGS ) 的高清晰度的卫星图片显示，撒哈拉沙漠根本就没有向南部侵蚀……地质学家 ( 阿卜杜拉耶，Abdoulaye ) Dia 教授清楚地知道学界对绿色长城项目的不切实际，但是，同意这样的批判就意味着失去赞助和其他国家的首脑的支持。<http://mondediplo.com/2011/12/11africatrees>

让“农民管理的自然再生” ( Farmer-managed natural regeneration, FMNR ) 实践如此赋权和持续的原因是，非洲人可以利用自己的技术，而且知识是不用付费的。这个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也就是说，农民可以现在就使用这个技术，而不需要等待和依靠外国政府或者人道援助机构提供资金援助。Mark Hertsgaard: [http://afrique-europe-interact.net/index.php?article\\_id=223&clang=1](http://afrique-europe-interact.net/index.php?article_id=223&clang=1)

专利申请: EP0483514 (A1) 1992-05-06(Claims:Patent EP0483514 [A1] 1992-05-06)

### 在树木育种中使用分子标识技术

- 1、这是一种树木育种方法，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RFLP）技术被应用到多个树木样本上；从 RFLP 技术中获得的信息以基因相关性级别的形式展现出来，在一个级别层次上包含不同的组别，每一组都关系到两棵基因更相关的树，这两棵树彼此的相关性比和任何其他一棵树的都要大；这两棵树的相关的相对遗传多样性被选择出来；然后，一棵树或者很多树可以从这两棵树之间培育出来。
- 2、依据条款 1 中描述的方法，新树种可以通过两棵所选树木培育出来。
- 3、依据条款 1 中描述的方法，新树种可以通过克隆两棵所选树木培育出来。
- 4、条款 1、2、3 中描述的方法，所指的树木是商业品种。
- 5、条款 4 中的方法，所指的品种是一个桉树品种。
- 6、前面条款中的方法，所指的样本是树叶样本。
- 7、从条款 1 到 5 的方法，所指的样本是培芽样本。
- 8、在树木培育中使用的方法，所指的 RFLP 技术被应用到从系谱树 (progeny tree) 中获得的物质，应用到从系谱树的母本树获得的物质，应用到从很多树中获得的物质，这些树有可能是所指的系谱树的父本，并且从这里获得的资料要被分析以便确认这棵树是否可能是所指的父本，而且是所指的系谱树的可能父本。
- 9、依据条款 8 的方法，也应用于树林中母本树的多样性。
- 10、树木育种使用的一个方法，所指的 RFLP 技术被应用到一批种子中的一些种子上，那么从这里获得的资料就用来给所指的这批种子提供评估标准。
- 11、依据条款 10 的方法，评估的标准是树木自体授粉的程度。
- 12、依据条款 10 的方法，评估的标准是花粉父母在所指的那批种子中所占的比例。
- 13、依据条款 10 的方法，所指的这批种子的评估的标准，与用同样标准建立起来的

第二批种子进行比较。

14、依据前面任何一条的方法，用于 RFLP 技术的探针包括一个或者多个 GLPP011; GLPP029; GLPP063; GLPP093; P002 AND P022。

15、RFLP 技术探针表括 GLPP011。

16、RFLP 技术探针表括 GLPP029。

17、RFLP 技术探针表括 GLPP063。

18、RFLP 技术探针表括 GLPP093。

19、RFLP 技术探针表括 P002。

20、RFLP 技术探针表括 P022。

Claims: EP0483514 (A1), 1992-05-06

## 萨瓦先生和马蒂厄先生

(Monsieur Yacouba Sawadogo and Monsieur Mathieu Ouédraogo)

萨瓦先生是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 (Burkina Faso) 的农民，他成功地采用当地传统农业技术来恢复沙化和干旱的土壤……马蒂厄先生是另外一位当地的农业革新者，从 1980 年开始，他们就一起进行各种土壤恢复的技术实验。他们主要依靠当地传统的简单方式：碎石埂和凹洞 (zai holes)。他们也在当地广泛推广这些方法。[http://en.wikipedia.org/wiki/Yacouba\\_Sawadogo](http://en.wikipedia.org/wiki/Yacouba_Sawadogo) (October 16, 2014)

萨瓦的实验成功了：利用凹洞 (pits) 聚集水和肥料，农作物产量提高了。还有他没有预料到的最重要的成果：小树开始在小米和高粱中间发芽，这要感谢大粪带来的树种。随着一个接一个的生长季节，很明显，这些长到几尺高的树木不仅提高了农作物产量，而且帮助恢复了土壤肥力。

萨瓦的努力看似很小，但是这却是人类面临的最重要的考验。无论在哥本哈根和其后

发生什么，几十年来这个世界已经陷入了气温升高所造成的各种后果：更严重的干旱、更大的洪水、更多的害虫……萨瓦和其他生活在萨赫尔地区（Sahel）的成百上千贫困农民所采用的树木农作（the tree-based farming）方式，可以帮助世界其他地方的无数农民来应对气候变化。这样的农作方式已经在布基纳法索和邻国尼日尔、马里推广开了，帮助上百万英亩已经在1980年代就半沙漠化了的土地恢复了生产力。这个变化遍及了广泛的区域，这片新绿都可以从卫星照片上看到。随着气候恶化，地球上更多的地方将变得像萨赫尔地区一样干旱和贫瘠。因此，向萨赫尔地区学习这些正在发生的“安静地绿色奇迹”（quiet green miracle）就意义重大。Mark Hertsgaard, *Regreening Africa*, *The Nation*, November 19, 2009, <http://markhertsgaard.com/regreening-africa/>

### 碎石埂（Cordons pierreux）

碎石埂（cordons pierreux）是用拳头大小的石头在田地里堆积成的一条条田埂。目的是形成一个个小田块。下雨的时候，雨水会冲刷地表的淤泥，不过有了碎石埂，淤泥就被截流下来。同时，碎石埂使得水流的速度减慢，给予土壤更多吸收水分的时间。堆积的淤泥也使得土壤变得更肥沃些，利于种子发芽和作物生长。植物可以进一步减缓水流的速度，植物的根可以疏松板结的土壤，使得土壤更容易吸收水份。[http://en.wikipedia.org/wiki/Yacouba\\_Sawadogo](http://en.wikipedia.org/wiki/Yacouba_Sawadogo) (October 16, 2014)

### 凹洞（Zai）

凹洞（Zai/Tassa）是在田里挖的洞，用来集水，这是一种过去在西部萨赫尔（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和马里）使用的传统方法，用来恢复退化的旱地和增加土壤肥力。1980年代，布基纳法索农民萨瓦重新使用了这个方法，并进行了革新，在凹洞中填上农家肥和其他可生物降解的废弃物，为植物提供养料。农家肥吸引白蚁，白蚁的洞穴帮助疏松土壤。萨瓦挖的凹洞比传统的要大些。凹洞帮助提高树木、高粱和小米的产量。

……凹洞和其他集水技术帮助提高了地下水位。雷吉（Reij）说“1980年代，地下水



位平均每年降低 1 米。自从采用了 FMNR 方法，集水技术开始奏效，虽然人口在增加，地下水位还是提高了 5 米。”在有些地方，水位提高了 17 米。有分析表明，降水量从 1994 年开始增加。雷吉说，但是降水量的增加不能解释地下水位的升高，因为：“（地下）水位从 1994 年前就开始升高了，要一到二年后才能感觉到变化。”也有研究记录表明，在尼日尔发生了同样的水位上升的情况。<http://en.wikipedia.org/wiki/Za%C3%AF> (October 16, 2014) Mark Hertsgaard, Regreening Africa, The Nation, November 19, 2009: <http://markhertsgaard.com/regreening-africa/>

## “农民管理的自然再生” (FMNR) 方法 (Farmer-managed natural regeneration [FMNR])

是对包括树桩、根部和种子在内的树木和灌木的系统再生和管理方法。FMNR 方法尤其适用于热带干旱地带，当然也适用于其他地方。这个方法可以帮助退化的耕地和草场恢复生产力，也可以用于恢复退化的森林，进而抗拒正在丢失的生物多样性，和减少对抗气候变化的脆弱性。FMNR 方法也可以对尚未退化的土地起到保养的重要作用，还可以和其他土地可持续管理的方法相结合，包括对农地的保护和对草地的综合管理。

FMNR 方法改进了几个世纪以来保留下来的林地管理的方法，被称作：修剪和整形 (coppicing and pollarding)，这样就可以随着树木的生长不断提供薪柴、建筑用材、食物和饲料，而不需要不断花钱植树。在农地上，树木被修整和剪枝以便更快生长，同时也为一年生作物提供更好的生长环境（比如：水利和阳光）。当 FMNR 方法被综合应用到农地和草场时，作物产量得到提高，土壤更加肥沃，有机质和土壤湿度提高，树叶饲料也增多了。风灾、极热和土壤流失都减少了。[http://en.wikipedia.org/wiki/Farmer-managed\\_natural\\_regeneration](http://en.wikipedia.org/wiki/Farmer-managed_natural_regeneration) (October 16, 2014)

## 摩托车 (Motorcycle)

萨瓦说：“我认为树木至少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部分答案，而且我已经和很多人分

享了我这个看法。我骑着摩托车走访了上百个村庄，一些人 also 来我家进行探访和学习。我很骄傲，这些做法得到了推广。”要澄清一个事情，这些农民不是在种树，不是像诺贝尔奖得主万加丽·马萨伊（Wangari Maathai）在肯尼亚所推进的绿带运动（Greenbelt Movement）那样。我们的农民只是照看那些自己发芽了的树木。植树成本很高，而且对贫困农民来说风险很大。在西萨赫尔地区的研究发现，人工种植的树木中 80% 会在 1 到 2 年内死掉。相反，自己发芽的树木都是当地品种，所以适应力强。还有就是，一分钱也不用花。Mark Hertsgaard, *Regreening Africa*, *The Nation*, November 19, 2009, <http://markhertsgaard.com/regreening-africa/>

### 卫星 (Satellite)

FMNR 方法的传播是自发发生的，农民传播给农民，一个村庄传播到另一个村庄，因为人们亲眼看到了效果。要感谢农林间作（agro-forestry），美国地质调查局（US Geological Survey）的卫星照片分析可以辨别出尼日尔和尼日利亚的边界。在尼日尔一边，农民对自己的树木有所有权并且广泛采用了 FMNR 方法，因此树木覆盖率很高；而在尼日利亚一边，大规模的植树造林项目失败了，土地几乎完全裸露。

2008 年，当这些卫星图片公诸于众的时候，就连推广 FMNR 方法的活跃分子雷吉（Reij）和里纳乌多（Rinaudo）都很吃惊，因为他们也没有想到这么多农民培育了这么多的树木。结合卫星图片、实地调查和二手信息，雷吉估计，在尼日尔农民培育了 2 亿棵树，恢复了 1250 万英亩的曾经退化的土地。Mark Hertsgaard, *Regreening Africa: The Nation*, November 19, 2009, <http://markhertsgaard.com/regreening-africa/>

## 第八章 强盗的狂欢



图 XI \_ 博格论坛（博格世界粮食奖国际讨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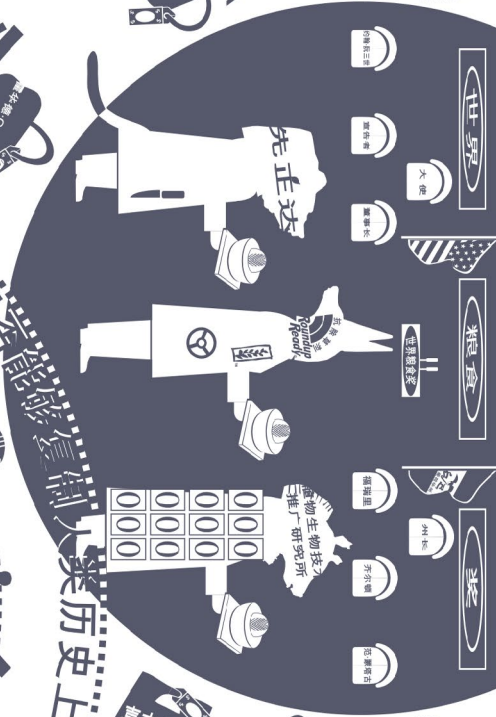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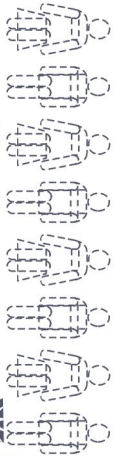
通过阅读这一部分的文字，我们就可以充分理解这张图中的讽刺意味。“世界粮食奖”声称要去“奖励那些通过提高世界粮食的质量、数量和供应，进而促进了人类发展的人们”。当我们仔细研究谁是世界粮食奖的赞助者，还有谁是世界粮食奖的得主的时候，就可以不言自明了，就如同“把粮仓交给老鼠来守护”，就如同把“果园交给山羊来把门”。

# 诺尔曼 E. 博格格博士的世界粮食获奖者大厅

德梅因

听众

每个人形 = 50位国际来宾



2013年10月15日

我们是农业的顶级会议

全球农业的顶级会议

绿色革命的顶级会议

饥饿作为一个经济问题

大规模地减少饥饿的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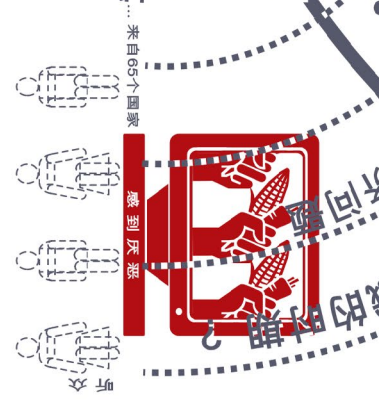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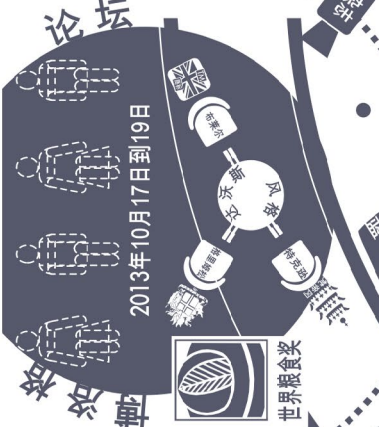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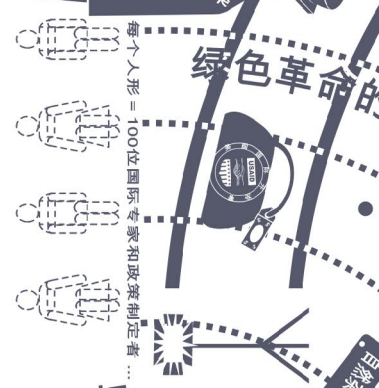


图 XI

## 博洛格论坛（博洛格世界粮食奖国际讨论会）

---

### 世界粮食奖（World Food Prize）

“世界粮食奖”是一项国际奖项，奖励那些通过提高世界粮食的质量、数量和供应，进而促进了人类发展的人们……198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诺尔曼）博洛格（Norman E. Borlaug）与通用食品公司（General Foods Corporation）总裁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en）相遇。诺尔曼·博洛格表达了他长期以来希望设立的一个重大农业奖项的愿望……

1990年，商人和慈善家约翰·阮（John Ruan）承诺了奖金赠款，并设立了世界粮食奖基金会（World Food Prize Foundation），总部设在爱荷华的得梅因。奖金将奖励对世界粮食供应做出贡献的人们，包括：食品和农业科学技术、加工、营销、营养、经济、扶贫、政治领导和社会科学。奖金得主将在爱荷华得梅因得到颁奖，并举行电视直播的庆典。

[http://en.wikipedia.org/wiki/World\\_Food\\_Prize](http://en.wikipedia.org/wiki/World_Food_Prize) (October 16, 2014)

### 世界粮食奖捐款人（World Food Prize Donors）

这是美国国务院第十次来主持“世界粮食奖”颁奖典礼了……美国政府的参与正好说明了这个奖项在评选农业突出贡献者的指标上的中立性，基金会的赞助者有着极大的兴趣来促进全世界的农业产业化……从2009年到2011年，一共有125位捐款方赠款超过500美元，这其中，有26个赠款方与农商业或农商业基金会没有直接关联。而且，这些人的赠款金额占那期间总金额的28%……ADM、嘉吉公司（Cargill）、孟山都公司和米尔斯将军（General Mills）在这期间一共捐款超过50万美元。

势力雄厚和政策干预性强的慈善机构也是该奖的捐款大户。2009年到2011年期间，盖茨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赠款合起来达到193万美元……。近些年，许多世界粮食奖得主都是那些倡导规模产业化农业的先锋，而主导这样的生计方式的正是该奖项的

赞助商们……乔·勒克 ( Jo Luck ) 和佩德罗·桑切斯 ( Pedro Sanchez ) 分别在 2010 年和 2012 年获奖，他们都曾在杜邦公司的政策顾问委员会任职。2011 年，前加纳总统约翰·库福尔 ( John Kufuor ) 获奖……库福尔政权是农业产业化的强大联盟，其国来自美国农商业的投资也在增加。<http://www.motherjones.com/blue-marble/2013/06/why-did-john-kerry-announce-world-food-prize>

### 世界粮食奖得主 (World Food Prize Laureates)

( 2013 年 6 月 19 日 ) 在华盛顿 D.C, 美国国务院举行典礼，公布三位杰出的科学家：马克·范·蒙塔古 ( Marc Van Montagu )、玛丽-戴尔·齐尔顿 ( Mary-Dell Chilton )、以及罗伯特·福瑞里 ( Robert Fraley ) 今天获得 2013 年世界粮食奖。在典礼上，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 ( John Kerry ) 致辞，世界粮食奖董事长约翰·阮三世 ( John Ruan III ) 也出席了典礼……世界粮食奖主席肯尼思·奎因 ( Kenneth Quinn ) 大使强调……“这三位科学家因为他们各自独立在现代农业生物技术的奠基、发展和应用上取得的成绩而得到认可”……马克·范·蒙塔古是比利时根特大学 ( Ghent University ) 植物生物技术推广研究所 ( Institute of Plant Biotechnology Outreach ) 的创始人；玛丽-戴尔·齐尔顿是先正达生物技术 ( Syngenta Biotechnology ) 的创始人；罗伯特·福瑞里是孟山都的副总裁，他们将于 10 月 27 日在爱荷华州首府的第 27 届“世界粮食奖”的颁奖典礼上正式获奖，届时还将在得梅因举行“博洛格国际讨论会”，这一届关注的主题是：“下一个博洛格世纪：生物技术、可持续性和气候无常”。[http://www.worldfoodprize.org/index.cfm/24667/24410/three\\_biotechnology\\_scientists\\_awarded\\_2013\\_world\\_food\\_prize](http://www.worldfoodprize.org/index.cfm/24667/24410/three_biotechnology_scientists_awarded_2013_world_food_prize)

### 博洛格论坛 (博洛格世界粮食奖国际讨论会) (Borlaug Dialogue)

颁奖典礼和诺尔曼·E·博洛格 ( Norman E. Borlaug ) 国际论坛，被称为博洛格论坛，每年对饥饿和食品安全问题进行探讨。过去的研讨集中探讨了生物燃料对全球发展带来的承诺和挑战，我们同时面临营养不良和肥胖症的双重挑战，用水危机及其对中东发展和稳

定的影响，还有，“绿色革命的终极版：我们是否能够复制人类历史上那个唯一的大规模地减少饥饿的时期？”2008年，世界粮食奖基金会（the World Food Prize Foundation）接受了孟山都捐赠的500万美元的赠款，以确保论坛可以继续办下去。捐款用来支持重新启动的将历史建筑：得梅因公共图书馆（Des Moines Public Library）改成公共博物馆：获奖者大厅（the Hall of Laureates）的募捐倡议，用于表达对诺尔曼·博洛格和世界粮食奖的得主们的敬仰。2013年博洛格论坛于2013年10月16日到19日举行的。[http://en.wikipedia.org/wiki/World\\_Food\\_Prize\\_\(October\\_16,\\_2014\)](http://en.wikipedia.org/wiki/World_Food_Prize_(October_16,_2014))

三天的会议将国际专家、决策者、企业总裁和农民召集在一起，共同讨论关于食品安全和营养的前沿问题。2012年的会议吸引了来自65个国家的超过1000名代表的参与，被称为“世界上讨论全球农业问题的顶级会议”。<http://www.worldfoodprize.org/index.cfm?nodeID=71721&audienceID=1>

再一次，我们迎来了来自各地的卓越的发言人，包括：冰岛总统奥拉维尔·拉格纳·格里姆松（H.E. Olafur Ragnar Grimsson）阁下，加纳的枢机主教彼得·特克逊（Peter Turkson），他也是梵蒂冈的宗座正义与和平委员会（the Pontifical Council for Justice and Peace）的主席。我要宣布一个非常特殊的消息：我们非常荣幸地告诉大家，曾在1997年到2007年任英国和北爱尔兰首相，和非洲治理倡议（the Africa Governance Initiative）的赞助人托尼·布莱尔，将做为一个特殊论坛“40个机会”的发言人，该论坛由霍华德·巴菲特（Howard G. Buffett）主持，将讨论重新界定如何对抗饥饿、贫困和苦难。我们也非常高兴霍华德的儿子和他妻子莉莉今天也来到了这里。[Ambassador Kenneth M. Quinn, president of the World Food Prize Foundation, Remarks from the World Food Prize Laureate Announcement, June 19, 2013 http://www.worldfoodprize.org/index.cfm/24667/24412/amb\\_kenneth\\_m\\_quinns\\_remarks\\_from\\_the\\_world\\_food\\_prize\\_laureate\\_announcement](http://www.worldfoodprize.org/index.cfm/24667/24412/amb_kenneth_m_quinns_remarks_from_the_world_food_prize_laureate_announcement)

## 灾难资本主义：约翰·克里（Disaster Capitalism: John Kerry）

今天，所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面临气候变化的威胁，这种威胁非常真实地存在，

虽然很多人不愿意承认，气候变化也与饥饿、难民、灾祸和粮食供应相关 - 这真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也是关键的时刻……因为尽管技术在进步，仍有近 8.7 亿，占世界人口八分之一的人们长期处于饥饿状态。

并且，很明显，存在这样一个陷阱，其阻止人们实现上帝赋予的潜力，更严重的是，在那些地方人们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社区处于极度贫困中，这样的贫困就如同恐怖袭击一样可怕。这也意味着国家的失败。这也是对建设一个有秩序的、稳定的世界的挑战。最终，为粮食而战，其实是为生命而战。

所以，赌注非常大，挑战之大超过我们今天统计数据所告诉我们的和我们正在面临的一切。这个挑战就是，到了 2050 年，世界人口达到 90 亿。那就需要比现在增加 60% 的粮食生产……

去年，奥巴马总统和非洲国家领导人宣布成立“食品安全和营养新联盟”（New Alliance for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是在寻求将私营部门吸引进来的方式，目标是在未来的 10 年内帮助 5 千万人口脱贫。项目开始的第一年，就确保了 40 亿的投资承诺。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正在埃塞俄比亚（Ethiopia）所做的事情，我几个星期以前在参加庆祝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成立 50 周年的活动时刚去了那里。在那里，给 1 万 5 千名农民发放了良种，这将预计可以增加 50% 的产量。[World Food Prize; Source: US State Department,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3/06/210896.htm](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3/06/210896.htm)

### 斯瓦米纳桑博士 (Dr. M.S.Swaminathan)

在一个书面陈述中，印度知名科学家、世界粮食奖评选委员会主席斯瓦米纳桑博士说：“到 2013 年，发现 DNA 分子就已经 60 年了。在过去 60 年间，分子遗传科学为未来的农业、工业、医学和环保开放了不同寻常的机遇，马克 - 范·蒙塔古（Marc Van Montagu）、玛丽 - 戴尔·齐尔顿（Mary-Dell Chilton）、以及罗伯特·福瑞里（Robert Fraley），每个人都进行了突破性的分子研究，如何将植物细菌作为一种工具，将其它生物物质注入到植物细胞中，进而产生新的基因链，以得到所期望得到的特质。” <http://www.worldfoodprize.org/>



[index.cfm/24667/24410/three\\_biotechnology\\_scientists\\_awarded\\_2013\\_world\\_food\\_prize](http://index.cfm/24667/24410/three_biotechnology_scientists_awarded_2013_world_food_prize)

曼克母布·萨母巴斯万·斯万米纳桑 (Mankombu Sambasivan Swaminathan) 出生于 1925 年 8 月 7 日，是一位印度遗传学家和国际管理者，他因为在印度“绿色革命”中的领导作用而闻名……他是 MS 斯万米纳桑研究基金会的创始人和主席……从 1972 年到 1979 年，他是印度农业研究理事会 (the Indian Council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总干事；从 1979 年到 1980 年，他是农业部的首席秘书；从 1982 年到 1988 年，他是国际水稻研究所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的总干事，在 1988 年成为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的主席。

[http://en.wikipedia.org/wiki/M.\\_S.\\_Swaminathan#Honours.2C\\_awards\\_and\\_international\\_recognition](http://en.wikipedia.org/wiki/M._S._Swaminathan#Honours.2C_awards_and_international_recognition) (October 16, 2014)

## 爱荷华饥饿峰会 (Iowa Hunger Summit)

“世界粮食奖”设立了“爱荷华饥饿峰会”，作为庆祝爱荷华在与饥饿和贫困的斗争中取得的巨大成功，并联合起来在以后的行动中继续这种斗争。峰会每年都在粮食奖颁奖的那个星期举办，于 10 月份在得梅因市中心万豪酒店举行。“爱荷华饥饿峰会”汇集了 (几百名) 来自爱荷华各界的精英，包括来自社会组织、企业、州政府和基层政府、社会组织、教会和教区、学校和大学的代表，以及参与到反饥饿项目中的其他组织的代表。[https://www.worldfoodprize.org/en/events/iowa\\_hunger\\_summit/](https://www.worldfoodprize.org/en/events/iowa_hunger_summit/)

## 肯尼思·奎因 (Kenneth Quin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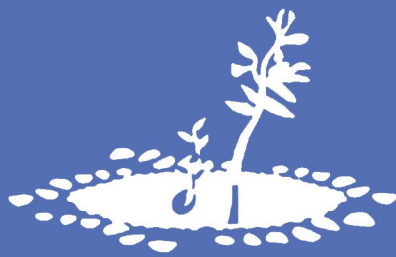
约翰·克里 (John Kerry) 在世界粮食奖的主题发言中对肯尼思·奎因的介绍：“我很感激有机会由肯尼思·奎因将我介绍给大家。当我坐在那里思考，听肯尼思发言，麦克阿瑟将军说过，老兵从来不会死去，他们只是消失了。同样，老外交官也从来不死，而且很显然，他们还不消失。(笑声) 他们只是去承担新的、艰巨的任务。而且，他是这样一个人，他知道如何去承担。(掌声)……我们两个一起经历过神奇的旅程……那是 1968

年，当时我在越南，我从湄公河边一个小窝棚里醒来，那是美丽的、非常美丽的一个小地方，四周都是水稻田。……肯告诉我，他在那里度过了大概一年的时间，我估计，一个外交官在出行的时候会坐着船走来走去。所以，我们经常有机会碰面，也非常荣幸可以遇到他。肯是唯一一个同时获得了空军奖章 ( Army Air Medal ) 和国务院英雄和勇气勋章 ( State Department's Medal for Heroism and Valor ) 的外交官。这本身就已经说明了很多。( 掌声 )……而且，我认为，‘不可能’和‘难以应付’好像就在他的基因里面，他知道如何去克服它们。” US State Department,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3/06/210896.htm](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3/06/210896.htm)

### 占领“世界粮食奖” (Occupy World Food Prize)

“世界粮食奖” ( WFP ) 的组织者说，受邀在 2012 年 10 月 16 日到 20 日来得梅因发言的人，代表了国际食品和农业产业的各个方面，也包括从事可持续农作的人们。但是，看看日程就可以揭示，发言人不是多样化的，而都是统一代表着令人窒息的公司企业。虽然 WFP 发言者们以及他们的慈善工作都在声称要去解决饥饿问题，但是他们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们的赠款人的影响，包括比尔盖茨基金会和孟山都。这些赠款人不会资助明显偏离他们自身宗旨的政策和项目。拒绝转基因种子和农药、而采用生态和小型的可持续农作的粮食政策往往会输给农商业。农商业和化学公司的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赢利，而不是为了公共福祉。“占领世界粮食奖”是因为认为其委员会设定的日程和选择的发言者有失公正和不平衡。生态和可持续农业的代表被忽视了，没有得到在典礼上发言的机会。

[http://occupytheworldfoodprize.com/about,\(link no longer works\)](http://occupytheworldfoodprize.com/about,(link no longer works)) 



《热风学术》编辑部\_2016年12月  
编辑部邮箱\_refengxueshu2016@foxmail.com

# 试论 20 世纪革命辩证法节奏分析 ——以俄罗斯革命、中国革命为中心（下）

沈光铉 \*

皮垆勋 \_ 翻译 林春城 \_ 审阅 \*\*

## 四、改革和革命：两者取一还是连续？

回顾 20 世纪的历史，上面谈过的争论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频繁地反复。如果说最初的争论是开始于 1904 年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争论，那么，从此以后，这一争论是以 1917 年的以俄罗斯革命为其契机的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间的争论、1923 年至 1927 年及 1935 年至 1937 年所发生的围绕“人民战线”这一主题的共产国际内部的争论、1920 年代至 1930 年代之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争论、1957 年中国的“反右派斗争”、1966 年至 1976 年所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争论、1970

---

\* 沈光铉 (SHIM Gwanghyun)，韩国艺术综合学校影像理论系教授。《文化 / 科学》咨询委员，韩国文化研究学会会长。著有《Ubiquitous 时代的知识生产和文化政治》《兴韩民国》《文化社会和文化政治》《后现代文化政治和文化研究》等。

---

\*\* 皮垆勋，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林春城，木浦大学教授。

---

年代有关“欧洲共产主义”的争论、1986年至1989年之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等，以各种方式来连绵不断。从这样的角度而看，可以说“改革对革命”这两者之间的争论几乎是以10~20年的时间为其周期来，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历史地理，就形成了两条绳子互相交叉似的一系列周期性模式。今天如果要重新提出“改革还是革命”这样的提问，这一提问并不能是完全脱离这一周期性模式。

一旦一个体系开始被瓦解，“进行改革”还是“发动革命”这两者之间的取舍问题并不仅仅是在理论和政策转换层面上的问题。这一选择必定是蕴含着要跟在摇动的体系内部里爆发出来的惯性和抵抗面对的有关生死存亡的政治性斗争。因此，在考察有关“改革/革命”的争论之时，不可忽视的事实就是这两者和体系内部或外部之间的暴力性冲突即“内战”或“战争”之间的独特关系。如果借用“战争是通过另一种手段的政治”这一克劳塞维茨的说法的话，战争也可以说是：随着内在于国内和国家之间的社会状况所引起的利益冲突的敌对性力量开始跟改革/革命的政治要求连接起来，而这样的状态恶化到暴力性状态的结果。

但是我认为，以往的有关改革/革命问题的争论与其说是从它们两者和战争之间的复杂关系来予以具体分析，不如说仅仅是留在于“和平时期的改革”、“危机时期的革命”、“作为例外状态的战争”这些个案分析的水平上。当然，某一体系处于稳定的情况之下，这三个状态可以被视为是互相分开的。但是一个体系开始动荡，以前被视为是互相无关的状态就变成混在一起的状态。克劳塞维茨的如下说明就揭示，为什么这样的状态必定是出现的。

“战争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行为。于是可以说，战争并不属于‘术’和‘学’的范畴，而属于社会生活的范畴。战争是有关重要利益关系的纠纷。……战争是比任何‘术’，更比喻为‘商业’。‘商业’是从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之中所引起的纠纷，具有同政治非常最相似的性质。反过来讲，政治也可以被比喻为大规模的商业。”

在这里，“商业—政治—战争”并不是互相分离的，而是被利益关系的大小和程度所区分的连续体。从这样的角度来看，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无异于围绕阶级内部及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所发生的“商业（微观—宏观的经济）—政治（改革—革命）—战争（内战—国

家战争) ”这三个因素的展开过程。当然, 这样的连续体并不是被硬化的管道似的整齐排列的东西, 而是具有一系列节奏的波浪相似的作为动荡过程的连续体。如上已言, 从在俄罗斯和中国革命过程当中所出现的“战争—革命—内战—改革—独裁—改革”诸如此类的周期来看, 我们会再次确认这一事实。并且在这一连续体里, 政治是媒介日常的经济活动和作为例外状态的战争。

在这一连续体的问题之中, 先要看看改革—革命之间的连续关系。1971年1月, 在德国拜仁慕洲的几百万收听者所关注的电视台讨论节目里, 马尔库塞和波普尔就“改革还是革命”这一问题来展开了讨论。在这一讨论中, 对于“我们真的是根本无法考虑, 为了革命即更好的状态而采取暴力行动的正当性吗?”这一主持人所提出的问题而言, 波普尔指出: 暴力性颠覆的结果只能造成英国革命以后的克伦维尔的独裁、法国革命之后的罗伯斯比的独裁以及俄罗斯革命之后的斯大林等诸如此类的后果, 此后, 革命的理想及其推动者只能被消失, 因此虽然不是完全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不断的改革”:

“非暴力性的变革是跟它(指使用暴力的革命)截然不同的。如果选择非暴力性的变革, 我们会随时改善我们的手段所产生的不良结果。我们能够创造出使得现存的对于社会状态的批判、不被暴力所压抑的氛围以及超越这两者的改革成为可能的社会结构。”(马尔库塞、波普尔; 58)

反之, 对于“我们能否以逐渐的改革来成就人本和解放的社会”这一主持人所提出的问题而言, 马尔库塞就回答如下:

“改革是可以试图的, 而且应该试图的。我们应该试图减少贫穷、不幸和压抑的所有手段。但是剥削和压抑是跟战争和经济力量的垄断现象一样, 它们是属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可是, 不久, 改革的试图和体系的局限就要发生冲突, 事情就达到不能不铲除改革的进行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即利润的阶段。达到了这一阶段, 体制就要关注保存自己, 从而要对抗改革而保护自己, 到这样的状态之时, ‘革命是可能的吗?’ 这样的问题就会出现。”

如同马尔库塞所言, 改革和革命之所以是互相连续的, 是因为正如波普尔所主张的那样, “不断改革”的持续就要达到现存体制自身对抗改革的阶段, 到了这一阶段之后, 事

情只能发展到“走向克服现存体制的革命，还是服从于现存体制的抵抗而中断改革”这两者之间选择的分歧点。从这样的角度而看，我们就不难发现：“不断的改革”必然地达到要发动革命的状态，与此相反，反对革命的改革是在表面上主张“不断的改革”，但是这样的主张，实际上仅仅是留在于现存体制的抵抗不那么强的“一次性改革”的水平而已。

因此，改革和革命之间的关系是非对称性的，而且可以说，革命是在被积累的改革（之挫折）的临界点上发生的。这正是“改革还是革命”这样的提问方式其实是假话的根本理由。并且不仅仅是从革命是改革所积累的结果这一侧面上看，又是从革命之后，改革也只能坚持下去这一侧面上看，改革和革命之间的关系是连续性的。这是因为一次性的革命绝对不能改变整个体系。于是，“改革—革命—改革—革命”是连续的过程，从其强度和范围的差异这一角度上看，这一过程只能是具有振幅的波浪形态。但是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其成功不能是完全被保障的，而且从改革或者革命的失败就含有着反改革或反革命的兴起这一侧面上看，这一波浪不能具有稳定的形态。加之，如同波普尔所体现的那样——例如大部分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那样——因为是一方面固执于改革，但与此同时，另一方面也会反对革命，于是如果要同时兼备这两者的话，改革和革命可以说是形成辩证关系（从系统的动态这一角度而看，这两者不能不是互相联系，按照其状况和权力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被概括为停滞、稳定化、善性循环、恶性循环这四种状态，或者如阿尔都塞所提出的‘置换—凝缩—爆发’的状态）。

## 五、经济—政治（改革—革命）—战争之间的非对称辩证法

如果说是政治的两端即“改革”和“革命”形成非对称辩证关系，那么，我们也会推测到，比这一关系更大的连续体即“经济—政治—战争”关系也是形成非对称辩证关系。在这一连续体里，政治的一个极端若是跟经济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另外的一个极端可以说是跟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首先要看看，革命是如何与组织化的暴力之间的决斗即战争互相关联的。

改革的积累达到革命阶段——实际上，大部分的革命是在改革的要求被反复地拒绝而达到不可接受的状态之下所发生的——这一革命是否具有暴力性质是不可预见的，这就是因为革命的暴力性质是取决于体制的抵抗本身是不是暴力性的。就此一问题而言，马尔库塞回答如此：

在发革命开始的时期里，暴力是发生于现存社会的内部，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相信，反革命派的确不是面对为攻击的暴力，而是面对抵抗性暴力即为防御的暴力问题。（马尔库塞、波普尔；34）

这些反抗“反革命暴力”的抵抗性暴力之组织化的典型历史事例正是：俄罗斯革命（对抗 1917 年 7 月初克伦斯基所做的布什维克逮捕计划和 8 月的抵抗科尔尼洛夫政变的 10 月布什维克武装起义）和中国革命（对抗张介石在 1927 年 4 月 12 日所发动的反共政变及其共产党员屠杀事件的 8 月共产党最早的南昌武装起义和随之连发的毛泽东的井冈山武装起义）。诚然，现存体制的抵抗并不是简单的而是强韧的，并且因为拥有既得权的权力群体是已经具有组织化的暴力（例如军队和警察），于是如果现存体制遭遇危机的话，他们已经占有着能够随时使用其暴力的有利位置。因此革命的成功取决于，现存的体制是否具有组织地使用暴力的充分力量。以“第一世界大战”为媒介的俄罗斯革命、以抗日战争为媒介的中国革命的成功以及“第一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展开的欧洲革命之失败就证明这一点。当然，在暴力行使的侧面上，攻击和防御所展开的形态只能是各不相同的，这是因为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权力关系必定是随着某个社会的历史经历、整个社会范围内积累的敌对性程度以及权力行使的准备程度等的因素有所不同的。

那么，改革是如何跟经济上的阶级斗争互相关联的呢？发生改革的根本理由是在于，在生产关系上的围绕剩余劳动剥削的经济上的阶级斗争。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也是等同于围绕这一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保持或颠覆的权力斗争。从这样的意义上看，生产现场既是在日常生活里难以亲眼看到的，又是能够保持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政治控制和支配经常所进行的场所。

没有任何工厂不付出阶级支配的代价，而且没有任何劳动过程的组织不依靠警察权力。



如果不依靠警察的权力，这是因为这一压抑是在于劳动分离的内部本身里，被其本身内部的劳动者所实行的。--- 罚款、职位的变化、受赏和废弃受赏以及解雇都是劳动者在日常生活里的命运。隐形的阶级斗争就是在这一层面上进行的。如果是在极端的情况之下，对于劳动的控制来说，警察所实施的控制是可以暂时悬而不问，但是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政治性”控制。而且从来未能解决的问题正是：对于劳动组织部的派遣者或者斗士的“监督”和不理想的解雇。（阿尔都塞；8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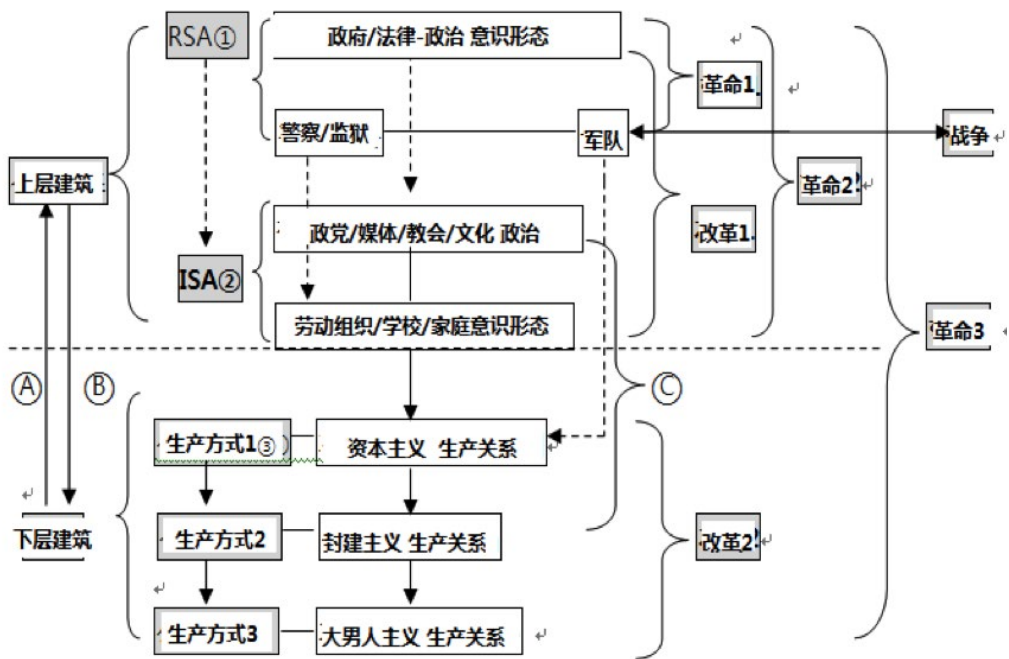
如此，改革无异于在没有本质性地损害以往生产关系之再生产的范围之内，部分地改善日程生活里剥削和压抑。诚然，即便是在改革的过程当中，能够成就部分的改善，，但是与此同时，尚未被解决的问题就被积累起来，初期矛盾的置换是可能的，但是未有解决的问题只能将要凝缩和爆发。这样，经济—改革的连环再次成为“经济—改革—革命—战争”这一连续体的一部分。某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是在上层建筑所实施物理性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压力之下，参与其上层建筑或者特定领域，正如阿尔都塞所提出的那样，下层建筑即经济是提供使得上层建筑保持下去的物质条件，而且与此同时制约其可能性（A），但是与此相反，上层建筑是保障下层建筑即经济基础的稳定的再生产（B）。但是，以这些方式的制约和再生产之间的关系来实施的阶级性支配和权力关系是在日常生活里难以看到，对一般的个人来说，具体的现象世界仅仅是日常生活的世界而已（C）。

马克思虽然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眺望了下层建筑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应关系，但是未有分析过其具体的运作方式。在这一问题之上，阿尔都塞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将“下层和上层建筑”这样简单的比喻细分为更复杂的层次（instance），以便系统地阐明其层次之间错综复杂的互相关系。阿尔都塞是与把国家和市民社会加以分离的黑格尔以及在其影响之下的社会科学的一般观点不同，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连接为互动的压抑性国家装置和意识形态国家装置，与此同时，他又阐明了后者（即意识形态国家装置）如何具体和积极地服务于下层建筑的再生产，以便逾越了以往有关下层建筑和上层建筑的单一性理解，阐释了这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下层建筑对于上层建筑的外在性虽是作为一种原理而确立，这样的外在性大部分是以

内在性的形式来起作用的。这就是说，意识形态就服务于使得生产关系自动地运行，这意味着在这样的生产关系的运作之内，保障其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反之，压抑性的国家装置是以不同的方式来介入到这一关系。它并不是直接地介入到生产或者 ISA。虽然存在军队完全控制劳动阶级的事例，但是这样的情况仅仅是，生产完全被停止的时刻。生产具有自己内部的镇压机制，只有理解到劳动的社会和技术侧面上的分离，才能理解到其镇压机制的存在。换言之，只有理解到在生产力 / 生产关系之间的统一性关系里，关键的并不是生产力，而是存在于以往生产力界限之内的生产关系这一事实，我们才能理解其镇压机制。可是，在生产这一侧面上，对于劳动的诸如此类的社会性、技术性的分离本身仅仅是被意识形态予以运行的。通过这样事实来，我们同时可以看到，在社会结构里，生产和其他活动领域的运作方式，既是极为简单，又是极为复杂。另外，我们也会看到，我们不能不修改以往的有关下层和上层建筑的“场合性”表象。（阿尔都塞；307-308）

这样，如果把修正的下层建筑和上层建筑关系和上面所提过的“改革 - 革命 - 战争的连续体”结合在一起，而将它图会为如下的图表：



① 物质性 制约    ② 再生产的保障    ③ 上层建筑和下层建筑互相结合在一的生产现场

如上的图表就有助于直观化如下问题。

(一) 首先, 改革和革命并不是指具有单一对象的单一性事件或状态, 而是要把它们细分为多层面的改革和多种水平的革命来加以理解。

一般所讲的改革是, 其根本性质的真情性暂时放下不谈, 而由于其改革所要解决的课题之庞大以及时间上的制约, 不能采取社会结构的总体性改革的方式, 它只能体现如改革(1)那样局限于上层建筑之特定部分的改革(政治改革), 或者如改革(2)那样局限于下层建筑的特定部分之改革(经济改革)这些偏向的性质。另外, 由于同样的原因, 革命也只能偏重于如革命(1)那样的尽快掌握 RSA 的紧急课题。并且革命(1)能否成功这一问题是在与革命的关联之下, 同军队的构成和变化是否体现深刻的变化这一问题有着密切关系。但是, 如同斯大林时代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那样, 并不留在于从革命(1)到改革(1)再到改革(2)诸如此类的连续过程, 而跳跃到要改变包括 RSA 和 ISA 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的《革命2》事例也是存在的。革命(3)可以说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完成的过程, 但是 20 世纪历史上存在过的社会主义未能达到这一阶段而面临瓦解。

(二) 在上面的图表里, 上层建筑(法律和国家, 以及意识形态)和下层建筑(生产方式)是因为具有各不相同的、固有的惯性节奏, 因此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上并不一致的。由于这些多重层面之间的分离和独特决定, 整个社会就是多元决定的(overdetermined), 阿尔都塞认为, 马克思的“社会总体(Whole)”是跟黑格尔的“总体性(Totality)”有所区别的。而且因为社会的总体是被这些多重层面给予决定, 它不能不具有其固有的动态节奏, 在其社会里所发生的“改革 - 革命 - 战争的连续体”也是具有互相不同的节奏。但是由于互相不同的历史经验上的差异, 各个社会即便是具有互相不同的动态, 但是这样的异并不是绝对的, 而是他们都是受到每一阶段的整个世界体系动荡的制约。尤其是, 因为整个 20 世纪的历史是通过英国霸权的解体和随之而来的移动过程(包括两次世界大战)来, 达到美国霸权的确立这样的过程来展现的, 于是各个社会结构所独有的其动荡性差异还是要在与这些宏观的世界体系动荡的关联之下予以把握。

## 六、21 世纪转换时期节奏分析的新模式

若是从与世界体系的关联之上看，20 世纪的两次大战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成立或再构成这些流变之中展开和结束的。但是诸如此类的政治地理上的再编，如果不在 M-C-M' 即资本的生成和循环的地区之间的移动，这一错综复杂的动荡关系里予以分析的话，易于仅仅是被分类为已过去的历史“事件”。到了 19 世纪，世界史是区别为被资本所包纳的地区和不被资本所包纳的地区，于是很难以一律地适用资本的各个部分间、地区间的移动这一马克思的观点（哈维 [David Harvey] 曾经把这一观点更具体的分析为“第三循环”），但是 20 世纪的世界史经过两次大战和冷战时期的过程当中，全球范围内的所有地区实际上都是属于资本的生产和循环这一过程，因此如果要考察 20 世纪的历史地理上的变化，还是需要对于以资本的部分间、地区间的移动，最后以破坏的方式来进行的独特的内部节奏的观点。诚然，在俄罗斯和中国那里，虽然资本吸收非资本因素的过程还是需要很漫长的时间而且伴随了其内部的动荡，但是如果还是需要考察，进入 1990 年代以后，资本的逻辑包纳了这些地区，此后从 21 世纪初开始出现的随着美国霸权的解体而来的富裕和权力的再编这一必然的过程，刚才所提出的观点更是必要的。

而且如果要考察 21 世纪的变化趋势的话，重新考虑的侧面是如此。这就是说，迄今资本主义固有的动荡，即通过创造性破坏的革新这一节奏之所以能够持续，是因为资本主义能够吸收尚未被资本主义给包纳的自然和劳动力，但是今天不再存在过剩资本的破坏之后也会吸收的外部世界。这就意味着，在每个霸权替换阶段里，为了新积累体系的建立而被使用的以剥削为基础的原始性积累不再是可能的。加之，巨大规模的核武器是使得第三次大战的构想成为难以想象的。当然，为了突破这样的难局，从其内部创造“新的外部”则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逻辑，但是这也面临着从下而上的广泛的抵抗。在这样的时刻里，可以说是，资本就为了自己的保存，处于不能不创造前所未闻的新逻辑的状态，这样的状态是对劳动来说也是同样的。于是我们可以想象两种可能实现的脚本。

**（一）资本的革新：**一方面避免世界大战，与此同时可以想象的资本之自我革新的方

向就是加强新自由主义的战略即“内部的外化”（劳动市场的积极分化和排除弱势群体的战略）的多样化，加之，通过将迄今尚未被商品化的所有文化实践的领域（超越高级文化、大众文化及教育领域，包括冠婚丧祭、包括料理的家庭事务和保育，美容整容，生命工学，业余生活和终身教育等等）加以商品化的方法来，从内部开拓新市场（沈光铉②：90）。而且我们也许会推测，在国家资本的严密控制之下所进行的 GNR 革命可能是趋向于把下层建筑和上层建筑这些全部领域变成为无所不在的计算化，一方面是完成经济生产手段、信息控制以及有关公安—国防领域的机器人化，与此同时，通过 ISA 的“电子母体化( making Cyber-Matrix )”来，发展到为了能够持续的压抑和剥削的新模式提供有效手段的方向（沈光铉②：87）。

**（二）劳动的革新：**那么，能够以从下而上的方式来抵抗的劳动战略是什么？从 20 世纪的革命失败那里，我们可以从中获得至少两个熏陶。从马克思逝世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主流观点即“一国资本主义—一国经济危机—一国社会主义”诸如此类的问题设置来，在一国范围之内完成革命，而且由国家领导的从上而下的方式来克服资本主义的方式，终于只能被吸收于资本的运动之内。这一熏陶揭示，除了“在全球范围内的从下而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史无前例的途径之外，没有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的方法。换言之，这就是马克思曾经所正式规定的“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危机—世界革命主题”就成为了我们时代的现实课题（정성진；10）。这就是我们要回到马克思的根本理由。青年马克思好像是预测到以后发生的革命和失败这两个趋势之间的反复似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过如下：

如果为了完全革命的物质性条件尚未准备，即是说，一方面当时的生产力，另一方面革命大众的形成—不仅仅是对于现实社会的单面的、部分的反对，而是对于现在“生活生产”本身的反对来，对于现实社会的基础即“总体活动”本身的反对来发动革命的大众的形成—如果这两者没有存在的话，那么，在这样的时刻里，尽管那一革命的理念许多次被呼唤，但它终于成为了与实践毫无关系的东西。共产主义的历史证明这一点。

如同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从 19 世纪的 Utopia 到 21 世纪的 Utopistics》，《文化 / 科学》第 68 期）里所提过的那样，迄今的共产主义革命，因为并没有“同时”具有生产力和革

命大众的形成这两个物质性因素，只能失败了。1917 年的俄罗斯革命和 1949 年的中国革命具有了后者。但是这些革命是在没有前者的条件之下发动的，最后其革命的原动力都被耗尽于提高落后的生产力，生产力和革命大众这两个因素就被退步为“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两个怪物。若是要从结构地繁细这些问题，我们还要回到马克思（沈光铨②：87）。

在这里马克思所提出的“生产力的发展”不只是指技术意义上的“生产手段的高度化”。他首先要说的是，“生产力（1）”意味着“自然材料和能量 + 生产手段 + 劳动力”之间的结合，因此技术并不等同于生产力本身，它仅仅是生产力因素之一而已。“发展（2）”是指这一结合方式远远超越了地域性范围，而扩散到全球范围内。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就说明了“生产力的发展是革命发生的前提条件”这一命题如下：

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这蕴含着人并不是地域性的存在，而是在世界史的范畴里，现实地、经验地存在着的意义）在如下的意义上，是绝对必要的现实前提。即是说，第一，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仅仅是造成贫穷的普遍化，于是与贫穷问题在一起，围绕生活品的斗争不能不重新出现，许多藏污纳垢的事情将会重新出现。第二，跟生产力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在一起，人类之间的普遍交流就确立起来，于是一方面在所有国家之内产生“无产者”这一现象，另一方面让各个国家不能不依靠别的国家的革命性变化，这样的趋势就使得分散于各个地方的个别个人都变成既是具有世界史的又是在经验上普遍的个人。如果没有这些变化，（1）共产主义仅仅是作为一个地域之内的现象而存在而已，（2）交流的“力量”也不能发展成普遍性的，即不可抗拒的力量，不能脱离井底之蛙的状态。（3）交流的扩散将会铲除地域性的共产主义。从经验的侧面上预见，共产主义只能是在“一举地”、“同时地”行动，才是可能的，而且这再次是以生产力和跟它关联的世界交通的普遍发展为其前提。

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到目前为止，任何革命都未能成功的并不是奇怪的。这是因为跟生产力的世界性发展一起，人类普遍交流的确立，只有如今的“无处不在”时代的到来之后，才能变成可能的。这就意味着，如同马克思所提出那样的全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之一，到了今天才是可能的这一事实。那么，另外的条件即“革命大众的形成”

又是如何？

对马克思来说，生产力并不仅仅是指“技术”这一侧面，同样，革命大众并不只是指发动起义的大众。根据马克思的观点，革命大众是指“使得个别个人从国民的、地域的局限之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形成全世界性的生产（包括精神上的生产）和实践关系，从而在全球的范围之内，具有能够享受在一切领域所产生出来的喜悦的能力的大众，而且具有能够形成‘全面性的互相依存’，即人之间的这一自然必然性的‘世界史’上的协作形态的能力的大众。”（马克思、恩格斯；69-70）

既是为了共产主义意识的大规模产生，又是为了其目的本身的胜利，还需要广泛的人类之变革，这一变革只有在实践性的运动内部即“革命”之内，才是成为可能的。因此，之所以需要革命，不仅仅是因为除了革命之外，没有任何方法打倒支配阶级，又是因为‘实行打倒’的阶级只有在革命之内，才能脱离陈旧的沉渣来，能够具有重新建设新社会的力量。

（同上书；71-72）

从世界的侧面上看，晚近一两年的时间内，急速扩散的中东革命以及欧洲、美国等地区所频繁发生的大众示威和暴动，而且韩国的“希望巴士”等的浪潮就是显示出，在漫长的时间里被压缩和消灭的大众运动在全世界的范围内重新形成和开始。诚然，这些大众起义和马克思所言的革命大众之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但是，从如上面提过的“高斯分布”和“幂函数分布”这些辩证法节奏的观点而看，最近在全世界里发生的大众能量的奋发就暗示着，跟美国霸权之解体一起，很有可能性的新的爆发性周期的症候。随着欧洲金融危机的扩散，全球范围的积累危机和统治性危机日益增多，以把全球连接为一体的 SNS 为媒介来，人间行动的传染性高速增加，假定这样的爆发性周期在何时何处会发生的比假定不会发生这样的爆发的好像是更有合理性的。

最近在中国社会之内，各种示威和大小的大众起义的频繁出现也暗示，爆发的周期马上要达到其爆发性阶段。可是起义并不是革命，而且正如 20 世纪的革命所体现过，一次性的革命也不能保障向新型社会的转移。在这样的时刻里需要的是，从补充和弥补 20 世纪革命失败的角度来，对抗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来，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试图寻找向新型社会

转移的现实性代案。在这样的问题之上，汪晖就把“跨越性系统社会”这一新的认识框架作为在后社会主义时代里对于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超越以及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制约方案来提出。他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意识，是因为国家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行政地域是沿着从上而下的轴线来，把个别地区组织于一个结构之内，但是从人类学 - 社会学的角度而看，在各个地区里存在着以各种偶然性、事件、其他形式的往来来形成的横性连接”。汪晖认为，要把后者的“横性连接网”看作是跟古代中古的“治世”概念或者布罗代尔（Braudel）所提出的长期持续概念相似的概念，之后如果是在“横”的轴线上叙述社会活动及其复杂的互相关系的话，就能够把在地域概念之内所存在的多重性、模糊性、移动性等放置于时间概念之下，也能够不否定互相独立的主体活动。这是因为，这些“横”的时间过程是不断派生的关系，而且又是从复杂性发展到另一种混杂性的过程（왕후이；451-453）。

这样，从“纵的时间”到“横的时间”的转换这一提案所蕴含的，恰恰是以另类的观点来捕捉内在于历史过程内部的节奏类型。而且这样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批判把下层建筑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视为等级关系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而要提出把社会过程理解为通过社会力量之间的结合来产生霸权之间的“横的竞争”代案的雷蒙德·威廉斯的观点相应的。威廉斯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977）里，批判把上层建筑和下层建筑看作是等级关系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之后，以把这一两者之间的关系视为是相应关系的本雅敏的观点为媒介来回到马克思主义，再要把这一相应关系跟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结合起来，将它阐释为更为具体的、生动的关系。他要将霸权概念跟“直接的政治支配”这些以往的解释加以区别，而要把它解释为能动性的社会的、文化的力量，并且要超越以往将文化概念解释为仅仅是上层建筑，而且将文化概念还原为有关意义、价值、信念的阶级的、抽象的意识形态的观点，而要把它文化概念扩大为在整个社会实践领域里引起作用的可以经验的、可以具体地互相体验的有关意义和价值的活生生的过程（Williams；108-114）。

于是，从此以后，构成霸权的社会文化实践被理解为是扩展到实际体验的整个领域而构成生动的、复合的社会文化构成体的过程。并且在社会里的文化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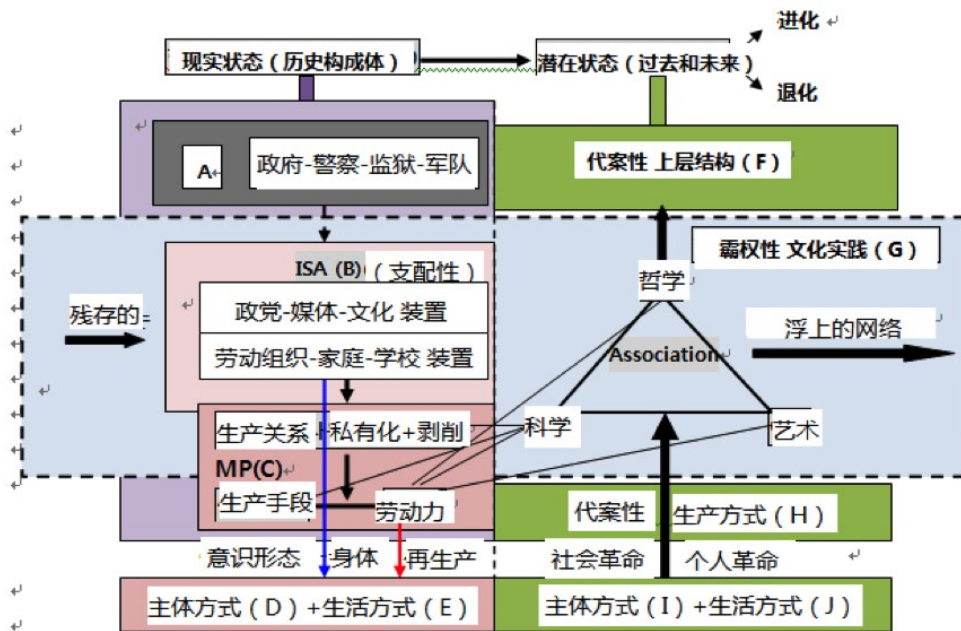


权，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它被理解为是包含着霸权、反霸权（Counter Hegemony）以及代案性霸权（Alternative Hegemony）之间的竞争（第六章）。加之，威廉斯把文化实践区别为传统、制度以及构成体（第七章），这一三个因素是个别相应于残余文化、支配性文化以及新文化（第八章）。进一步，为了代替跟过去的传统文化和通过现存支配文化来建构的经验有关联的“经验结构”，而为了把握将来会出现的“新文化（揭示未来的倾向）”的特征，提出“情感结构”这一新的文化假设。这一概念是指“虽然具有社会的、物质的性质，但尚未发展到充分明了和正规的交换对象而还处于萌芽阶段的感情和想法”、“特殊的情绪因素”、“不是跟想法对比的情绪，而是被感受的想法、被思考的感受”，以及区别于其他社会意义上的构成体，以被融化的形态而存在的情绪的、社会的经验。如果详细地考察某一个时代里出现的情感结构的局势，就会看到这一出现就是跟一个新阶级的构成或者一个阶级内部的分裂或变化有着密切关系。

因为汪晖还是集中于贯通结构化的一国维度的“跨越民族”性的“横的时间”联接网，把他的观点和以一国单位来进行分析的威廉斯的观点直接对比的是不妥当的。但是可以说，他们俩都是同意这些“横的”、“纵的”时间过程不能被吸收到下层建筑—上层建筑诸如此类的等级关系。可是汪晖虽然一方面是要把这些横的联接网看作是社会文化过程，但仅仅是强调混杂性、复合性以及移动性而已，尚未进行对于其具体的内容和形式的分析。在这样的角度而看，我们或许不能把他理论框架直接适用于现代社会的复合性社会文化过程的分析。并且他还是试图从过去朝贡体系或者清朝的多元特色那里寻找其横的时间过程的事例，而且为了寻找跟民族主义性质的知识框架不同的中国观念，汪晖提出“跨越性系统社会”这样的问题意识来，以便默示把这一概念和过去的非人格性的“天下”概念联系在一起（汪晖积极地评价了李济的超民族主义的历史观，即秦始皇的长城建筑是切断了中华民族所形成的广阔的空间，于是在长城以北寻找古代中国的史料。汪晖的这样的历史观其实是跟中国政府进行的“东北工程”计划没什么区别的）。从这样的角度而看，我们也许会怀疑，这样的方式是否具有“精练化的中华主义”的意图。而且围绕汪晖2010年在《文化纵横》上发表的文章《中国崛起的经验及其面临的挑战》来，有些人表示怀疑，汪晖是

否已经转向为“官方立场”（钱理群、白承旭），我认为，这样的争论可能是来源于汪晖的基本理论框架即波兰尼的凯恩斯式的观点以及阿里吉的亚当·斯密式的观点。如果是这样，我想提问，我们当初把基于凯恩斯和斯密式观点的知识分子分类为是“新左派”这样的视角本身是否错误的。

与此不同，威廉斯理论的长处是在于：他的理论模糊是把其多重性、复杂性及移动性的单位具体化为“残余的文化传统—支配的文化制度—新文化的感情结构和构成体”这三个维度，而且更关注这些力量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通过这一理论框架来，我们可以批判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变动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下层建筑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分离和残余文化力量的意识形态性质，而且它就使得我们更强调克服资本主义的代案性势力形成的潮流。把这些发生霸权竞争的社会文化层面上的实践流变跟上面提过的阿尔都塞式的社会构成体模式结合起来，可以图绘如下的图表：



社会构成体 = 上层建筑（霸权）[RSA(权力方式)（压抑）+ISA(统治方式)（同意）+下层建筑（剥削）（生产方式）

= 压抑率和剥削率的黄金比率 = 霸权性统治

代案性社会构成体 = 政治 - 意识形态 - 经济上的阶级斗争的黄金比率（阿尔都塞；212）

= 革命斗争的黄金比率 = 所有个人的黄金比率 = 自由、平等、团结的联合社会

（包括个人、社会在内的社会构成体内部的下层建筑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关系及过渡的层面）

(一) 首先, 上面的图表不仅仅表现出下层建筑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各种联接点, 又是表现出联接和贯通于个人和集体之间的日常生活模式和主体模式、上层建筑和下层建筑的所有活力的文化实践的联接点。并且现存社会构成体的立轴若是作为残余的文化传统和多样的 ISA 制度的物质性实践而作用的现实状态 (actuality) 的话, 那么, “过去—现在—未来” 这三个维度所共存和重叠、收敛和散发的文化实践的流变可以说是属于潜在状态 (virtuality)。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社会变动之所以是可能的, 是因为如此在横的层面上互相联接的时、空间活动的复杂和活力的网络一直是作为将来会实现的潜在状态而存在。这一潜在力是由过去的记录、现在的活动、走向未来的计划这些因素之间的重叠而组成的, 而且它是在世界体系和各个社会构成体处于稳定期的时候, 就被萎缩或遗忘, 而在体制的混乱增多的动荡时期 (霸权的解体时期) 里就爆发出来 (这就是马克思曾经所谈过的世界革命可能性的条件之一)。

但是, 这样的潜在状态并不是立即会变成成为代案性的现实状态。反而, 资本主义在每次遭遇霸权转换时期, 以“被动革命或者反革命”的方式来所占有的就是这一潜在力。例如在中国, 即便是存在从党内和下层奋出来的对于民主社会主义的热望, 但长期以来, 使得封建意识形态能够保存下来, 而且造成下层建筑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分离的主要因素也是残余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 (李泽厚) 的潜在力。因此, 我们不要拿“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融合”为其理由, 无条件地积极评价过去的文化传统。

(二) 因为 20 世纪的革命未能充分地理解这些“横”层面上的潜在力和“纵”层面上的现实状态之间的多重辩证关系, 仅仅是在执著于下层建筑和上层建筑之间的权力关系问题, 就借助于外部发生的战争的力量来完成革命, 但是没有能力通过从下而上的积极参与来, 把这些“横”的层面上的潜在力转换为新社会建设的动力, 于是终于只能失败了。但是上世纪 1968 年的革命前后, 通过对于从上而下的革命之失败的各种反思来, 在多样的层面上有助于恢复和活泼其潜在力的各种计划不断地被提出来。女权运动、生态主义运动、参与计划经济模式、都市革命、日常生活革命、自律控制的主体性模式的转换、无尺度的复杂性网络科学诸如此类的活动就是其例子。可是, 这些运动和模式还是互相分离的,

因此未有形成其潜在力之间的联合（association）。上面的图表就有助于设定这些模式之间的位相关系。包括这些模式的多重层面在内，如果把资本主义社会构成体的现实状态和将来会到来的新社会构成体的模式加以比较的话就是如下：

项目		细目	资本主义	从下而上的社会主义
社会	上层建筑 (霸权)	RSA ( 压抑 ) = 权力模式	A ( 政府—警察—监狱— 军队 )	F ( 民主政府 )
		ISA ( 同意 ) = 统治模式	B ( 政党—劳动组织—市 民社会 )	G ( 联合社会 )
	下层夹注 ( 生产方式 )	上产关系 ( 剥削 ) / 生产力	C ( 稀有化 + 商品生产 )	H ( 参与计划经济 )
个人	上层建筑 ( 精神 )	主体模式	D ( 大男子主义—被异化 的主体 )	I ( 解放的主体 )
	下层建筑 ( 身体 )	生活模式	E ( 拜物化的商品消费 )	J ( 生态性共存 )

### 结论：从下而上的社会主义

以毛泽东思想和民间异端思想之间的关系为一生的研究课题的钱理群，最近在著作《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 1949-2009》里，把贯穿于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的流变概述如下：

毛泽东时代正是两个中国、两个路线互相搏斗、斗争而沿着“抵抗—镇压—再抵抗—再镇压”这条路来进行的过程。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中国（后毛泽东时代）”里也存在两种

思潮。不仅有由毛泽东思想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民间思想家们把它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先史社会主义”），又有由民主社会主义所领导的民间社会主义。……这样，我们所发现的民间思想家们的思想成果的意义和价值可能成为今天我们能够重新发展批判性理论的重要资源。（钱理群②；508）

在这里，民间思想家所称的“国家社会主义”其实是指国家意识形态，而且这一国家意识形态是指1978年以来支配中国共产党的邓小平路线。从其内容上看，虽然邓小平路线是与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的，但是其名称是被强调为继承“毛泽东思想的活生生的灵魂”的。钱理群就把这样表里不同的表现分析为如此：

邓小平真的想要废气、断绝的就是毛泽东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以及乌托邦主义。他是以自己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及功利主义来取而代之以。所以他对毛泽东的新解释是强调“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不包括大众运动和大众动员）正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生生的灵魂”。——必然变成跟“三民主义”相似的变化——邓小平及其继承者所追求其实是“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在“民权主义”的侧面上，他们一直不想废弛一党专制的党国家体制（246）——在国民党已经废弃党国家体制的20世纪1980年代、1990年代以及21世纪里，邓小平及其继承者对于党国家体制的坚持和强化无疑是受到关注的，而且真的是令人心疼的。（钱理群②；247）

从这样的意义上看，也可以说邓小平路线所主张的“从上而下的社会主义路线”已经达到了其末路。诚然，这一路线并不是单一的，正如钱理群所具体地分析过，分开为主张回到阶级斗争的毛泽东路线、宪政民主路线、党内民主派所推动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赵紫阳等老共产主义者所提出的“超越意识形态的社会进步的新标志”等诸如此类的多种路线。（钱理群②；472）钱理群说，这些多种潮流互相缠绕，其不稳定性和混乱的状态就使得我们难以预测到其未来的发展构想，因此许多人在担心这样的状态，但是换个角度而看，这样的时态也不能不被视为“发展的希望”。

对于现在的状况，许多人越来越不满，因此开始思考—争论—汇集—行动。这可能是中国的希望。历史必定是由人所创造的。历史是人民即我们每一个人所写出来的。（钱理

群②；473)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动摇日益增大的危机时代里，最近中国政府就成功地乘坐了摇摆的新自由主义世界化的末班车，很可能担当其危机深化的主要角色。但是这一危机的深化却是向代案社会转换的机会。把以一百年为其周期来回来的这一世界史上的机会变成为现实的唯一希望就是在于：中国、韩国及东亚地区的知识分子都不惜创造性的努力于，通过各种各样的“思考—争论—汇集—行动”计划的活泼，而且建构从下层面所形成的横性网络，并且与此同时，要使得这些网络跨越一国境界而扩散于整个世界联合体的多层网络里。我希望，今天第一次召开的韩中文化研究者的共同研讨会会有助于这些网络的建成。🌈

# 一位非洲知识分子的形成： 与马穆德·曼达尼对谈<sup>1</sup>

陈光兴 高士明 唐晓林\*

沉思\_翻译\*\*

---

1\_ 马穆德·曼达尼 (Mahmood MAMDANI) 是乌干达马凯雷雷社会研究所的教授暨所长，他也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府系的赫伯雷曼 (Herbert Lehman) 讲座教授以及人类学教授。2008年，在英国的《展望杂志》(Prospect) 与美国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列出的世界百大“顶尖公共知识分子”里，曼达尼名列第九。他的研究主题包括非洲与国际政治，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内战中的极端暴力，文化的政治化以及知识生产的政治性。他已出版了数本专著，包括 *Define and Rule: Native as Political Identity* (2012); *Saviors and Survivors: Darfur, Politics, and the War on Terror* (2009); *Citizen and Subject: 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of Late Colonialism* (1996) 等。

此篇访谈由法兰西斯·阿诺德于2015年5月19日誊录，于6月17日修订，最终稿定于同年8月9日。

---

\* 陈光兴，任职于台湾交大社会与文化研究所、亚太/文化研究室，台社成员，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 刊物共同执行主编。

高士明，策展人，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已出版的学术书籍包括：《视觉的思想》(2002)、《地之缘：亚洲当代艺术与地缘政治视觉报告》(2003)、《与后殖民说再见》(2009)、《巡回排演》(2010)、《胡志明小道》(2010)、《一切致命的事物都难以言说》(2011)、《行动的书：关于策展写作》(2012)、《后殖民知识状况：亚洲现代思想读本》(2012)、《进程》(2013)、《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2014)、《三个艺术世界：中国现代史中的一百件艺术物》(2015) 以及人间思想集刊和丛书等。

唐晓琳，中国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现在亚际书院杭州办公室工作。

---

\*\* 沉思，英语文学所博士生，就读于加拿大卑诗大学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对翻译工作有著难解的复杂情绪；一方面十分著迷于史黛瓦克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所说翻译作为一种“深层阅读” (deep reading) 的过程，另一方面对于每次翻译都是对自己语言能力的再磨练感到紧张而兴奋。她的翻译作品曾出版于《文化研究》(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以及《亚际文化研究》(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



马穆德·曼达尼在中国 \_ 图片由访谈者提供

马穆德·曼达尼 (Mahmood Mamdani) 为当代非洲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在 2015 年 4 月中旬，曼达尼教授踏上了一个为期十二天的、由亚际书院 (Inter-Asia School) 规划的旅程：他首先参加了在杭州举办的“万隆 / 第三世界六十年”论坛，随后前往南京跟上海，在当地各个大学发表演说。曼达尼是来自乌干达的印度裔学者，其思想著作多源自他的社会及政治参与，其中包括他对泛非主义的理想与目标的多年努力——譬如创建于 1973 年的跨国学术社群“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委员会” (The 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Africa, 缩写 CODESRIA)，便是其中一个他长期参与的计划。曼达尼特殊的生命轨迹让他成为少数真正跨越亚美非三大洲的全球性知识分子之一。我们在 4 月 21 日于杭州跟曼达尼教授进行了访谈，意图为东亚地区读者引进、翻译并出版其重要著作；我们期许他扎根于历史思维的知识成果能帮助我们拓展对当代非洲以及整个世界的理解。



## 殖民隔离

**陈光兴：**你是出生在 1946 或 1947 年？

**马穆德·曼达尼：**1946 年。

**陈光兴：**你是 1946 年在孟买出生的。能跟我们谈一下你的出生与成长背景吗？你是从印度迁居到乌干达的第三代移民吗？我们可以从这个点切入访谈吗？

**马穆德·曼达尼：**我父亲出生在坦尚尼亚的德雷沙兰（Dar es Salaam），母亲则出生于位在坦葛尼喀（Tanganyika）跟刚果边界的基戈马（Kigoma）；至于祖父母们，他们其中一些在东非出生，其中一些在印度出生。从历史上来看，我的家族成员皆来自印度古吉拉特邦（Gujarat）的卡提亚瓦半岛（Kathiawar）。

**陈光兴：**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往外迁徙？

**马穆德·曼达尼：**我母亲那边的家族最初是从 1890 年代开始往外迁徙，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末。至于父亲那边，我的祖父母在 1910 年代后半开始迁移。他们本来有三个孩子，但都死于随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而起的大瘟疫，夫妻俩于是回到了印度，在 1920 年初又搬回东非；我父亲便是他们搬回东非后不久出生的四个孩子之一。

我父母两边的家族都是做贸易的，但我父亲比较特立独行，他在一个小型社区杂志做编辑；他同时也是个诗人，为当地的社群写作，他的创作主要用古吉拉特语（Gujarati），不过有时也会用英文。因为有三个孩子要养育，父亲还做了书记工作，这份工作让他毕业后得以成为一名拍卖商。中学毕业后我父亲想要念大学，那时祖父认为他应该到孟买去——但必须在他结婚后，对我祖父来说，单身男子特别容易被孟买这样的大都市腐化。我出生在孟买，两岁时跟著父母亲回到德雷沙兰；我们搬到乌干达时应该是我五岁或六岁时，我在乌干达上小学和中学，并在 1962 年，也就是我十二年级时，通过剑桥普通程度考试（Cambridge O-levels），完成了中学学业。1962 年也是乌干达独立的年分，那年美国政府提供庆祝独立的礼物包括二十三项奖学金；我便是在 1963 年被送到匹兹堡大学读工程学的二十三个奖学金得主之一。

**陈光兴：**那么你在 1950 年左右进入小学就读？

**马穆德·曼达尼：**让我们倒着推算——我读中学是从 1959 到 1962 年，初中则是 1957 到 1958 年，这样算来小学是 1951 到 1956 年。但这段时间的头两三年我是在一个综合了宗教与世俗教育的伊斯兰学校（Madrasa）就读，后来才去上公立小学。

**陈光兴：**你在乌干达的小学和中学成长及受教育的这段过程，可以说是一个人的关键成型时期——当你回头看，你怎么去理解这段时间对你生命和事业产生的影响？

**马穆德·曼达尼：**嗯，这段时间乌干达还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生活中大小事都非常彻底地以种族做分界。我们居住的区域实施种族隔离制度，念的学校则是专为印度裔儿童办的公立学校，被称作公立印度小学，清真寺也实施种族隔离，连游戏玩耍的区域也依种族划分——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是！

**陈光兴：**性别方面也有做出区隔吗？

**马穆德·曼达尼：**这倒没有。学校是男女混班的，虽然在游戏玩耍的地方以及清真寺中有依性别做区别，我认为当时最主要的分界原则还是种族隔离。由于学校实施种族隔离制度，你在学校学的语言不是非洲语言，而是印度语言；所以你念古吉拉特语（Gujarati），或者念乌尔都语（Urdu），这两个是最主要的教学语言，小学六年级后则开始念英语。我当时学的是古吉拉特语，因为我的祖父母来自古吉拉特邦——这是那时候的教学逻辑。在学校之外的大街小巷生活则必须会讲两到三种语言，但这些生活用语都不是印度语言，譬如你要到市场买菜，就不得不讲斯瓦希里语（Swahili）。所以你在三到四种语言中生活成长。然后在学校，你从六年级开始得学英语。

第二个结构性的影响则是国族主义，或者说，一种跟国族主义的特殊关系。对在乌干达生活的印度裔居民来说，因为身为少数族群，跟国族、国家的关系是十分矛盾的；当乌干达脱离殖民统治、取得独立，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新兴国家的公民身分，还是保留受英国保护的既有身分？我们那时参与了一些政治集会，当时我还很小，但我会跟父亲去听取关于这个政治变化的不同观点。虽然那时生活中普遍弥漫着一种兴奋，实际上我们并没有感受到非常强烈的国族主义情绪。

1962年也是乌干达独立前大选的那年。我就读的学校是当时的投票所之一，我们几个学生被选作该次选举的选务人员；我们那时还未成年，还没超过十八岁，但我们竟然监督了一场只有成年人才能投票的选举！这样的场景，应该只在种族分化的社会才说得过去。

**陈光兴：**所以你的家人并没有加入国族主义的政治运动？

**马穆德·曼达尼：**没有直接加入。但某种程度上他们还是有参与，他们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感到兴奋激昂；另外，早在1956年——也就是苏伊士运河战争（Suez War）那年，我记得家中收音机时常开着，因为父亲十分关注当时埃及的情势；而在乌干达独立前，父亲心心念念的是乌干达不会加入东非联邦，因为联邦很可能将由在肯亚的少数白人专权。不过在实际的政治运动方面，我最初的决定性时刻其实发生在美国。

那是1964年，当时我还是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朋友带我去听了一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的演说。之后委员会提供了交通巴士，动员学生到位在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Montgomery）进行民权游行示威；这一切都有被报导过，是有文字纪录的。我们坐巴士去了蒙哥马利市，并在抵达时听了关于非暴力示威的经验谈：如果警察来了，就趴在地上手臂抱头以保护你的头骨。但是警察那天骑着马来，我们顿时束手无策；于是我们拔腿就跑，而不是趴在地上。警察于是追着我们打，把我们追堵到一条只有两端是开放的街上，有些警察当时还骑着摩托车，所以我们只好靠墙站着以保护自己；后来，我们都被抓进监狱了。美国的监狱规定允许你打一通电话，于是我打给在华盛顿的乌干达大使；他问我为什么要干涉外国内政，我说这不是内政，我们国家才刚争取到政治独立，而美国的民权运动可被视为相同的抗争。无论如何，我最终是出狱了，但这次经验给我带来非常关键性的影响。

**陈光兴：**这时候你已经在美国了？

**马穆德·曼达尼：**没错，1964年我已经在美国了。

**陈光兴：**到美国去可以说是一个转变的契机。更具体地问，可以谈谈你身为在非洲的离散印度人这样的人生经验吗？这种经验之于你有什么意义？我知道应该是这样的身

分让你得以到美国去，你可以说说这种相对于种族隔离的离散经验吗？

**马穆德·曼达尼：**从小到大我从不觉得自己是印度来的；我知道自己是印度人，但没有想过印度这个国家。我跟印度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关系，没有“这是你祖父母来自的村落”那种成长故事……我不知道，这有可能是印巴分裂造成的。长大后当我到印度去拜访那个村落，我找不到任何与我家族有关联的人；也许是因为分裂吧，但家中从来没有对此多做讨论。

**陈光兴：**你家族的人都搬到巴基斯坦了？

**马穆德·曼达尼：**没有，他们没去巴基斯坦。我父亲的家人迁移到在坦尚尼亚的德雷沙兰，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可说是来自坦尚尼亚。我对家族中其他人的去向一无所知，但我知道有人在巴基斯坦；也许他们离开了村落，前往其他的城市中心。但是家族的关联就这样被切断了，没有任何连结，我们也没对此多做谈论。在乌干达长大，我自己的感觉是我们来自（from）但不属于（of）这个地方——因为即使是友谊也没能跨越当地的种族界限。在中学的最后一年，学校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两个黑人学生转进了我们班，其中一个成为我的朋友；他的名字是基斯多（Kizito），我记得去他家为他过生日这样的事情。当时社会上最大的议题是谁选择成为国民、成为乌干达公民，而谁选择了不要，诸如此类的事。

**陈光兴：**那么教学内容呢？教育方面也做了区隔吗？

**马穆德·曼达尼：**教育方面嘛……从我读中学开始，英国殖民教育即要求学生在商科、文科和理科中择一修读。但事实上“选择”并不存在——成绩很好，念理科；成绩中等，念文科；成绩刚好及格，则念商科。我被派到理科组；在理组，如果你得到最高分，你便主修物理和化学两个科目，而不修读生物学；得到下一等级分数的学生则修读物理，并将化学和生物作为第二科目——这便是我在中学修读的学程。另外，学校没有开历史课。有英文课，但在英文课我们念文学而不是念英语，念的文学则是莎士比亚，从没念过任何非洲作家——非洲作家的作品是在独立时增添的。除了莎士比亚，我们还念了《屈身求爱》（*She Stoops to Conquer*）及《我的家人与其他动物》（*My Family and*

*Other Animals* )。在古吉拉特语课我们念神话文学，像是摩诃婆罗多 ( Mahabharata ) 和罗摩衍那 ( Ramayana ) 之类的史诗故事；我们也学一些古吉拉特语。所以这可以说是一种为殖民地社会条件做了调整的英国公学教育。我们有辩论活动，讨论像是国家独立这样的时事；我们也有诗歌活动，尤其是乌尔都语写作的加扎勒诗 ( ghazal ) ；我还加入了童子军，在乡村进行了很多健行活动。

**陈光兴：**在我看来，对现在的你产生了影响的只有当时参与的时事辩论，而非知识上的影响。你觉得呢？

**马穆德·曼达尼：**没错，学校教育将我带往不同的方向。

**陈光兴：**但这样的教育是否可能出现在印度的古吉拉特邦？

**马穆德·曼达尼：**嗯，我想这不可能出现在 60 年代的古吉拉特邦，而只能发生在 40 年代的古吉拉特邦，因为这样的教育带有很强烈的殖民意涵。

## 美国的 60 年代

**陈光兴：**那麽你在 1964 年到匹兹堡去攻读政治学？

**马穆德·曼达尼：**不是的，我毕业时主修政治学，可是我最初是去念工程学的。由于匹兹堡大学实行美式博雅教育 ( liberal arts education ) ，头两年我必须选修政治学、哲学、历史、西方古典音乐及艺术等科目；在这过程中我发现不一样的学习兴趣，于是决定转主修。但我当时领著政府奖学金，无法想转就转；于是校方叫我去考一个职能倾向测验，测验问了许多类似这样的问题：若你受僱于一家汽车公司，你情愿修车、卖车，还是当公司的律师？测验结果说我最倾向成为基督教青年会 ( YMCA ) 负责人。

**陈光兴：**为什麽是基督教青年会负责人？

**马穆德·曼达尼：**我的测验结果是这麽说的啊！最适合的职能倾向是基督教青年会负责人，再来是律师，我就记得这两个结果。不过这也让我得以转主修，于是我就从工

程学转到政治学。

但我必须说阿拉巴马的那次经验非常关键，因为它开启了我接下来一连串的政治参与。从阿拉巴马回来后大概过了三个礼拜还是一个月，两个联邦调查局干员找上门；就像电视上演的那样，这两个干员身穿米色风衣、亮出手裡的徽章，询问我去阿拉巴马的原因。那真是一场非常奇特的对话：他们问我对马克思有什么想法，我说我从没见过他——这是真的！当时我还未听过马克思，更遑论共产主义。他们说马克思已经死了，我说：“啊，我很抱歉，发生什么事了？”他们说不不不，他死很久了。我听了更摸不着头绪，心想那你们还问我做什么？这问题有什么意义？他们向我解释马克思主张富人的财产应该被拿去分给贫穷的人，我说：“那听起来很棒啊！”

他们没再问什么就走了，我猜他们得到的结论是这家伙根本不需要我们特地登门造访。不过，我记得后来我便到图书馆找马克思的作品来读；所以，竟然是联邦调查局让我认识了马克思！这件事大概发生在 1964 或 1965 年，之后我开始参与民权运动。当时在匹兹堡大学有个学生组织叫希尔教育计画（the Hill Education Project），希尔区是当地贫困的非裔美国人聚居地，而这项计画安排住在希尔区的中学生跟我这样的大学生会面，一周一次。计划的设想，是我们这群大学生应该有些东西可以教导这些孩子，但很快我便发现自己没什么可教的。我所能做的就是带他去吃一顿好的，然后谈天，谈任何他感兴趣的事；比如我们常去一家黎巴嫩餐厅吃口袋麵包配鹰嘴豆泥跟烤肉，边吃边聊……这个计划其实也帮了我——尽管我不确定到底帮了他多少，但参与这个计划的经验的确让我受益良多。在美国，60 年代是不得了十年，特别是在文化上。就像我们常听到的 60 年代用语，这十年不管在社会关系方面还是在你我所能冒的风险、能跨越的界线，都推翻了旧有思维，充满变革的能量；彷彿所有事物都处在变动状态、具有实验性。60 年代为我揭开了接下来十年社会运动的序幕，包括民权运动、反战运动、组织劳工工会——我参与了这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以学生的身分。后来我移居德雷沙兰，也回到坎帕拉（Kampala）……基本上，我在匹兹堡从 1963 待到 1967 年，而 1967 到 1969 年这段时间则在塔虎托大学（Tufts University）的弗莱彻法律外交学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 ) , 并在 1969 年去了哈佛。

**陈光兴:** 1969 到 1974 年, 你是这段时间在哈佛念书的?

**马穆德·曼达尼:** 是的, 不过在 1972 年我便离开美国到坎帕拉做我的博士研究。但是我的研究后来被总统伊迪·阿敏 ( Idi Amin ) 对乌干达亚裔居民进行的驱逐所中断。

**陈光兴:** 在我们讨论你的非洲经验之前, 我还有一个问题。你之前提及你跟非裔美国人社群的关系, 而你当时的身分是个外国学生; 在这层意义上, 我们留学时都经历过类似的关系。你当时身处怎么样的知识跟政治社群呢? 在我听起来匹兹堡的课程并没有给你太多的影响, 影响更多大环境的政治社会氛围。当时你们有外国学生——例如非洲学生和印度学生——的团体吗?

**马穆德·曼达尼:** 我一开始有非洲的, 也有印度的朋友。我的室友是奈及利亚人, 但他是念工程学的, 跟我的兴趣并不相仿; 而学校里的印度学生大多倾向把时间精力花在专业训练上。于是借着辩论社跟民权运动的参与, 我结交了越来越多美国朋友。

**陈光兴:** 你跟你室友当时是领同样奖学金的?

**马穆德·曼达尼:** 是的。我的室友是奈及利亚人, 但是因为我在辩论社和学生政治方面相当活跃, 我认识了来自其他地方的朋友。在美国, 学生辩论是非常热门的事; 每个周末都有辩论旅行, 开六到七个小时的车到另一所大学进行两天辩论——这是十分专业的活动, 一天有四个辩论, 第二天还有另外四个辩论。一个月内, 可能有三个周末在进行辩论, 所以周末时间就被去这个地方或那个地方辩论所占用, 生活非常紧凑。另外, 我还参与了学生政治。透过辩论和学生政治, 我交了很多美国朋友; 这也是我进入美国社会的切入点。首先是透过非裔美国人朋友, 再来是白人朋友。

**陈光兴:** 你对于自己身为非洲人的意识有随之增长吗?

**马穆德·曼达尼:** 身为非洲人的意识……确实有增长, 不过我想从不同的转捩点去谈这样的发展。譬如在 1966 年, 一样透过非裔美国人社群, 我加入了一个叫纽泽西街头学院 ( Street Academy in New Jersey ) 的计画。当时我们有六个人, 找了一栋破旧废弃的建筑作为我们的学院。其中三人负责在街头跟帮派——非裔美国街头帮派——连络

交流，寻找中学辍学生，跟他们混熟并把他们带到街头学院；其他三人则负责在学院教学，我们每三个星期交换彼此的工作。我们学院当时最大的卖点是爵士乐手法老·桑德斯（Pharoah Sanders），他曾与爵士乐名人约翰·柯川（John Coltrane）合作。我们说服桑德斯每周五下午从纽约市到位于特伦顿（Trenton）的街头学院教课；桑德斯是我们的王牌——只有出席了这週所授课程的孩子能上桑德斯在週五下午的课。我那时教的课程是古埃及还有当代非洲。

**陈光兴：**你当时从何获得这些知识呢？

**马穆德·曼达尼：**借由阅读啊——藉由课堂外的阅读。我大学时，甚至在研究生时期，都没有修过一门关于非洲的课程；那时心中的想法是我没必要透过美国的课堂去学习非洲，我觉得透过美国的课堂去认识美国自身是更好的方式。所以我没有上过任何一堂关于非洲的课，只修了一门关于印度的课程。然后在1968年，我跑去为乌干达驻联合国办公室工作。

**陈光兴：**你跑到联合国去了！

**马穆德·曼达尼：**我当时是想去联合国的，我原本的志愿是进入联合国工作。那时我在联合国新闻部有三个月的实习工作，我的老板罗曼诺夫（Romanov）是俄罗斯人，他叫我为罗马的土地改革会议写一篇报告；于是我把报告写完并交了出去，结果老板打开一个文件柜把报告放在里面。每天早上我把文件柜打开，报告依然在那里。接着一个月后，他让我写一篇关于防止核扩散会议的报告；我照样写报告、交报告，老板照样打开同样的文件柜，把报告放入另外一个文件夹。我每天照样打开柜子看，而报告照样躺在那里。

三个月后实习结束了，我便到乌干达驻联合国办公室上班。我当时的工作是帮大使写演讲稿；大使在委员会会议室裡给大概八个人演讲，其中有三个快睡着了，而我是这房间里唯一一个在听他演说的。我跟自己说，若我真的成功达成我的志愿，有一天我会变成他，然后会有另一个我坐在这里；于是我说不行，这不是我要的！

以前我常弹西塔琴（sitar），虽然弹得不是非常好，但还算过得去。所以我决定去学



音乐，申请到孟加拉的圣地尼克坦（Shantiniketan）——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的地盘——学习西塔琴，并顺利地录取了。去孟加拉念书之前，我在类似夏令营的青少年营队里工作，有个非常要好的非裔朋友住在哈林区（Harlem）。我的另外一位朋友给了我一辆车，于是我载着所有的家当开车到哈林区去找他；我们碰面谈天一小时后下楼，发现所有东西都不见了，包括放有我护照的公事包！没有护照我无法离境，我被困在那儿了。那几年，在美国居住的外籍人士必须在每年一月注册登记；现在没有这项规定，因为他们随时随地掌握了你的行踪，但在当时这是必要的手续。可是因为我丢失了护照，我没办法登记。因此在三月我收到来自军队和当地徵兵处的通知信，要我为兵役体检做报到。

**陈光兴：**以美国公民的身分？

**马穆德·曼达尼：**不是，以未登记外籍人士的身分。不过我把那张通知信冲下马桶了！在那之前，我向乌干达大使馆申请更新护照；可是他们说既然我在成为乌干达公民时还未成年，我仍然拥有受英国保护身分的权利，并且应该在二十一岁时放弃这样的权利，但是因为我未进行弃权手续，我失去了领取乌干达护照的权利。于是我跑去问英国大使馆，他们说：“啊，是这样没错，但是因为你没有在二十一岁时提出保留要求，你现在已丧失这项权利。”所以乌干达跟英国两方皆主张我失去取得公民身分的权利，我成为无国籍的人了——你对这个话题有兴趣吗？

**陈光兴：**当然！如果你当时去了音乐学院，你的整个人生可能因此改变，你可能会成为别的什麼，可能成为一位音乐家。所以你的护照被某人偷了——也许是哪个好竞争的音乐家做的！你后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马穆德·曼达尼：**正是那个时候我决定申请到哈佛去读研究所，因为我知道这是唯一的出路，不然我就得从军了！申请上了研究所后，在哈佛举办的一个接待茶会上，我见到了英国驻波士顿领事；他听了我的故事后跟我说：“我想我可以给你一份旅行文件，但你不能到英国去。”我说没问题，于是我就用这份文件飞到坎帕拉。

## 70年代在非洲的知识介入

**陈光兴：**去取得正式护照吗？

**马穆德·曼达尼：**去取得正式的护照，也去那里写博士论文——我对乌干达一直有著强烈的情感连结，我知道我的论文必须写乌干达。但是我抵达当地之时，正逢伊迪·阿敏宣布对亚裔居民的驱逐政策，于是我也跟着被驱离了。

**陈光兴：**你的家人也是吗？

**马穆德·曼达尼：**是的，那是在1972年。我去了位于伦敦的一个难民营——因为我有那张英国旅行文件，他们不得不收容我，于是我到伦敦去了。我当时在哈佛仍然有奖学金，原本的计划是回去花一年在学校当助教并写论文。但在那同时，我其实已写了一本后来非常广为人知的、关于人口的书。

**陈光兴：**你是在难民营把这本书写完的？

**马穆德·曼达尼：**没有，这本书其实是我前一年在哈佛写的一篇研究生论文，由每月评论出版社（Monthly Review Press）出版。到伦敦后，我有三条路可走，其中一个是为期五年的、在人口学研究所的工作，另外我还申请了到孟买做博士后研究。

我决定不要回美国，因为我当时身处非常弱势的位置，如果我回去了，我知道我将永远无法离开。我可能会结婚，拥有一间房子、两辆汽车和三个孩子，然后这将是人生的句点——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其实我真正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去孟买，要么返回东非。我的一个好朋友从哈佛回到德雷沙兰，已经成为德雷沙兰大学（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社会学院的院长。当时德雷沙兰大学正经历关于课程去殖民化的重要论辩，并采用了一个新的跨学科核心课程；这位朋友于是提供给我一份教职，让我去德雷沙兰教此一跨学科核心课程。我同时间也取得了在孟买做博士后研究的机会。总而言之我当时有三条出路：美国、德雷沙兰和孟买。因为我不想去美国，便拒绝了美国的工作机会；我心想，我必须再给东非一次机会，所以最后决定到德雷沙兰去。

**陈光兴：**我是否可以在这里插个话？我想这里存在着关于身分认同的问题——是印

度人、非洲人，还是乌干达人呢？在你回东非之前，这些身分认同是如何相互揉合的？在美国，你的朋友们怎么看你？你又如何看待自己？

**马穆德·曼达尼：**我认定自己是非洲人，但在文化上则是亚裔非洲人，因为我对于音乐、食物及服饰的喜爱在很大程度上混合了来自印度和非洲的影响。我的文化取向深植于印度移民在东非的经验。

**陈光兴：**那么你对于乌干达这个新兴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呢？这样的意识强烈吗？

**马穆德·曼达尼：**我在1972年回坎帕拉时，是作为一个“泛非马克思主义者”（Pan-Africanist-Marxist）回去的——我当时是这么形容自己的，但实际上更应该说是一个激进的泛非主义者。当然，我后来被视为不属于非洲的外籍人士而被驱离了。回德雷沙兰的决定，其实很大程度上可说是重返非洲；回到德雷沙兰后，我很快地加入了一个在乌干达的试图推翻阿敏的运动，这其实是一个知识分子团体，成员并非以类似政党党员的纪律方式参与。阿敏政权被推翻后，回坎帕拉——而非其他地方——的想法对我来说是无庸置疑的。

**陈光兴：**你将自己描述为一个泛非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身分认同是透过分析的知识还是自学而来的？似乎并非透过哈佛博士班形成的？

**马穆德·曼达尼：**没有，其实我的博士研究非常地马克思主义；论文名称为《乌干达的政治与阶级形成》（*Politics and Class Formation in Uganda*）<sup>1</sup>。

**陈光兴：**哈佛允许你做这样的研究？

**马穆德·曼达尼：**这个嘛，事实上我去找了我的导师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他是一位民族主义学者，但以研究方法来说则是经验主义者。我去找他并请他担任我的导师，接著我就再也没回去见他了。我那时从德雷沙兰大学提交论文，也没在最后一回哈佛当助教；我从德雷沙兰邮寄了论文——当时没有网路或类似的东西。之后校方叫我回学校参加论文口试，于是我要求他们给我寄一张机票，他们拒绝了，我便回说：“但

---

1\_ 博士论文后作为专书出版，Mahmood Mamdani, *Politics and Class Formation in Uganda*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编者注。

---

我没钱买机票啊！”他们说没有口试就不能拿学位，于是我跟他们说，大家都心知肚明口试只是一种形式。我说，你不想给我学位没关系，但这件事会使你的良心受到谴责；你明明知道这个人有资格，但因为他没钱买机票而不给他应得的文凭！不管怎样，这之后的某一天我就收到了卷在网球盒裡寄来的博士学位文凭。

所以，我的马克思主义大部分是从哈佛以外的经验学来的。在哈佛，有两门课影响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其中一个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社会理论课；这节课研究了韦伯（Weber）、马克思、莫斯卡（Mosca）、佛洛伊德（Freud）等人的思想，对我来说是一门重要课程。另外一堂课则是由经济系的激进派政治经济学家亚瑟·麦克伊旺（Arthur MacEwan）所开，当时我们有四个人——两个非洲人、一个非裔美国人和一个美国白人——上这门课，分别研究肯亚、乌干达、坦尚尼亚和尚比亚；我当时为探讨乌干达所写的报告，即是我博士论文的前身。这篇论文在德雷沙兰大学以假名撒亚·哈桑·穆尼那（Sayad Hassan Mwingine）再版流通；“穆尼那”（Mwingine）的意思是“其他人”（somebody else）——所以我的假名其实是撒亚·哈桑·其他人。这份论文是我获得德雷沙兰大学这份教职的根本原因，但是我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其实大部分得之于德雷沙兰；在那里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力很大，这点要特别感谢北京人民出版社，我们过去从他们那里取得到了很多阅读材料。

**陈光兴：**你在别的地方提过，这个时期你组织了约六个读书会，你此时已开始教书了吗？

**马穆德·曼达尼：**没错，我已经在教书。

**陈光兴：**那么你组织的读书会多是由教学人员及学生组成？还是只由青年教授组成？

**马穆德·曼达尼：**除了一个以六到七位我的学生组成的读书会，其余皆由教学人员组成。

**陈光兴：**《乌干达的政治与阶级构成》这本书在当时具有影响力吗？

**马穆德·曼达尼：**在当时是有那么一些影响力的。

**陈光兴：**回顾你的博士班时期，当你们四个同侪一块学习、做研究，是否很自然地

会去研究马克思主义，而不需要为其抗争？

**马穆德·曼达尼：**没有，那样的抗争发生在教室外。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参与了学生运动，那么从学生运动过渡到马克思主义是很自然的事。

**陈光兴：**作为一个年轻老师、教授和知识分子，70年代这段时期对于你自身的形塑可说相当重要。你可以就这点稍做讨论吗？

**马穆德·曼达尼：**70年代的德雷沙兰有著非常显著的知识参与，但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社会运动；相对地，哈佛有很活跃的社会运动跟政治运动，可是知识参与则相对疲弱。德雷沙兰这裡完全是反过来的，有很精彩的读书会跟辩论活动关注外在因素对于内部社会结构的影响，探讨国家内部社会运动和民主抗争之间的关系，而较少介入反帝国主义运动。

**高士明：**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遇过一位经济学家，论及银行系统，我问他：“我们如何在今日的经济学领域内谈论马克思？”他说：“我不想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每个人其实都带点马克思主义思想。”

**马穆德·曼达尼：**嗯，我觉得在自由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之后，每个人的经济分析都带了点马克思主义。

**高士明：**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没有被逼着去学习马克思主义，在很多方面对其并不信服；但就我个人而言，在2000年后我回去重读了马克思，因为中国大陆社会条件改变了，必须得重新思考如何跟马克思主义和解。

**马穆德·曼达尼：**去年秋天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有个从北京来访问的学生，她说在中国她对马克思主义一点兴趣也没有，但是她在美国没有上过一堂不读马克思的课！所以她竟是在美国发掘、探索马克思的。

**陈光兴：**你怎么看自己跟马克思主义在那几年形塑阶段的关系？跟知识活动有互相连结吗？

**马穆德·曼达尼：**马克思主义以一种矛盾的方式为我开拓了世界；在开拓世界的同时，它也令人安逸地掩盖了很多事情——因为它关闭了主体性的议题，因为它让人得以借一

个客观过程来理解所有一切的社会关系，我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大问题。

当我在 1979 年重返坎帕拉，我花了五年时间在农村进行访谈；我并没有在同个地点持续工作，而是利用各种假期断断续续地到分布在乌干达各地的六个村落做访谈。在这个过程中，我对农民自身的想法从不感兴趣；我的访谈总是环绕著他们有多少土地，或者他们如何处理种出来的作物，平常吃什么、卖什么、在哪里卖以及卖了多少等问题。我从没想过要去理解他们在想什么，主体性于我而言就是一个关闭的议题。

穆塞韦尼（Museveni）政府在 1986 年上台后，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调查委员会，以了解地方政府系统之名调查农民们是如何被管理的。这是个非常有争议的委员会，不同势力间为了委员会主导权而斗争；他们后来让我当了委员会主席，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我的印度裔身分，所以我不属于国内任何一个国族群体。所以我可以被视为中立，他们可以接受这样的我而不是其他人来做主席。我们花了两年时间四处拜访调查，我记得当时感到非常惊讶——这些我们正在拜访的人不就是我之前访谈过的农民吗？但他们现在对世界上可能之事的认知已大大扩展了；我发现这不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或其他什么，而是前任政府被推翻后，随之带来政治上的改变。在经济方面或全球经济关系上可能不会造成巨大的变化，但人们的思想以某种方式被打开了，他们认知中可能发生的事也产生了变化。我在书写《公民与子民：当代非洲与晚期殖民主义的遗续》（*Citizen and Subject: 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of Late Colonialism*）<sup>2</sup> 时，这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资源。这本书的背后有两个重要的影响：一个是上述经验，另外一个则是南非之行。我当时已写了一份草稿，只剩一篇讨论南非的章节还没写；然后 1991 年我去了南非，并在 1993 年以客座教授身分再去了一次。我当时心想我正好在南非写欠缺的那篇文章，但结果却是我不得不扔掉整份草稿并重新书写，因为之前心中假定了南非的情况是例外、是不同的；可是后来我意识到，我在坎帕拉的成长经验其实跟南非经验并

---

2\_ Mahmood Mamdani, *Citizen and Subject: Contemporary Africa and the Legacy of Late Colonialism*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ape Town: David Phillip; Kampala: Fountain; London: James Currey, 1996)——编者注。

---

不相异——我是在非正式的种族隔离制度下长大的，这对我来说是灵光乍现、令人激动的一刻。

**高士明：**马克思选择了一个更简单直接的方法来关闭主体性的反思空间。你能针对这点多谈谈吗？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马穆德·曼达尼：**主体性这个问题主要呈现在马克思对农民意识的讨论，以及其将实际存在的意识分为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跟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的尝试。当然，有些马克思主义者——例如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对这样的看法并不认同；这也是印度历史学的底层研究学派背后非常重要的影响之一。但是我所知的非洲学术圈仍被困于客观研究，政治经济学独占鳌头，每个人都不得不去做政经研究。我记得在德雷沙兰无论你身处哪个科系，在研究方法上，你得像个政治经济学者思考；不管是律师、政治学者、社会学者或历史学者，大家其实都是政治经济学者！

**陈光兴：**可是就此来说，至少从我的理解来看，你的论述有拓展并转化这个问题，所以基本上超越了——但没有摒弃——政治经济学，你把它置放于历史的脉络。这点跟你早期的著作《乌干达的帝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Imperialism and Fascism in Uganda*）<sup>3</sup>不同；我非常喜爱这本书，它清楚且有条理地解释了与我们大陆另一边相呼应的那个独裁统治的社会条件。但我认为《公民与子民》是一本非常健全且均衡的著作，在许多方面做出了知识领域上的介入。

**马穆德·曼达尼：**《乌干达的帝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其实是一套为讨论所准备的笔记，当年我为铁路工人组织的读书会撰写、复印这些讨论材料。以前我还开授识字班，让工人们从识字班开始学习阅读，进而去上历史课程。这本书只是那些课程内容跃然纸上罢了。

**陈光兴：**几乎就像一本手册。

**马穆德·曼达尼：**是的，它不具有学术原创性，而且书写方式还很教条——非常的“这个、这个、这个”，像在说教一般。

---

3\_ Mahmood Mamdani, *Imperialism and Fascism in Uganda*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 Books; 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 Dar es Salaam: Tanzania Publishing House, 1983)——编者注。

---

**陈光兴：**不过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的重要性。

**马穆德·曼达尼：**我把它看作我想要忘记的那个孩子！

**陈光兴：**我有注意到。也许是某种意外吧！80年代，当我们在美国念研究所时，这本书成为我们对第三个世界情势认识的一部分。

## 80年代和90年代的知识活动

**陈光兴：**让我们继续往下谈。80年代有个转折性的改变——你前往了马凯雷雷大学（Makerere University）任教，是什么促使你做这个改变？

**马穆德·曼达尼：**阿敏政权垮台后，我于1979年回到乌干达。我在教会——全非教会委员会（All Africa Council of Churches）——有朋友，于是我拿了他们所谓的边境实习奖学金（Frontier Intern Fellowship），以在坎帕拉乌干达教会实习的名义回去，这是我能够拿到签证的主要原因。回去后我申请了一份在马凯雷雷大学的教职，可是遭到拒绝。然后某份报纸为这件事写了篇报导，说大学内其实有百分之四十的空缺；于是我被雇用了，并在1980年到马凯雷雷任教。我当时非常活跃，组织了不仅有学生，还有铁路工人的读书会。那时乌干达正处于内战，是个充满变动的时期……在此同时，社会空间也被缩小，能采取行动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我们后来成立了乌干达朝鲜友好协会（Uganda-North Korea friendship society）。

**陈光兴：**朝鲜？

**马穆德·曼达尼：**当时朝鲜正在训练乌干达总统军队，而朝鲜人在谈论反帝国主义和主体思想（Juche）——我们将之译为自立（self-reliance）。我们那时候想，成立乌干达朝鲜友好协会不仅可以带来政治筹码，还有意识形态上的空间。我们让该军队的指挥官做这协会的赞助者；我们——意指在读书会这个圈子裡的人——则主导两件事：秘书和财政。这个友好协会是典型的掩护组织（front organization），我们在学校、工厂、



农村等地设立分支，全国各地共约五十六个分支；每个分支进行一项能赚取收入的活动，像是园艺或类似的东西，他们也组织读书会并帮助邻近的贫困居民，《乌干达的帝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这本书即是这个读书会的阅读材料。这个协会因为跟朝鲜及军队指挥官的关系，是当时唯一没有被禁止的团体。不过，很多从这个协会训练出来的人下乡去加入了游击运动，成为中阶指挥官。在80年代初期——我想是1982年吧，但不太确定——友好协会代表团应邀赴朝鲜参加四十周年国庆活动；我是代表团三人的其中之一。那次参访经验十分离奇，我特别记得几件事，例如当地许多重要的纪念碑越看越像西方国家的纪念碑，主体思想塔（the Tower of Juche）看上去就像华盛顿纪念碑，还有另外一个让我想起巴黎的凯旋门。在主体思想塔我们发现了一片刻有铭文的瓷砖：“乌干达朝鲜友好协会致赠”；我们感到十分困惑，不知道什么时候协会送了礼物过来，而我们还是这个协会第一个也是唯一的行政主管。我们接着到了平壤；去之前我以为会看到两个战区间真空地带，但那时我们在一栋屋内，而那所谓的真空地带只是屋外的一条街。街的另一边，我看到一名美国士兵；陪同我们参访的朝鲜队长对我说：“在这里我们喊：美国佬回去！”我马上答道：“你在这裡喊美国佬回家，我在坎帕拉喊一样的话。”回去的路上我们在北京停了一晚；隔天早上我们到城里去，北京看起来就像由一千个村落组成，许多传统式一层或两层的房子，夹杂少数西方风格的高楼大厦。街上满是自行车，只有几辆汽车缓缓地在自行车海中移动。相比于平壤，北京就像一股清新的空气。

这些都是在80年代发生的事。我在1984年被驱逐出境，公民权也再次被政府收回，我想，这是因为我个人在这时期所展开的活动。

**陈光兴：**是因为你写的书吗？

**马穆德·曼达尼：**不，是因为我做的某次演讲。1984年伊索匹亚飢荒后，国际红十字会举办了一系列灾害防治会议；他们的第一站在乌干达，并请我做主题演讲。那时我刚从北方一个村落回来。我在演讲中说飢荒的根本问题不在天气，而是政府还有其所设立的市场结构；我给他们分析农民卖小米或棉花所得的收益是如何被分给了种植者、商人以及政府等三方。乌干达的内政部长当时是红十字会的赞助者，演讲完的一个礼拜后

——当时我人在塞内加尔（Senegal）参加会议——我收到一封部长发来的信说我不再是乌干达公民。我只好到德雷沙兰去，然后在密西根当了一学期的访问学者。后来新政府上台执政，把我叫了回去；新政府裡的很多人跟我在德雷沙兰时是在一块的。

**陈光兴：**这段时间可谓你的活跃运动时期。你在那里待到 1993 年？

**马穆德·曼达尼：**我在坎帕拉从 1979 年待到被驱逐出境的 1984 年，后来在 1986 年一月回去；1993 年到南非德班（Durban）待了半年，然后在约翰尼斯堡（Johannesburg）待了两个月；接著在德里（Delhi）的尼赫鲁纪念博物馆暨图书馆（Nehru Memorial Museum and Library）待了一年；然后在普林斯顿从 1995 年 9 月待到 1996 年 6 月，1996 到 1999 年则是在开普敦（Cape Town）。

**陈光兴：**所以这是你的一个四处移动的时期？

**马穆德·曼达尼：**这个时期始于 1989 年的大学罢工。因应经济结构调整计画（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以及大学内日渐普及的商顾谘询，我们于 1986 年在坎帕拉创立一个名为基础研究中心（Center for Basic Research）的研究单位，我跟我的六个研究生为学术研究成立这个中心。然后 1989 年发生了大学罢工，学校的保安人员当时声称我用中央情报局（CIA）的钱创立这个中心来破坏大学的运作，让我在学校跟研究中心两者间做选择。于是我开始请越来越多的假，我请了一年假到南非做研究；当我试图跟学校请第二年的假，他们说不行，你必须辞职因为你占了别人的就业位置。与此同时，我在 1991 年三月结婚了——与此同时！

我妻子米拉来自印度，我们在 1989 年当她来坎帕拉拍电影时相识。所以后来我就跟着她去新德里，去尼赫鲁纪念博物馆暨图书馆。不过，事情没有这么顺利，虽然我是受邀前去的，由于我的穆斯林背景，我必须从三个部门——教育部、外交部及内政部——分别获得许可。我后来只拿到一个许可，所以我无法做研究，甚至不能进入图书馆。那一年《公民与子民》出版了，然后普林斯顿大学请我过去当一年客座教授，于是我就去了普林斯顿。

**陈光兴：**这本书背后的研究工作是你在 80 年代在乌干达做的？

**马穆德·曼达尼：**可以说是 80 年代末及 90 年代初，但也有一部分研究是 1993 年在南非做的。1993 年以前，除了《乌干达的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我都是为了写书而写书；但在 1993 年后，我的写作主要是为某特定主题或事件发表我的观点。

**陈光兴：**我不是做非洲研究的，但我知道《公民与子民》对非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穆德·曼达尼：**嗯，《公民与子民》其实是很有争议的一本书。在北美，它得到了非洲研究协会（the 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的赫斯科维茨奖（the Herskovits Prize）；在非洲，它在开普敦举办的辛巴威书展中被选为百年来非洲最好的一百本书之一。可是它在南非是十分有争议的，因为它对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的南非学术思想做了很严重的批判，比如批判南非学术界将南非经验视为例外，并将其从殖民经验——特别是非洲的殖民经验——抽离的倾向；这本书主张重新嵌入南非经验以同时阐明南非和非洲的历史。在南非的白人学术圈，这本书几乎可说是被视为禁书了！不过在一些有名望的学者中，这本书也找到了相似的反动意见。我从 1996 到 1999 年在开普敦大学工作，当时参与了许多主要为课程改革而起的抗争。

**陈光兴：**但这本书也是你被开普敦大学任用的原因，不是吗？

**马穆德·曼达尼：**其实这本书是我得到工作那年出版的，因此当时没什么人知道它。之所以会被任用，我想是因为我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缘故。我到开普敦大学做了一场关于卢安达大屠杀的演讲，而他们刚好需要一位非洲学者；当时南非正处于种族隔离政策解除的转型期，因此他们需要一位来自非洲的学者。那时这本书甫出版，南非版本则发行于 1996 或是 1997 年——不管怎样，是在我到开普敦大学后才出版的，所以我当时不被视为具有任何威胁性。

**陈光兴：**这本书有很多方面可以加以讨论，但至少在学术界，它产生的影响绝对不止于非洲研究。以研究命题来说，这本书非常难以定位，书中有人类学，有政治经济学，还有历史，即便是现在较流行的领域，像是迁移研究也有——这本书并不属于任何学科。有了这些不同的研究目标，你在非洲研究以外的情况如何？

**马穆德·曼达尼：**这个嘛，哥伦比亚大学给了我一份在人类学系的终身职。我记得

在电话中跟他们问：“为什么是人类学？我从没上过一门人类学的课，我对这个领域一无所知。”他们说，我们认为你的研究属于人类学，我说好吧！因为我知道就美国政治学的发展看来，要我现在去教政治学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人类学系正试图成为一个无学科规训的空间；如同地理学，人类学那时经历了一场危机，正因为它跟殖民计划有如此直接的牵连，它同时也是最具再造和反思能量的场域。哥伦比亚人类学系的新任系主任尼克·德克斯（Nick Dirks）当时聘任了好几位跟我一样没有受过正统人类学训练的学者。

**陈光兴：**《公民与子民》这本书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系列丛书之一？

**马穆德·曼达尼：**没错，出版于文化与权力系列。

**陈光兴：**人类学以外的领域如何看待这本著作？

**马穆德·曼达尼：**正如我之前说的，这本书在非洲研究领域有得到认可；这是因为它主要在探讨非洲，可是非洲研究在美国是非常边缘的领域，以致它在政治学外并未得到太多关注。我其实也不太清楚，不过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在《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新学院（the New School）的期刊——针对这本书写了一篇很好的书评。

**陈光兴：**不过人们还是在读这本书。不管在学术还是知识上，你的著作其实跟文化研究没什么关系，但似乎又有一定的连结，像是对知识活动跟政治的著重，以及强调根基于历史的理论生产。

## 与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委员会一同成长

**马穆德·曼达尼：**其实我们应该把《公民与子民》置放于它在非洲的发展轨迹中观看——也就是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委员会（CODESRIA）；透过此知识社群去观看，会更容易理解这本著作。我从1974或1975年开始在德雷沙兰进行的其中一项知识介入便

是这个理事会；从70年代开始到80年代再到90年代中期，这是持续了将近二十年的、非常重要的知识介入。跨学科是这个理事会的主要特点，一直到90年代理事会中才比较有讨论学科知识的空间；在那之前，我们所有人都在做政治经济学。在这层意义上，这本书并不主张将政治经济学摒弃，而是说光这样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窗口，因为有很多我们之前视而不见的问题需要处理。这本书在我的同事圈中造成极大的反弹——这是继南非学术圈后对我的书感到不悦的第二组人马。

**陈光兴：**他们觉得这是一种背叛？

**马穆德·曼达尼：**是的。

**陈光兴：**所以这本书没有对理事会产生知识上开疆拓土的影响？

**马穆德·曼达尼：**没有。

**陈光兴：**直至今日？

**马穆德·曼达尼：**它的影响被推迟了，发生在年轻一代身上，而非跟我同辈的老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我的同辈人则变得更加团结一致，但他们并没有把我排除在外；所以我还是这个社群的一分子，只是他们感觉被背叛了——没错，用“背叛”形容再贴切不过。而年轻的一代……应该说我那本探讨卢安达的书出版后，这本书开始被更广泛地阅读了，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美国、冷战与恐怖的根源》（*Good Muslim, Bad Muslim: America, the Cold War and the Roots of Terror*）<sup>4</sup>以及另一本探讨苏丹的书出版后，由于这两本书的论点建立在《公民与子民》之上，很多人在读了它们之后回头去读《公民与子民》。总而言之，以上的讨论概括了我们那代人对这本书的反应。

**陈光兴：**你之前提到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委员会从70年代开始作为一个知识环境的重要性。我们这边的读者对此一组织基本上不大认识，你能概要地描述这个委员会的组成跟影响吗？在某种层面上，这也是为我们自己——即亚际书院（Inter-Asia School）——提问，因为在亚洲这边并没有类似的泛亚团体。

---

4\_ Mahmood Mamdani, *Good Muslim, Bad Muslim: America, the Cold War and the Roots of Terror* (New York: Pantheon, 2004)——编者注。

---

**马穆德·曼达尼：**你们的亚际团体跟委员会间的差异其实让我印象很深刻。你们在各国设有办事处，而我们从未有这样的设置；虽然这让我觉得或许我们也该这么做，但我们甚至没有区域办事处，我们只有在塞内加尔的达喀尔（Dakar）的这么一个办事处。广义地说，理事会是由左翼激进的学者所创建的；它同时也成为小国学者跟流亡学者的避风港，但是这个理事会有很强大的凝聚力，更在非洲各地举办诸如专题座谈会、研讨会等大型活动。每三年有一次联合大会，而每次约有三百位学者出席参与；大会花一天处理干部选举等事务，然后进行两到三天的学术讨论。理事会也做出版，有自己的期刊——《非洲发展》（Africa Development），还出版《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委员会会刊》（CODESRIA Bulletin）作为会员进行讨论的论坛。它底下还设有好几个跨国工作小组，每个小组由七到十位来自不同国家的会员依共同的研究主题组成。

在我看来，理事会的第一个重大转折点发生在 80 年代，那时出现了要求为社会运动及民主斗争设立跨国工作小组的声浪，要求把研究重点转移到内部议题。然后我们在 90 年代于迦纳（Ghana）成立了名为人文研究院（the Humanities Institute）的年度夏季学院，主要探讨贩奴路径；接着我们成立了性别研究院及民主研究院，共有三个不同的研究机构。理事会的资金由西方国家捐助，但我们大部分的资助者在北欧，其中最大宗则来自瑞典。

在过去的十年左右，因为来自资助者的压力，理事会在研究方法上越发保守；这样的发展也借由他们举办的研究方法研讨会形成——对他们来说所谓“研究方法”即定量方法（quantitative methods）。理事会一直没能解决它的财务难题，也就是如何能找到稳定的资金来源；这种情形造成了与在其他非洲大学工作的非洲知识分子相比，相对享有特权的中央官僚。这中央官僚就在我们的达喀尔办事处，那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非洲人，可是他们将本地员工和来自国外的泛非人员做了区别；泛非人员——主秘书长、执行秘书、副执行秘书——的薪资比照联合国支付，而本地人则按当地薪资支付。本地员工的薪水符合在当地大学工作的收入，但泛非人员却领取美国价码的薪水；虽然等级不比美国高阶收入，但跟中低阶收入相去不远，还享有包含医疗的工作福利，甚至免课税——因为塞内加尔给了理事会外交身分。这些职位是全职工作，可以说是令人梦寐以求

求的，不过这也造成秘书处和执行委员会之间的某种政治角力。执行委员会由来自非洲大陆各地的一般学者组成，这让事情容易被一些小特权的诱惑而左右；至于秘书处，其人员则处在一个能运用自由裁定权的位置。所以我认为理事会在建制方面是十分薄弱的，因为它必须应付这两股势力；而当资助者的兴趣消退或转向时，它必须处理随之而来的财务混乱；另外，它还得设法从意识形态跟知识的风暴中生存下来。尽管如此，理事会从1973年以降就这么运行至今。

**陈光兴：**所以这是你思想发展成熟的一个场域，是吗？

**马穆德·曼达尼：**是的，我跟它一同成长。

**陈光兴：**从1996到1999年，你在开普敦大学的工作跟理事会主席的工作重叠了，后来还发生了“曼达尼事件”（the Mamdani Affair），你可以很快地解释一下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吗？

**马穆德·曼达尼：**嗯，曼达尼事件简单来说是因一门课而起的争议。当年开普敦大学聘请我担任非洲研究的阿奇博尔德·坎贝尔·乔丹名誉教授（A. C. Jordan Professor），同时决定开设一门每位新生都必修的非洲研究课，并让我去规划课程；规画好的课程大纲则由管理人员组成的委员会审议。我那时将该课程分为六个子题，于是委员会做了一份调查，他们将这六个子题送至各系所，并请所长及系主任为每个子题标示“相关”、“不那么相关”或“完全无关”等注记——这份调查可以说是有三个选项的选择题。结果其中两个子题——其一是奴隶问题，其二是南非经验——被大多数人选为跟这门课完全无关的；于是委员会把调查结果送还给我，要求我修改课程大纲。

我跟他们说，首先课程大纲不应该由管理人员审议，而应该交由同行审查；所以我向他们要求了同行审查——我说我不仅能提供任何他们需要的书面资料，还愿意在同行前以研讨课形式报告这份课程大纲，让大家有开放讨论的空间。于是这件事如雪球般越滚越大，还滚进了南非议会、报章杂志等这个那个的。他们后来同意举办一场公开辩论——不是研讨课，而是辩论！辩论当天大约有两三百人到场观看；由于那场辩论的主要议题为南非例外主义（South African exceptionalism），我没有针对奴隶问题多做讨论。

那次事件后，我做了一场就职演讲，讲题为“移住民能成为原住民吗？”（Can a Settler Ever Become a Native?）这次又有数百人到场聆听，全是慕讲题之名而来；有来自其他城镇的白人，以及许多各式各样的人。而我那场演讲的答案是，移住民永远无法成为原住民，因为移住民和原住民是相连的，可以一起被毁坏并转化成新的关系——“原住民”是由移住民创构出的概念。《公民与子民》在南非出版的那年获开普敦大学颁发的开普敦图书奖；之后我就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聘任。

我的妻子米拉其实在开普敦也不太开心；那边的电影圈对她的作品毫无兴趣，反应非常冷漠。虽然她在某个城镇为一个团体提供了一些训练，总的来说她过得很不开心。于是她对我说：“听好，我们三个选择：我们可以去纽约，可以去坎帕拉，也可以去新德里。”接着，我便收到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的工作机会。以上即是曼达尼事件大致的前因后果；其实这个事件从来没有消失，它正以其他面貌——例如开普敦的“罗德得倒下”（Rhodes Must Fall）事件，还有课程纲领去殖民化的问题——返回并活跃于今日。

## 纽约经验

**陈光兴：**你在1999年搬到纽约，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这可说是你生命的另一个阶段。

**马穆德·曼达尼：**是的，但你知道从1999到2001年其实只是一段很短的时间。我去纽约后不久便发生了9·11事件……

**陈光兴：**你曾经在美国留学、当研究生，现在以教授身分回去教书——所以这次移动可说是具有不一样的能量。跟之前的美国经验相比，可以谈一谈你在知识上更臻成熟后到纽约去的差异吗？

**马穆德·曼达尼：**若我当初毕业后留在美国，是绝对无法在其教育体系下存活的，绝对不可能，我一定会忍不住反抗！我无法容忍资深学者享有的那该死组合：年资、地位、监查权加上否决权——他们跟你是同事，但同时也对你的升迁去留做表决，所以其实他



们握有一定权力,我不认为我能够在这样的体系中待下去。我这次回纽约是带著终身职的,如果没有终身职,回美国基本上是免谈了,这是其中一个差别。再来,我在乌干达从来没参加过非洲研究协会;事实上,我记得我只参加了一次他们的会议,因为当时我们认为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委员会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另一条出路——委员会是属于我们的团体。到美国后,我很快地发现非洲研究对美国国内——甚至是国外——学术讨论的影响力非常地微不足道;它同时还是二等或三等知识分子的收容所。这些学者越没有影响力就越发地没安全感,然后他们往往更容易成为看门者;这里甚至不是一个欢迎新想法的家,一切都非常陈腔滥调。它同时还是一个与政府部门关系密切、偏重政策的学术生产领域。现在回想起来,9·11事件让我得以从非洲研究脱身;我在那之后的书写跟非洲研究无关,但是跟非洲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大有关连。

**陈光兴:**你指的是《好穆斯林,坏穆斯林》?

**马穆德·曼达尼:**是的。《好穆斯林,坏穆斯林》这本书旨在探讨非洲,而无关被称为非洲研究的专业训练。它把对非洲的探讨置放于一个更广阔的、全球性的框架,从以去理解9·11这样的全球性事件。即使我在这之后写了卢安达大屠杀和苏丹,我的书写从来就不以非洲研究文献为导向。那时跟我对话交流的同事都不是非洲研究学者;虽然我后来还是参加了一两次非洲研究会议,但是我在这个专业社群中一直是身处边缘的。

**陈光兴:**那么从知识讨论跟严谨度来看,委员会的非洲研究工作成果已远远超过北美地区的非洲研究?

**马穆德·曼达尼:**是也不是。北美的优势在于他们提供了学生之后进入大学教书所需的训练;而委员会的劣势在于我们从未有意识地去了解年轻博士生的重要性,以及培育、塑造和指导这些学生的重要性。我们有一个小额奖助计划提供博士生研究员的职位,但我们从来没有把这些年轻学者跟在委员会发迹的学者做连结;所以它实际上只为年轻学者提供了金钱资助,而没有任何形式的授业或指导。我们也没有投入资源在非洲的大学成立博士班;而非洲研究在美国定基于两件事:一是他们培养的博士生,二是政策咨询,也就是他们与政府的密切关系。理事会则两者皆无;我们有自觉地决定不跟政府打交道,

但我们无意中选择了不去培养年轻博士生。

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主要缺点之一：作为一个知识社群我们无法自我延续，这也是委员会的一部分危机。的确是有下一代出现，但这所谓的下一代是政治运动者而不是学者；这些运动者在体制上多处于非政府组织或非洲联盟的官僚体系。由于这方面的不足，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一道裂痕，这就是我们的危机。

**陈光兴：**学者跟公共知识分子间的关系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不同吗？

**马穆德·曼达尼：**没错，也因此在美国的非洲研究社群在谈到理事会时常作势自居为学者。

**陈光兴：**在美国受教育的非洲博士生有很多人毕业之后回国吗？

**马穆德·曼达尼：**很多人在那里受教育后就待了下来。如果你现在去美国参加一个非洲研究会议，与会者大多是非洲人。

**陈光兴：**就像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所以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术环境跟你心境的转换有关吗？

**马穆德·曼达尼：**嗯，另外我自己也做了工作单位上的转换。我原本在人类学系，而人类学系当时内部也在发生变动，因为尼克·德克斯前几年所提倡的无学科规训空间引发了从事跨学科研究学者的反弹，他们想要重申学科分界、研究方法、公民权等议题。我那时是非洲研究中心的主任；在哥伦比亚，非洲是世上唯一在科系方面没有立足地的区域，除了非洲，世界上其他地方在这所大学都有自己的科系。非洲那时后只出现在所谓的“救火科系”——例如公共卫生和国际关系等，但没有值得一谈的非洲历史或非洲文化研究。我后来成功地把这样的情势转变。

我的成功部分归因于学校里另一系所发生的危机。当时中东语言与文化学系（Middle Eastern Languages and Cultures）被犹太复国主义势力围攻，一个名为大卫计划（The David Project）的校外团体攻击约瑟夫·马萨德（Joseph Massad）等学者为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于是校方认为把南亚和非洲研究加入系所，以拓宽其领域是可行的解决办法。在此同时也招募新血，把梵文学者谢尔登·波洛克（Sheldon Pollock）从芝加

哥聘请过来，另外还有像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这样的政治经济学者。米切尔后来建议这个改造过的科系不应该叫语言与文化学系，而是中东、南亚与非洲研究学系（Department of Middle Eastern, South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无论如何，我当时决定转换到一个仍保有一定素质的学术单位。于是我主要的知识参与转移到中东、南亚与非洲研究学系；还建立了一个交流网络，一个叫意非其雅（Ifriqiyya）<sup>5</sup>的讨论会。意非其雅讨论会著重于前现代的非洲和印度洋，至今已有六七年的历史。我们每个月进行一次讨论会，另外还举办两个工作坊：一个探讨跨非洲的奴隶制度，另一个则研究印度洋。我们六月下旬将与我在坎帕拉的研究单位合办跨非洲奴隶制工作坊。奴隶研究的文献大多透过对大西洋奴隶制的研究形成，另外奴隶制常被视为等同于种植园奴役（plantation slavery），其他的则归为家庭奴役（household slavery）。我对奴隶制之于国家形构过程的关系非常感兴趣，因为除非你认知到很多赤道以北非洲国家的形成与奴兵及奴隶行政人员息息相关，你无法理解非洲国家的构成。此外，大多数的奴隶被留在非洲内部，而没有被出口；所以在塞内加尔、摩洛哥、阿比西尼亚（Abyssinia）以及达尔富尔（Darfur）等地的个案研究。

**唐晓林：**你说大部分的奴隶被留在非洲，这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

**马穆德·曼达尼：**他们大多被雇留为奴兵以及奴隶行政人员，这于是形成了一个等级制度。

**唐晓林：**所以非洲本身也有奴隶制度？

**马穆德·曼达尼：**是的。例如在塞内加尔有切德（cheddo）奴兵，还有一整个区分奴隶的等级制度。最显著的例子，我想是鄂图曼帝国（Ottoman Empire），它的国家结构即是一整套奴隶等级制度，甚至帝国统治者苏丹王（Sultan）的母亲也通常是个奴隶。

---

5\_ “中世纪时罗马帝国以‘意非其雅’（Ifriqiyya）一词称其最南端的行省（即今日的突尼西亚）。伊斯兰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也曾用此指称南方之地，也就是黑格尔（Hegel）所谓严格意义上真正的非洲——这个严格的地理定义是相对于欧非（也就是北非）与亚非（包括埃及、努比亚与伊索比亚等地）。这一词适切地突显了非洲作为一个当代地理指涉词的不稳定性与其所致之争论。”以上说明取自此讨论会的官网 <http://www.columbia.edu/cu/mesaas/events/ifriqiyya.html>，撷取于2016年2月17日——编者注。

---

另外还有土耳其禁卫军奴役体系（Janissary slave system）……殖民主义自居为这些奴隶的解放者，但这样的解放为期不长，因为不久后就出现了强迫劳动（forced labor）。所以奴隶后裔和其他社会成员间的分歧还存在于许多非洲社会；这些分歧表面上看不出来，但它们影响了很多今日的冲突，例如劳动迁移系统（labor migration systems）——关于谁迁移、谁没迁移、谁又被迫迁移等问题。

**唐晓林：**那么研究印度洋的工作坊呢？

**马穆德·曼达尼：**它目前的进度是落后的。我们在哥伦比亚办过两次工作坊，接下来则有我稍早提到的在坎帕拉的工作坊。但是印度洋的研究……我还没找到研究前现代时期的中国学者。印度洋研究目前的问题是他们认为事情只发生在靠近印度的那一边；这点跟美国的大西洋学术研究很像——譬如《黑色大西洋》（*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Consciousness*）<sup>6</sup>，你若念了那本书你会认为所有事情都发生在美国，而不是非洲。

**唐晓林：**印度洋是一个很广很大的主题……

**马穆德·曼达尼：**那当然，这是委员会的传统！我们研究庞大的主题！

**唐晓林：**那你如何设定讨论的议题？

**马穆德·曼达尼：**举办第一次工作坊时，我们的做法是把正在进行前现代时期印度洋研究的人聚集起来，无论他们研究什么；因为非洲研究越来越把焦点著重于现代——这样的研究发展不仅发生在美国而已。以前的重点曾是殖民时期，现在则偏向后殖民时期；历史学的博士论文多探讨1960、1970或1980年代，很少谈到前现代时期。而非洲大学的历史学系财务窘困，很多几乎都要倒了，所以历史学者大部分在美国、英国和欧洲受教育，可是他们生产的学术研究非常以当代为导向。

**陈光兴：**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这是因为许多以当代为导向的研究建立在某些去历史的假设上，而把早前的基底视为理所当然的。所以你们设立这个计划是为了挑战无论

---

6\_ Paul Gilroy,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Consciousn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编者注。

---

是偏见或是假设的现存理解——这似乎是背后的驱力。我们总说我们需要更大规模的历史研究以支持像是奴隶制的主题，但很少谈到另一面，也就是这些研究的基础认知。

目前纽约有很多人在讨论大学之外的广泛知识参与，你有参与这些左翼知识圈或辩论吗？这对你自己的工作有产生影响吗？

**马穆德·曼达尼：**反恐战争及其相关争论吧！我指的是《好穆斯林，坏穆斯林》这本书，它的起头是9·11发生一周后我在纽约上西城河滨教堂所做的演讲。这篇演讲是为了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博客而写的；之后它被收入一本选集，还被当作书的一章出版。于是我决定将这篇讲稿加以扩展。

**陈光兴：**这本书的写作风格跟你其他的著作截然不同。

**马穆德·曼达尼：**完全不一样，它是非学术的。我原本计划在三个月内把这本书写完，但它不停地扩展，最后我写了十五个月。

**陈光兴：**这本书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另外，回到你对知识工作的认知，有哪些随之而来的变化？

**马穆德·曼达尼：**在某个层面上它让我跟德雷沙兰时期重新接合，因为它肯定了我们当时探讨美帝国主义在非洲影响的研究工作，并把9·11事件跟帝国历史做连结：从美国越战失利，到南非，到莫桑比克（Mozambique），然后是尼加拉瓜（Nicaragua）。这让我看到了越南和阿富汗之间的遗失连结，就像布希政府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Rumsfeld）后来说的：去串连并理清环节（to connect the dots）。这是那本书的其中一项主要论点：阿富汗或9·11其实是回应越战失利而起的一系列过程的产物。该如何应付这场失败？而所谓捍卫现状的全球性计划是如何在这次失败后展开？另一方面，这本书也试图了解伊斯兰圈的内部分化。我目前仍对这两方面很感兴趣，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在纽约进行的广泛讨论，我想我的主要参与在于探讨反恐战争作为美国外交政策核心的问题。

**陈光兴：**《好穆斯林，坏穆斯林》是你最畅销的书籍之一。尽管你把重点转移到知识层面的美国政治，它跟你之前的著作仍有一定的连续性。另外，你近期发表探讨“移

住民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的文章也从根本上挑战了知识面的自我理解。

**马穆德·曼达尼：**我那时对美国及美国原住民产生兴趣，并试图从一特定视角——美国原住民经验——去了解美国；我为那篇文章写了很多很多草稿。后来我去了拉姆安拉（Ramallah），去了位在以色列占领区的比尔宰特大学（Birzeit University）；我花两年的时间什么都不读，只阅读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然后我又写了几份草稿，不过后来都收起来了。所以我对移住民跟原住民的思考不断在成长，在某些时刻我曾想过也许我该把它写成一本书，但这并没有发生。后来我得到了在普林斯顿进行爱德华·萨义德讲座的机会。

**陈光兴：**这篇文章似乎延续了《公民与子民》，然后论点一路斡旋到《定而治之：原住民作为政治身分》（*Define and Rule: Native As Political Identity*）<sup>7</sup>那本书。文中一个重要论点在于移住民与原住民其实是一体两面；而这样的关系透过具体的政治进程——如国家的形成——居中调停，否则这些东西是无法解释的，这似乎是你文章的研究方针。使用较早的名词来说，这样的关系就像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不过它又是在政治进程中被创构出的政治身分，因此它具体的特性将完全不同。你的这一举动在研究方法上十分激进，实在地提出了“什么是政治身分”和其他一系列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在各个区域都需要被正视的知识议题。

**马穆德·曼达尼：**我的研究兴趣其实也在转变，这点也是我之后想在南京谈的。简单来说就是去理解暴力，去理解我称之为“政治暴力”（political violence），以及它如何不同于所谓的刑事暴力（criminal violence），并探讨把政治暴力当成刑事暴力——把它看作只不过是刑事暴力——的问题。因为这种看法掩盖了政治暴力具有一定支持者的事实，政治暴力无法被理解为仅由加害者所致，而必须将它视为被议题所驱动，并且是暴力循环的一部分。

我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写了一篇文章批判纽伦堡——即纽伦

---

7\_ Mahmood Mamdani, *Define and Rule: Native As Political Ident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编者注。

---

堡如何成为人权团体运作的典范。这些团体借该典范看人权冲突，然后把暴力责任个体化当成解决冲突的方案。我在那篇文章把这点跟对国际刑事法庭的批评做连结，然后把它跟南非做连结。这也带出了另一件我想在南京谈论的事：过去二十几年，有一部分非洲左翼写作其实是在谈革命被背叛的故事。所以，一本谈坦尚尼亚的书其实是在讲被背叛的革命；谈莫桑比克的书也在讲被背叛的革命；辛巴威——被背叛的革命；南非——被背叛的革命。这种论述是探讨发展不全（underdevelopment）学术研究的一部分，总是在谈没有发生的事，你永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杯子有一半是空的，但究竟杯里的另一半是什么呢？

所以我问：该如何理论化种族隔离的结束，还有结束之后发生了什麼？三十年前，我们把正义理解为社会正义，而今日正义则被假定为刑事正义。这两者在南非都没有发生；没有人受审判，甚至是杀害史提夫·毕科（Steve Biko）的凶手都没有受审。虽然社会正义也没发生，但有政治正义和制度改革，法律和政治上的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对我来说，这还可以跟更大的争论——关于政治独立的意义——做连结；这是对新殖民主义论点的批判，也是对非洲已达成果视而不见的批判。这是另外一个让我感兴趣的议题。

## 书写卢安达与苏丹

**陈光兴：**你对卢安达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新的思维模式去理解大屠杀。透过对该地区早前历史之查探，并且确立问题的根源在于殖民治理术（governmentality）以及其后殖民政治裡未解决的遗绪，这本书极具说服力地解释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是什麼促使你在 90 年代末期开始进行如此艰钜的任务？

**马穆德·曼达尼：**虽然我人生大部分时间住在离卢安达跟乌干达边界仅约一百英里的地方，由于卢安达是比利时的殖民地，它其实算不上我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情况持续到 1994 年的大屠杀，当时我们开始听闻有尸体漂浮在维多利亚湖；农民把那些尸体

捞上岸，然后进行定期的大规模葬礼。我记得，有一次某个朋友跟我说他刚参加完到湖滨村落埋葬与纪念逝者的巴士行程，他谈到帮忙埋葬死者的好几个农民都已经疯了。

几个月后，非洲社会科学研究发展委员会决定举办一场跨非洲研讨会来反思这场悲剧。他们向我邀了稿，于是我决定在开始动笔前必须到基加利（Kigali）去一趟。我当时不太确定到了基加利我会跟什么人碰面或做什么事，所以实在是非常惊喜能在那见到一些我在马凯雷雷教过的学生。我以前一直以为这些学生是班洋科来人（Banyankole）——虽然其中几个确实是，他们目前在军队、政党，甚至改组后的警察和宪兵队里都担任重要职位。我跟他们以团体或一对一的方式碰面，他们似乎跟其他人一样都对这场大规模的暴力深感困惑。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在卢安达待了十天，从基加利到布塔雷（Butare）大学城，接著再到位于雅玛塔（Ntarama）的教堂——这里曾是其中一场屠杀的现场。于是卢安达变成一件让我挂心的要事，一个关于后殖民暴力的隐喻；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次政治挑战，一个可以从中思考后殖民政治危机的有利位置。研讨会结束后，虽然近期没有其他探讨卢安达的学术活动，我还是不停地回去卢安达，一年大概会去好几次。当卢安达爱国阵线（Rwandan Patriotic Front）在1997年越界进入扎伊尔（Zaire），我去了吉塞尼（Gisenyi），然后跟着卢安达指挥官——几年前他曾上过我在马凯雷雷所开的“马克思主义和第三世界”课程——越过国界进入戈马（Goma）。我在戈马跟反蒙博托叛乱（the anti-Mobutu rebellion）的领导人朗洛·卡比拉（Laurent Kabila）碰面，他之后不久便取代了蒙博托成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新总统。我上一次见到卡比拉是在1979年，在坎帕拉的帝国饭店，那时他还是在各饭店游走的游击队队长，而我是一个甫从德雷沙兰回来、无家可归的流亡者。

同一年的早些时候——1997年——委员会邀请我跟来自刚果的学者雅克·德佩青（Jacques Depelchin）到刚果东部做研究。雅克是一位历史学家，而我们80年代都在德雷沙兰待过。我们的任务是跟公民运动者还有政治组织者碰面，并去理解当时的公民身分危机——这样的危机在基伍（Kivu）省的巴尼亚穆伦格（Banyamulenge）问题发生后益发明显。巴尼亚穆伦格这个名称在历史上指的是住在穆伦格（Mulenge）山区、以卢



安达语为母语的人，现在它已成为刚果东部以卢安达语为母语的少数族裔的泛称。我在当地很开心地发现，斯瓦希里语（kiswahili）是刚果东部的其中一个通用语，这让我得以跟会面的人对谈；不过他们的学术语言是法语，尽管我大学时花了好几学期去学，我的法语仍然很糟，还好那时有雅克在我旁边帮忙。

我在卢安达的经历加深了我对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不满。我在1997年从基伍东部回到开普敦时，曾碰到一群区域研究专家；对他们来说“非洲”指的是林波波河（Limpopo River）以北的一块需要被研究的地区。我在1999年到哥伦比亚大学任职后，开始跟对区域研究有诸多批评的后殖民学者对谈。当我跟卢安达的接触发展成与卢安达专家的接触，我对区域研究的不满变得更加强烈，我开始思索把政治分界变成知识生产分界的问题；即使部分激进的区域研究学者把殖民地的发展跟帝国的发展做连结，他们极少跨越殖民地之间的界线。对我来说，即使大屠杀发生在卢安达，很明显地它的背后成因以及它释放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卢安达本身。相反地，委员会的知识传统则不然，我们从未让国家边界停止我们对知识的追求——谈论耕地问题时，我们研究了包括中国、俄罗斯、韩国、印度、英国自耕农（English yeoman）、德国贵族地主（German Junker）还有拉丁美洲的任何经验，完全不担心越界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身处的位置——我们一直很明白我们是从某个特定地方看世界，而那个地方就在非洲。我对区域研究的另一个不满则在于他们对理论的抵抗，这些研究者似乎认为将事实有耐心且不断地累积即是知识生产，而这背后也带出了他们对事实不言自明的假定。

与其让国家界线，甚至是区域界线侷限我的知识探索，我认为真正必要的是将地理历史化——在卢安达这个例子中则是将区域地理历史化。同时我也意识到这个区域的历史书写跟权力有共谋关系，它们不仅将国家界线也将政治身分——胡图族（Hutu）和图西族（Tutsi）——自然化；这造成的结果是它们既无法置疑殖民治理术，也无法置疑国族主义和后殖民治理术。

**陈光兴：**延续卢安达那本书，你对达尔富尔的书写产生了非常大胆的知识介入，透过把在地特殊性历史化，挑战了国际人权这样的政治计划。你能谈一谈决定进行此般知

识介入的背景脉络吗？

**马穆德·曼达尼：**卢安达那本书出版于2001年，达尔富尔那本则是2010年。我在2003年去了苏丹，我当时对伊斯兰教法（Sharia）甚感兴趣，想研究它如何在殖民时期被重新塑造成一种国家强制执行的“习惯法”。我本来想从头去追探这个过程，从英属印度的盎格鲁-伊斯兰教法（Anglo-Mohammedan law）到埃及、苏丹再到奈及利亚；我同时也对另一种在殖民时期被塑造的“习惯法”——不过这次是种族而非宗教——感兴趣，这是个反向流动的过程，从奈及利亚到苏丹然后一路向南。

我抵达喀土穆（Khartoum）时心中已有盘算。八〇年代当我在马凯雷雷时，我总对所谓“区域研究”从业者到坎帕拉后，几乎不假思索地跳过我们这些大学知识分子，直奔“民众”的行为感到讶异；我那时决定若有机会研究一个没居住过的社会，我会透过当地知识分子的争论进行研究。于是我抵达喀土穆后随即与苏丹的知识分子会面——从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到伊斯兰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族裔主义者（ethnicists）。

我到喀土穆的那年——2003年——也是达尔富尔武装叛乱如火如荼展开的那年。我与这场叛乱的首次接触是透过一个我在喀土穆大学遇到的达尔富尔法学院学生；他向我介绍了一位那时也在当地的达尔富尔律师，后来发现他竟是正义与平等运动（Justice and Equality Movement）——达尔富尔叛乱伊斯兰派系——的领导成员。这次会面开始了我跟达尔富尔叛乱的连结。

我于2006年重回达尔富尔，目的在与达尔富尔-达尔富尔对话及协商（Darfur-Darfur Dialogue and Consultation）——非洲联盟的一个计划——会晤。催生于在阿布贾（Abuja）进行的多次和谈，这个计画致力于推动达尔富尔区内三州的社群对话。我被邀请到达尔富尔当计画顾问，主要工作为阅读背景文献，然后连续好几天聆听跟不同团体会晤的议程；这些团体包括来自政府和反对派的长官，被迫在自己国家内流离失所的、来自不同营区的人，社区组织，妇女团体，以及学者和知识分子。我在每次会议的责任是找出被排除在讨论外——因此需要更充分阐述——的议题与看法；这是个非常适合从不同视点思考达尔富尔危机的工作。

我越聚焦于造成达尔富尔冲突的当代议题，越开始意识到那些驱动当代讨论的基本假设，并因此回头去质疑这些假设。我的做法是去拆解和釐清每个假设的系谱( genealogy )——假设于何时而生？在什么脉络下？它如何帮助或混淆了我们对当前情况的理解？随着时间过去，这使得我的反思日益具有历史性，让我彻底地想清楚传统、部落、种族和地理位置( locality )等四个主要假设。

我利用往返于达尔富尔的空档回到哥伦比亚大学工作，在那里我目睹了一个关注达尔富尔危机的美国社会运动——拯救达尔富尔运动( Save Darfur Movement )——令人讶异地迅速成长。这个运动将达尔富尔视为一场以种族为动机，由“浅肤色的阿拉伯人”加害“非洲黑人”的屠杀。我意识到此理解框架不只建立于把苏丹人民种族化的殖民地传统，还将之强化；于是我加入了辩论，首先藉发表在《伦敦书评》的一篇名为〈命名的力量〉( The Power of Naming )的、极具影响力的文章，接着则用《救世主与生还者》( *Saviors and Survivors: Darfur, Politics, and the War on Terror*, Pantheon, New York )<sup>8</sup>那本书。我邀请读者从双重脉络——不仅是卢安达，还有伊拉克——思考达尔富尔。与其让未干预卢安达大屠杀的罪恶感牵着鼻子走、用道德的确实性来取代知识，并因此被怂恿在全然无知的基础上行动，进而对这样的廉价交易感到自我良好，我督促读者以伊拉克的教训去审视这种道德确实性：只有那些拥有不成比例权力的人才能把知识视为无关，而对自己行为带来的后果漠不关心。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势态——只要我感觉良好，其他事不重要——不仅说明了那些无知地被动员支持反恐战争的行为，更解释了那些加入名为“拯救达尔富尔运动”道德讨伐的行动。与其在道德上做准备，好在哨声响起时行动，我主张我们应当不断地——甚至在哨声响起之前——试着去了解这世界；即使我们必须在哨声响起时倚赖不完整知识行动，我们绝不能表现得好像知识是完全无关紧要的。

---

8\_ Mahmood Mamdani, *Saviors and Survivors: Darfur, Politics, and the War on Terror* (New York : Pantheon, 2009)——编者注。

---

## 重返坎帕拉

**陈光兴：**即使身在纽约，你跟非洲的连结也从未间断，还在 2010 年回乌干达接管马凯雷雷大学的社会研究中心。

**马穆德·曼达尼：**没错，2010 那年发生了很多事。让我往回推算——我正在算我儿子的年龄，因为这正是我们利用研究休假回坎帕拉之时！我想我们是在 2003 年去的，我那时决定带儿子到坎帕拉，纯粹就是想回家乡待上一年。我把他送到当地一所学校，就这样任他自生自灭——而他几乎无法待下去！对我儿子来说，在那边的头两个月非常难熬，可是接下来他在学校结交到一些很好的朋友。这段时期，我把精力花在研究世界银行（World Bank）强加的新自由主义计画如何转化了马凯雷雷大学；我把这段时间的研究写成一本书，名叫《市场上的学者：马凯雷雷大学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困境，1989-2005》（*Scholars in the Marketplace: The Dilemmas of Neo-liberal Reforms at Makerere University, 1989-2005*）<sup>9</sup>。这本书十分枯燥，不仅充满了以经验为依据的细节，研究材料也未被充分融合、分析和消化——换句话说，我不建议任何人读这本书。

**陈光兴：**就像《乌干达的帝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

**马穆德·曼达尼：**一点也不错。《乌干达的帝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是婴儿食品；但《市场上的学者》甚至不能说是婴儿食品，而是生食——不是寿司而是未经烹煮无法下嚥的那种生食！但是，这本书也让我得以了解之前任职的大学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由于我们夫妻俩都保持著非常忙碌与活跃的生活，所以常要留心确保我们其中一个会待在纽约，因为我儿子那时还在纽约上中学。2010 年开始，我儿子上大学了，这之后我感到非常自由；同一时间马凯雷雷社会研究中心开缺了，于是我递送申请书、参加面试，最后顺利得到这份工作。

由于这份工作是全职的，我在 2010 年跟哥伦比亚大学协商将我的教学时数降为一半。

---

9\_ Mahmood Mamdani, *Scholars in the Marketplace: The Dilemmas of Neo-liberal Reforms at Makerere University, 1989-2005* (Kampala: Fountain Press; Dakar: Codesria, 2007)——编者注。

---

我曾经参与一个将年轻人送出国的独立计划；跟我一起去的学生中有一半留在国外，另一半回国的学生则完全无法适应国内的环境——他们在外接受的训练跟回来国内机构工作所需的训练是有相当出入的。这使我确信如果不改革我们身处的教育机构，我们将注定被困于这些于殖民时期形成的机构内工作；所以我决定接受这份工作的挑战。

**陈光兴：**你试图做什么样的改革？这计划听起来非常有趣。

**马穆德·曼达尼：**马凯雷雷大学的教育制度以英国体系为基础：要拿博士学位只需做研究，等于大学毕业后学生就停止修课了；这样的结果是学生拥有非常狭隘的专业训练，只能教跟其研究相关的课程，而其他的教育训练则停在学士学位。我比较喜欢美国的制度，尤其是考虑到当时乌干达的大学教育非常薄弱——我们招到的研究生常常训练不足。因此我们的学程包含两年修课时间，课程是跨学科的，并分为四组课群；学生必须选一个当主修、一个当副修。这些课群主要提供政治学理论训练——分为社会、文化、历史以及政治经济学。这是一个为期五年的学位，学生在第三年进行专业综合测验，收集研究书目，大量而集中地阅读；第四年则做研究，然后在第五年写论文。

**陈光兴：**这四组课群学生全部都要修吗？

**马穆德·曼达尼：**不不不，学生修的是一套跨学科课程。学生在第一学期上三门必修课，其中一门是前现代西方理论，再来是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开始的现代经济理论，最后是非洲研究的主要争论；除此之外还有三门必修课，所以总共有六门必修。接着学生选修四门主修课、两门副修课。今年1月我们的第一届哲学硕士（M. Phil.）刚毕业；第一届博士生则将于2017年1月毕业。我们一年收十名学生：六个来自乌干达，另外四个则是国际学生。我们的学生来自伊索匹亚、厄立特里亚（Eritrea）、南非、坦尚尼亚、肯亚、蒲隆地（Burundi）和迦纳；今年还收了一位来自法国的学生。我们并且筹募到了一定的资金让每位学生都有全额奖学金。

**陈光兴：**你目前同时在乌干达和纽约教书。这两地的教学经验有什么主要的差别？这两者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比如说知识生产方面？

**马穆德·曼达尼：**噢，天啊！在乌干达你必须活在两方僵持的紧张关系之下；一方

是学术和知识生产的世界，另一方则是这些知识如何能为我们解释现在正经历的、正发生的事情。这样的张力继而突显了公共知识分子和学者间的关系；不过，这张力的出现其实是因为我们对理论的假设：我们常将理论视为一种能随插即用的产品，一种我们从其他地方——尤其是西方学术界——进口的产品。在乌干达，主要的难题之一是谁来教课？我们目前有两个方案：其一，所内的四名全职人员，但是除了我之外其余都是从国外来的，从意大利、美国这样的地方；再来，我们从学校各系中找乌干达学者来兼课，每人教一门课。但是支撑这学程的主要支柱还是非乌干达学者——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他们与社会、与当地议题的关系是非常薄弱的。我在纽约则没有感到这种张力；在哥伦比亚，公共知识分子跟政府较有联系，而非跟政府外的公众。

**高士明：**那么在纽约工作的教授是不可能同时做学者也做公共知识分子啰？

**马穆德·曼达尼：**这个嘛，其实也有例外——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就是个例外。另外还有像曼宁·马拉贝尔（Manning Marable）跟拉希德·哈利迪（Rashid Khalidi）这样的学者。我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理解比较接近萨义德或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而非比如说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那样的学者。但是在乌干达，有时你会碰上觉得好像他们是在纽约念书的学生——这种学生为数不多，但这是很可悲的，让人不禁想问：“我们是怎么教出这个学生的？”

**高士明：**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主张后殖民主义出现于非西方知识分子进入西方学界之时。你怎么看？

**马穆德·曼达尼：**我刚看到你的《与后殖民说再见》（*Farewell to Post-colonialism*）<sup>10</sup>，我还没读这本文集，不过我想应该由我来问你这个问题。

**高士明：**我同意，这个名为“跟后殖民说再见”的三年展背后的一个起因是对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论述的思索。我认为，当后殖民主义在90年代初期进入中国学术圈，它原是西方论述的一部分；而现在它似乎成为非西方的论述。美国的情形又如何？

**马穆德·曼达尼：**它变成了新移民的身分诉求。

---

10\_高士明、萨拉·马哈拉吉、张颂仁等，《与后殖民说再见》，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

**高士明：**是的，这跟非洲的情况不太一样。过去三十年，后殖民论述在全球有越来越好的成绩；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兴起并有了主导性的地位。后殖民论述为知识生产——以及我们对知识生产的反思——打开了很多思考空间。但在2008年之前，也就是三年展之前，后殖民的论述或理论常常只谈文化、历史、文学，但其实这里有个重要的资本问题。在三年展新闻发布会上，有位美国记者问我们“再见”之后该往哪去？你该重返殖民吗？那么中国在非洲的所作所为该如何理解？我当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直至2010年我还在思考“再见”后我们该做什么。对我来说，该做的应该是去重新启动对政治经济学的描述，而不是分析，也许有点像所谓保持怀疑的批判或生命政治（bio-politics）那样。

**马穆德·曼达尼：**福柯（Foucault）曾谈论过……我一定要把它找来读。

**高士明：**之前我读到你写的一句话，我认为它非常重要。你问，从移住民对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跟多元主义（pluralism）自居其监护人的声称，以及原住民对起源（origin）跟真实性（authenticity）的紧抓不放，在这些去殖民化的努力过程中，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我们到底走了多远？

**马穆德·曼达尼：**这也是我们目前的所在之处，并且必须思考的课题。

**高士明：**这对中国也非常重要。但我认为这是非常有趣的——首先，作为一个社会契机，去殖民在非洲跟中国都尚未结束；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论述，后殖民主义似乎很快地失去了原有的活力，它也许被置换成别的什么了，像是西方环境中对多元文化的管理。

**马穆德·曼达尼：**《定而治之》这本书集结了我在2012年所做的一系列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演讲，我并藉此书首章爬梳了《公民与子民》所论之背景——即英殖民帝国如何应对1857年印度的反英抵抗、1860年代牙买加的莫兰特湾（Morant Bay）叛动、以及19世纪末苏丹的马赫迪起义（Mahdi Uprising）。

英殖民帝国对这一连串反殖民抗争所做的应对，最终催生了一种统治技术，一种以差异为本的管理法则。也正是这时，他们将社会习俗转化成法令，创造所谓“习惯法”

( customary law )这样一个法治方针。由于习俗常变常新，从来就没有一套独尊的社会惯习，尽管人们一直试图制定具权威性的社会惯习，因为有其他互相竞逐主导权的社会惯习来源和主张，使得这样的尝试无法完全成功。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张力内存于英国自己的普通法 ( common law )——它永远假定了其他相异观点的存在。但在殖民地，习惯法这一法治方针就并非如此，它设立了一套官方的、具权威性的社会惯习，并建立了相对应的阶级制度去根植并执行这套惯习。

英殖民帝国做的另一件事是彻底改变社会与国家间的平衡。因为习俗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习惯法则是国家法治的一部分，因此习惯法的制定采撷了社会的争端解决机制，使其成为国家可动用的诸多权力之一；这种对社会惯习权威设立的权力被转化为国家资源，并透过制定非常确切的分界来更加地彰显与再生产“差异”，使之毫无协商空间，只能被再现……我认为在很多方面多元文化主义可以说是诞生于殖民地，殖民者在殖民地学到了这样的统治技术，并把它带回英国。

回到你对后殖民论述与多元文化主义提出的观察，除了南非之外的非洲学术圈，后殖民主义甚至尚未进入其视野，对许多非洲的知识分子来说，即使是底层研究仍是新的研究项目。我们虽然试着处理、思索 80 年代的社会运动，却并不知道印度已经做了底层研究，所以我必须阅读它们，必须把这些研究成果内化为自身的知识。

**陈光兴：**对于后殖民主义和“说再见”的理解实际上是应美国产出的知识而生的，而这些理解是人们到了那里后做出的回应，也就是对美国知识生产的回应。但是，一旦你把问题置放在前 / 殖民地，这便不再只是对北美的回应。在某种程度上，你是无法逃避这些问题的，即使从历史面来看。

我们可以这么问：“中国和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为何？”这个问题非常棘手。就我们在北京甚至是上海的讨论来看，当代中国正陷入后革命议题；如果不处理后革命议题，你可以说是挡住自己处理殖民问题的去路——这是需要被厘清的第一层。另外还有半殖民 ( semi-colonial ) 问题，不过这可说是另一组议题了；中国除了东北以外，大部分地方没有被彻底地殖民统治过。至于台湾、香港和澳门，这些是小块区域而非核心地区。



**马穆德·曼达尼：**上海呢？

**陈光兴：**那是租界，跟殖民地属性不同；上海租界当时被不同的帝国列强瓜分。

**高士明：**租界跟殖民地间的差异是政治和经济上的；我认为文化上其实被殖民得很厉害。

**马穆德·曼达尼：**我觉得你一直要试图打开的议题其实是关于知识生产的问题。因为它将学术成果的普世主张否定，并在不破坏做比较讨论之可能性的同时，将其固定着陆；它这么做开启了另一种挪用现代性的方法，开启了另一种把传统历史化的方法。本土主义者把传统变成化石，而且非常不认同将传统视为有着当前和今后的一种历史论述。这的确是有关的话题……但我认为借由对知识生产的重新思考和对当代知识的历史化，我们可以将现代性和本土主义从他们被封存的柜中移除。

**陈光兴：**我想这里我们可以汲取的，是问题并非所谓的非洲经验而已，而是当问题被摆置于非洲经验时，将触发非常不同的讨论。这些问题的确跟非洲有关，但为何他们没有摆置于其他的历史或地理历史经验？在这层意义上，我们于此所做的比较讨论带来了新的议题；读了《公民与子民》后你可能问：“是否能将非洲大陆阅读为一个整体？这么做的意义为何？”但是没有人敢对亚洲提出一样的问题。

**马穆德·曼达尼：**我认为非洲作为一个整体，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才成立，而非超越历史的。

**高士明：**在《定而治之》的尾章，你谈到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可以就这一点稍做解释吗？它是一种普世的概念吗？

**马穆德·曼达尼：**对我来说，这可以连结到我先前讲到的，也就是对普通法跟习惯法，以及社会上争端解决可能性的讨论。对我们来说，民族国家的问题即是主权问题。

**高士明：**主权是殖民带来的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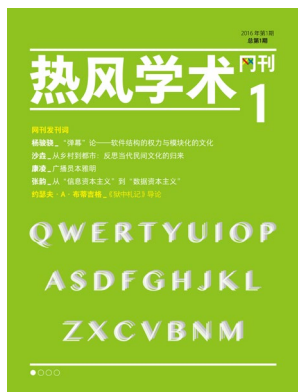
**马穆德·曼达尼：**没错。在今天这个时代，从表面看来主权是我们所有人拼了命也要捍卫的；但是其内在本质是一个我们至今无法找到解决方案的问题，因为它主张权力得以在各方面被垄断——这样的主张将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当然，国家宣称它不仅仅

是社会空间中争端解决机制的监护人，还是其唯一资源；因此，如果没有国家主权，社会就会分崩离析成某种霍布斯丛林（Hobbesian jungle）……这里我尤其想到非洲的情况，因为对当地许多社群来说，这种自我管理能力的历史资源仍是当代资源，对他们来说，这种能力依然存在，依然在大多数被称为“部落”（tribes）的社群中真真切切地存在。

所以回到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这个问题，我们有其他解决办法吗？我们能对民族国家拿出什么样的替代方案？许多尝试都被部落主义的语言妖魔化了；因为这些尝试都被视为开辟小型主权的企图，而非管理社会和政体的替代方法。因此，我们试着鼓励学生用一种非浪漫的视角，秉持对当代与现实社会条件的关注，去观看并寻找历史上的各种可能性。

**陈光兴：**非常感谢你参与这次马拉松式的访谈！希望将来有机会能继续我们的谈话。🌈

# 本刊 2016 年（总 1-4 期）目录



## 网刊发刊词

2016\_01

## 专题 \_ 工人 · 阶级 · 文化

- 吕途 \_ 工人文化的继往开来——集体劳动的记忆与合作经济的开拓 2016\_02
- 铃木将久 \_ 钻研文化、赢得尊严：吕途“新工人”论述引发的思考 2016\_02
- 卜卫 \_ “The Point is to Change It”——记美国“媒介、民主与行动”研讨会 2016\_02

## 专题 \_ 作为文化政治的生态议题

- 陈义媛 严海蓉 陈航英 \_ 农民、政府、市场与种子：五省玉米产区的调研发现 2016\_03
- 夏永红 \_ 生态文明：一种自治主义进路？ 2016\_03
- 孙佳山 \_ 最激进的“保守形态”  
——生态话语在当代科幻题材影片中的起源、功能和困境 2016\_03

## 特刊

- 
- 制造灾难和生产需求: 种子霸权让大自然在猎食者的胃里相遇…… 2016\_04  
 爱丽丝·克莱肖尔 安德烈斯·西克曼 \_ 著 吕途 \_ 译

## 论文

- 
- 杨骏骁 \_ “弹幕”论——软件结构的权力与模块化的文化 2016\_01  
 相明 \_ 微信——市民社会的再生产空间 2016\_01  
 沙垚 \_ 从乡村到都市: 反思当代民间文化的归来 2016\_01  
 王雨 \_ 民国声域里的课本、留声机与广播: 1912—1936 2016\_01  
 傅正 \_ “曼海姆悖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回应”  
 ——以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为中心 2016\_02  
 闫作雷 \_ 中国古代政治传统与“1970 年代”“评法批儒”运动 2016\_02  
 沈光铨 \_ 试论 20 世纪革命变奏法节奏分析  
 ——以俄罗斯革命、中国革命为中心 ( 上 ) 2016\_03  
 李飞 \_ 愤怒的“雅努斯双面”——2015 年 8 月 @ 人民日报涉日微博评论研究 2016\_03  
 沈光铨 \_ 试论 20 世纪革命变奏法节奏分析  
 ——以俄罗斯革命、中国革命为中心 ( 下 ) 2016\_04

## 理论·翻译

- 
- 康凌 \_ 广播员本雅明: 新技术媒介与一种听觉的现代性 2016\_01  
 库岑译 \_ 瓦尔特·本雅明论广播 ( 三篇 ) 2016\_01  
     对广播的反思  
     戏剧与广播——论其教育作用的相互监督  
     两种普及——广播剧的基本原则

## 评论

- 
- 张韵 \_ 从“信息资本主义”到“数据资本主义”  
 ——重读席勒《信息拜物教: 批判与解构》 2016\_01

曹柳莺_当政治遇见诗意,当理智碰撞情感——第66届柏林电影界一瞥	2016_01
黄蕾 高明_《欢乐颂》的浪漫主义与现实逻辑	2016_02
李默_《欢乐颂》与弹幕的文化逻辑	2016_02
陈光兴_都是“现代”民族国家惹的祸?	2016_02
潘家恩 张振_文化研究的城乡实践——第三届热风学术青年论坛述评	2016_02

### 《无悔:陈明忠回忆录》评论小辑

---

吕正惠_大陆版《无悔》出版后记	2016_03
吕新雨_接续红色血脉 重建台湾叙述	2016_03
蓝博洲_“失败者”的战斗与胜利	2016_03
郭春林_厘清历史,用知识和文化争夺未来	2016_03
倪伟_因为内心光明所以无悔	2016_03

### 专稿

---

约瑟夫·A·布蒂吉格_《狱中札记》导论	2016_01
约瑟夫·A·布蒂吉格_《狱中札记》导论(续)	2016_02
约瑟夫·A·布蒂吉格_《狱中札记》导论(续完)	2016_03
陈光兴等_一位非洲知识分子的形成:与马穆德·曼达尼对谈	2016_04

2016年第4期  
总第4期

